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早年周恩来(下)

 **BOOK**
网络资源 非卖品

作者小传

庞瑞垠，1939年1月11日出生于江苏省江宁县。1957年发表处女作。1964年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1980年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一级作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wc MVIMAGE,MVIMAGE,!09100922_fy04_1.bmp}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故都三部曲”（《危城》《寒星》《落日》）、《沼泽地》、《逐鹿金陵》等七部；中篇小说《恍惚》；短篇小说《东平之死》；报告文学《沉沦女》、《陈布雷之死》等，逾400万字。

第四章 东渡日本

1 入乡随俗——复杂的留学生群——迷惘与“三个主义” ——《新青年》——风雪残留，红日东升

九月肃霜，大淡云闲。

轮船自海河起锚，缓缓向前，驶离塘沽港。周恩来站在甲板上，强抑着心底的惆怅，向岸边的新慧、峙之等挥手作别。船平稳地行驶了一段航程，加速进入公海，这时，大风掀起巨浪，船体急剧地颠簸着。周恩来感到头晕，胃里一阵阵痉挛，作呕想吐。他强撑着，抓牢床架，随船体的摇晃而摇晃，不时发出一阵阵无奈的笑声。突然，一个趑趄截断了笑声，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重又抓牢床架，尽量让自己适应。总算好，他居然能倚着船舷，观赏黄昏夕照，夜幕秋星，于碧空沧海中，享受与鸥鸟为伴的自由情趣。两昼夜航程结束，船抵小岛纵横、山青水碧的长崎。停泊半日，他没走远，只在港口一带转了几条弥漫着鱼腥味的街道，初步感受了异国风情，尤其是那些身着和服，迈着急促的小步，吧嗒吧嗒地擦地而走的日妇容姿，让他觉得有些特别。午后，船又起锚，当晚驶入景色如画、令人陶醉的濑户内海。在神户登岸，继坐火车，经大阪至京都，见到了昔日南开读书时座位紧挨的同学吴瀚涛。吴正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就读，他是特地来车站迎接周恩来的。知交海阔天空诉说别情之后，他又上车，经名古屋抵达东京。

王朴山已先他三天到了东京，住在一处叫三崎町的地方，这时，已约了张蓬仙、张鸿浩一道迎接他，好友异国相逢，倍感亲切。

日本一般大学，包括东京帝国大学附属的高等学校，都是春季开学，招考日期则在阳历3月，这样，就有几个月的准备期。周恩来与王朴山同入东京神田区仲猿乐街七号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开始几天，周恩来跟张蓬仙住早稻田区的一座公寓，稍后，即搬到吹町电影院附近的一个家具店二楼，与一位陈姓中国留学生共住

——“贷间”¹。周恩来进预备学校，主要是学习日语，补习大学考试课目，如英文、物理、数学等。

在这之前，日本政府和清政府订有由日本代培中国留学生15年的协定，其中规定，日本几乎所有的名牌大学，中国留学生皆可报考。周恩来准备报考的，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只要考取其中的一所，即可得到政府的官费补助。张鸿浩也准备考这两所学校。

初来乍到，一连许多天，周恩来仍沉浸在昔日同窗欢聚的氛围里。王朴山住的离他不远，一天，他在王朴山处，见到朴山保存的“师友赠言录”，他翻看了几页，陷入往事的回忆中，忽儿合上，见封面一片空白，遂说：“是不是得有个名字？”

“对，对，恩来，你给想一个。”

“赠言原为切磋，切磋之惠，无日可以忘之，就叫《切磋集》如何？”

¹ 贷间：房主将多余房屋出租，同时承办客人伙食和一般生活照料，称为贷间。

“好，就这样。”朴山乐不可支。

周恩来欣然拈毫在这本赠言录封面上题了“切磋集”三字，沉吟有晌，旋又补写一行：

“朴山东来后三日，余亦追踪至异域。晤故人，诚乐事也。偶造其寓，翻阅书麓，得是册。中汇集师友切磋之语最多，因取斯二字题其前，寄同情耳，匪敢谓得当其称也。中华民国六年九月下浣。翔字周恩来题。”

朴山接过一看，啧啧称善。

在此期间，周恩来又相继会见了严智开（严范孙之子）、陈钢、童冠贤、高仁山、杨柏安和卢开运、卢开津昆仲……

最初的欢聚之后，周恩来在补习功课的同时，努力使自己适应日本的习俗。日本人爱好天然，崇尚简朴，讲究礼貌和清洁，出外要穿木屐、草履，入室则要脱屐、履于户外，房间无门户窗牖，以纸为屏，下承以槽，随意开合。对周恩来而言，穿脱木屐、草履都好办，难的是坐姿，它不像中国的席地而坐，而以足承尻后，倘若跌坐、蹲踞或箕踞，皆为不恭，坐必设褥。平常，没有日本人来，倒也随便，怎么坐都行。可是，一旦房东或别的日本人来或因事去寓所见日本人，被邀入席，则要受罪了，但入乡随俗，既然来日本留学，也只好练习这种坐姿。

他的居室仅四席半，四壁萧然，除了榻榻米、茶具、小机，就没有别的陈设。榻榻米是草编的，四周以蓝色木棉布包边，据说，此乃地位最低者用的，俗称“田舍叠”。他顾不得这些，入夜，从壁橱取被摊开即睡。

伙食是房东提供的，无非是蔬菜、牛蒡独活（芦笋）、味噌（豆瓣酱）、味汁（干菜汤），有时也加点寿司（鱼鲜），猪肉、鸡肉少见，但鱼多。周恩来对这倒无所谓，当年，在铁岭和奉天，高粱米饭、苞米都吃过，他不在乎。他是来求学，不是来享受的。何况，旅费、学费都是亲友资助的，不能丝毫浪费。

生活清苦倒也罢了，最难的是日文。日语的书面形式组成复杂，其中既有汉字，又有日本自己发明的平假名和片假名；既夹杂有罗马字，又有阿拉伯字。他试着日语汉学，开初产生好学之错觉，孰知，愈学愈难，学到多变的语法和复杂的敬语时，实在挠头。而且，近年，东京街头的招牌广告以及印刷品中，汉字在减少，而假名（字母）却在增多，日文不再是可以“眼学”的文字，须用耳听；不再是书上的本文，而成了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他像一般留学生那样买了富山书房出版的《袖珍名著文库》和三教书院出版的《袖珍文库》，里面收有“狂言”、“落语”、“俳句”。许多人皆从熟读这些作为学习日文人门的，但他觉得掌握起来并不容易。每天，他都去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来年的官费考试，对他乃是“背城一战”，“成败与否不曾预料”。他虽不敢懈怠，但收效不大，使他多少有些担忧。

这期间，他仍关注着国内，尤其是南开的事，他为母校“精神为之一新，九先生亦愈见信任于学生”而高兴，他牵挂着在清华大学和金陵大学读书的潘述庵等同学以及远在美国的冯文潜、黄任生等同学，时有信函联系。

见《周恩来青年时代》第五期（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

席：日制，每席约长6尺，宽3尺。

狂言、落语、俳句：均为日本不同文体的类别。

九先生：即张伯苓之弟张彭春，时任教南开学校。

年底，他投书陈颂言（尚文），对留在国内的这位同窗，备述抵日的种种感触：

“……弟自居此，饮食起居尚无大不顺，乍至，席地而坐，而饮，而食，而读，而卧，颇觉不惯，久之亦安……食日本餐，食多鱼。国人来此者甚不惯食，弟则甘之如饴，大似余家乡食鱼风味；但无油酱烹调，以火烤者居多。国人咸住中国人开设之馆，为便于食味。故日馆较中馆清静，无喧哗声，便于用功。”

信中，他也坦言了自己对考试的担忧：

“弟现预备日文，无大困难，所难者懒病时发，不肯向书堆里求快乐，是为病耳。官费考试在明夏，届时背城一战，十有九必败，缘来此日文程度一年，用功者可保考入，若弟优游性成，诚难有把握矣。”

周恩来何以预言“十有九必败”？原因在‘于他心有旁骛，不能专一，他既要关注四海窗友，又要与留日同学“常相聚会”，还留心观察日本社会之种种现象，而距考试仅有半年，时间过于仓促，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那么，两个多月下来，他对日本的观感是什么呢？信中有简单的概括：“日本风俗，不见优美，好在谨言慎行，无不可居之地。倭国虽小，安分克己，尚无不合式也。”

但是，他对中国留学生的观察却仔细、深刻得多：愤深切的浩叹。

信的附言，周恩来又特地问到《南开思潮》的出版事宜。在他毕业之前，南开有敬业乐群会、基督教青年会和自治励学会三个学生团体，并各以其名编辑刊物，鼎峙势分，难展宏图，遂集中精力合而为一，是为《南开思潮》之间世。所有内容，亦以三者之精神并存而不废为旨归。周恩来写这封信时，第一期已出版，只是，他未收到，第一期总编辑为段茂润；第二期明年6月出版，总编辑是张轮远，副总编辑是李福景，总经理即为陈颂言。周恩来并未参与《南开思潮》的编辑，但非常关注。后来，他收到该刊后，曾与留日同学传观、讨论。

他依然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一天，他出校门，就到三崎町王朴山处，不意碰见徐达九。交谈中，达九告诉他想考医学，以为既可替人治病，又不求人，能自理生活。他希望听听周恩来的看法。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呀，”周恩来说，“经济变了，其他一切都要发生变动。”接着，他讲了文化、教育、国家机关与经济基础之关系，“达九，何不考经济呢？当然，我只是建议。”

“恩来，你说的有道理，我再想想。”

后来，徐达九放弃了学医的念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受益于著名学者河上肇。

补习之外，同学间仍免不了相互走动，周恩来时常来见王朴山，他发现朴山因健康不佳断续辍学，因此而意气消沉。这天，他又来串门，见朴山卧床不起，其妻杜栗堂随侍在侧。

“近日感觉如何？”周恩来凑近问道。

“一直在服药，”朴山恹恹地说，“不像有大病，可怎么就好不了呢？”

此信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河上肇（1879—1946）：日本经济学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社会主义运动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贫乏故事》、《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调查》、《经济学大纲》、《资本论入门》等。

“朴山，我看你是精神负担太重，既然不是什么大病，就不要整天躺着，活动活动也好嘛。”

“是啊，”杜栗堂答腔，“他是愈躺愈没劲，愈躺心愈沉。”

“这不，病根怕就在这儿，”周恩来笑道，“朴山，你要像在南开时那样生龙活虎，搞活动、撰诗文、讲演、辩论……不信你试试看，准能一天天好起来。”

“恩来，你一直关心我，照料我，我焉能辜负你呢？”王朴山坐了起来。

“哎，你还记得我们在南开舞剑时联的诗吗？”周恩来问道。

“哪能不记得，”王朴山有些激动，他不假思索地背诵出来：“华年借绿鬓，午夜啸青锋。学道雄心淡，观时热血浓。无成惭画虎，有待爱潜龙。诗思飞何处？云山几万重。”吟罢，坠入沉思。

“当年，我们真是壮怀激烈啊！”周恩来说，“回想起来，令人眷恋不已。可我们不能生活在过去，还要前进，对吧？”

“对，”王朴山应道，“我知道自己缺乏磨练，我要振作起来。”

“朴山，你这样想就太好了。”周恩来颇觉兴奋，“怎么样，我们来联句，我出上句……”他盯着王朴山。

“这……”王朴山笑了，“试试看吧！”

“好，我这上句是：共扶元气回阳九。”

“各放光明照大千。”王朴山略一寻思应对出来。

“我说哩，朴山终究是朴山！”周恩来畅快地笑出声来。

杜栗堂站在一旁，淡淡地笑着，为恩来、朴山的友谊和朴山精神焕然一新而庆幸。

王朴山对这首充满豪情、志在救国拯民的联句无比珍惜，事后将其篆刻在自己的铜印章上，以时时激励自己。

尽管寒凝大地，北风肆虐，1918年依然从容地来到人间。

新年伊始，周恩来一早就到了神田区基督教青年会，这是一幢尖顶的哥特式建筑，枯黄的爬墙虎，仍斑斑驳驳地依附在壁上，苍翠的雪松耸立一侧，形成色彩的强烈反差，晨祷的钟声，在稀薄的雾霭中回荡，周围显得很是恬静，可他不是基督徒，自然不是来诵经的。因为这里有几间活动室，旅日南开同学经常在此聚会。此外，寄他的信函，也都由此转他，这天，他终于收到陈颂言寄来的第一期《南开思潮》，不待坐下便急切地翻阅起来。其中有他的故交张信天的《致中国有志青年书》，可谓扛鼎之作。文章通篇热情洋溢，旨在启发中国青年发愤图强，忘私忘我，牺牲一切，力挽狂澜，救民水火，而使中国跻于西方强国之列。次之，好友潘世纶撰写了《论青年当忍辱负重》，鼓动爱国救民之青年力任艰巨以挽国家之危亡。此外，还有好友张轮远的诗歌六首，也是积极向上之作。整本刊物，分为插图、发刊词、论说、学术、小说、文苑、杂俎等，可谓洋洋大观，周恩来对这份刊物的筹办，一直悬念不已，不知它会是怎样一副面孔，担心有失《敬业》、《校风》的传统。读后，他为之释然，自然，不满意之处也有。当晚，他去早稻田找陈钢。陈钢曾是《校风》总编辑，周恩来是其继任。见面后，话题便围绕《南开思潮》展开，两人对它的所长所短，看法一致，以为日前留日同学会中有人一口否定它，似为不公，今后当继续与之保持联系，关心它的成长。

无论是对达九，对朴山，甚至对《南开思潮》，周恩来都倾注了热心，就像是分内的事。可一想到自己，却总觉得已失去南开时代那股活力，虽说

还是留日同学会的评议员，却为学业所困。这时他已搬到神田住，孤单独处，看着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想起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倒是很省事的。显然，无生主义正纠缠着他，一时难以摆脱。他时不时地焚香阅览《真言净菩提》、《禅议》、《般若经》等佛教经书，但他不是一个意志薄弱、浑浑噩噩的人，他时时在解剖自己，反省自己。

从陈钢那儿回到住所，夜已深了。一月的日本，严寒笼罩着一切，房东的卧室有壁炉，而他是享受不到这份清福的，凛冽的北风在户外号叫着，可这些像是跟他无关，他取出一本硬壳簿子写日记：

“（修学）慎则为佛，迷则众生……我今年已经 19 岁了，想起从小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既无脸见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对不起现在爱我教我照顾我的几位伯父、师长、朋友。若大者说什么国家社会，更是没有尽一点力了，佛说报恩为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话说得对：‘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

显然，周恩来的思想仍在波动之中，自谴自责，溢于言表，既想到国家社会，又想到至爱亲朋，“报恩”思想占据着他的大脑。

这些天，南开留日同学会的事仍困扰着他。翌日，童冠贤、吴涤非等来找他，商量留日同学会的庶务、书记的人选，原拟让陈钢担任书记，陈钢未答应，他还得去劝说。本来这个职务，童冠贤的意思是让他干，可他要预备功课，以参加 3 月间东京高等师范的考试，哪儿有此用功夫，连评议员一职都想辞掉，真是烦不胜烦……

冠贤、涤非走后，周恩来焚好了香，将携带至日本的嗣母亲笔写的诗集打开来念了几遍，静坐一会儿，当年在淮安、淮阴和宝应，随侍嗣母身边，那逝去的岁月，一幕幕恍然重现面前：嗣母教他诵读诗文，带他游览胯下桥；讲述《天雨花》、《再生缘》，引导他读《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生母病故后，嗣母支撑着家中的一切……想起这些，他心里非常难受，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计算嗣母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 26 年了，那时嗣母才 15 岁！嗣母除了擅长诗词，琴棋书画也无所不精，可是，自下嫁周家，就没过过一天快活日子，以至后来也染上肺病，猝然离去。时光易逝，遗墨尚存，想想嗣母离开人世也整整十年了，不知她在天之灵，是否还想着他这个儿子没有？

写完这天的日记，周恩来拥裳而眠，可是，思绪仍沉浸在儿时的年月，在这异国的寒冬之夜，承受着感情的煎熬。

最近，他几乎天天去基督教青年会，那里有许多国内和日本的报刊，他不能放弃阅读的机会。此外，在那里，他陆续收到许多来自国内和美国的贺年片、信函，其中，有新慧、峙之的，勾起他不尽的思念。

无生主义：佛教名词。认为一切现象之生灭变化，都是世间众生虚妄分别的产物，本质在于“无生”。修得无生，便是涅槃，即熄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

此为周恩来 1918 年 1 月 1 日的日记。

指周岁。

此处指过继父母。

童冠贤（1894—1981）：原名启颜，字冠贤，察哈尔宣化人。曾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逝于加拿大。

4日这天，留日同学会假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室召开会议，到会十七八人，会上由童冠贤宣布了同学会的相关职员名单：总干事：童冠贤；副总干事：吴涤非；会计：王善之；书记：陈铁卿（陈钢）、刘东美；庶务：高仁山、江安甫……周恩来被获准辞去评议员一职，使他如愿以偿。此外，攻击《南开思潮》的事，也因他的反对被取消了。一天下来，心境不错。孰料晚上刚回到住处，房东又来向他索取房钱，生活的窘困使他沮丧。第二天，他设法将房钱如数交给房主。

“对不起……”女主人梳着大圆髻，穿一身棉铭仙织花的和服，躬腰含笑，不再多说一个字，踏着木屐匆匆走开。

见房东前后的不同脸色，周恩来感到日本人的眼光真可谓又小又贱了，他对日本社会的观察又深了一层。

新年后，一个星期倏忽过去了。周恩来的日程，不外是补习日文，往基督教青年会取信、看报、会友，直到昨天，东亚高等补习学校开学，他去了单人教授办公室，上了一个钟头的课，这位日本先生对他多有指点，且颇有耐心。

今天，他照例去学校补课，刚进教学大楼，校役递给他一封家信，他忙拆开，“八叔父故去”几个字赫然入目。噩耗袭来，倏然间，他心中不知是痛是悲，木愣愣地捏着信，倚墙站着，仿佛失去知觉似的。想起爷爷膝下四子，嗣父在他一岁去世，而八叔幼以疾废，缠绵病榻30余载。民国6年（1917）秋曾有“病危”之闻，急得四伯父驰电问讯，距今一年多，八叔身体时好时坏。自己来到日本后，淮安消息不畅，可他对八叔一直思念在心，没想到竟盼来这个信息。他不禁发出浩叹：“天不谅人，叫我们这支四房头鳏寡孤独全都占全了，真是可怜可怜到极点了！”

午后，张蓬仙、王朴山、吴涤非和童冠贤闻知，都来慰问，使他感到友情的温暖，只是悲愉的心境一直在延续。第二天（9日），他的日记写下这样的文字：

“（修学）东南西北，鳏寡孤独。

“想起家中一个紧要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近几年来八伯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有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是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呢？简直说是穷死了。”

接连三天，周恩来沉浸在八叔病故的伤痛之中，夜里总睡不着，愈想愈难受。淮安家里不知如今是什么样子了？四伯父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自己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父和生父做点事。可处在今天这种地位，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再说，假若去年暑假后不来日本，留在国内，一个中学毕业生又能做多大的事呢？那样，恐怕于家里既没有帮助，于自己反倒有害了。八叔病故诚然是悲痛的，而佛于己又有何助？见小利而大事不成，倘若总想着自家的事，那么，当年信誓旦旦“济世穷”、“图破壁”岂非成了一句空话？

此时，他搬出了玉泮馆，每天饭食总在外边零吃。为了省钱，接连往各处食堂去试口味，有时觉得很不好吃，不过，钱是比包饭省多了。此后，他

又改吃两餐，废止朝食。换了赁间之后，用度既省，地方又清静，正是埋头用功的日子，任什么事，他也不管了。他在努力摆脱自己的迷惘，在此后日记的“修学”栏内，他连续多天写下“行其心之所安”、“人定胜天”、“尽人事”、“白发衰颜非所意，壮心横剑愧无勋”、“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样一些韬励、豪迈的句子，与月初之心境已是大相径庭。在东京，他跟朴山、蓬仙等仍频频接触，与国内信函不断，四伯父、生父、八弟，仇乃如、李福景、潘述庵等都有信来，尤为使他感动的是，沈阳东关模范小学的高亦吾老师知道他日用不充分，来信表示自己愿兼差，每月接济他，这位先生一直为他所敬重，可是，一个小学教员，收入不丰，他岂敢惊扰呢？遂作复，婉谢加诸感激。

一天晚上，他独坐赁间，又拿起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当读到“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几句诗，他的眼泪快出来了。想到梁启超做这诗时不过二十七八岁，而自己如今已痴长19岁，仍一事无成，学还没有求到，实在是愧前辈了。不过，天下事没有不预备就能成功的。他又想起十年前留学日本的学生，坏的不说，知道爱国的人，大半分为两派，一派是服从革命，一派是赞成君主立宪。诚然，这两派全是希望把国家弄好，但因主意不同，竟互相攻击。激烈派看着稳健派没有大出息，有奴隶性，极力排斥；稳健派看着激烈派暴跳乱骂，毫无建设思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持着反对的主意。这两派天天打着旗子排斥人，究竟他自己预备了没有？结果还是毫无实力。等到回国做事的时候，一个个的狐狸尾巴都现出来了，哪里还能为国呢？

周恩来于国事的思考，如蚕丝般细密而延绵。

他想到，国内现在政界做事的人，除去老官僚旧武人以外，大半就是当年留东的两派人。可是，这六年来的成绩是这样子了，以后的情形还不敢预料，单说激烈派，自从革命以后出了两次风头，毫不容人，气盖一世，到临事是一败涂地。要说他们不爱国，是真冤枉他们。但是，其心可款，其行可诛。至于稳健派，每遇着得意的时候，多半跟着就是失望的事情。如二次革命后，帝制取消，复辟失败后，多半是他们得意的时候，然而不久必然是被人家推倒了，此外，如同老官僚旧武人等，更是脑子简单，无可救药。看起来他们这两次失败的原因，大半是从前没有预备，才闹出这样的结果。如今，国内政局，多半仍是这两派人支配，至于留西的学生，全部都在这两派统治之下。不然就是自命清高，在办教育。然而教育机关必须受到行政的分派，到底还是没出了留东两派的范围。若论这两派留东时没有预备的事情，求学不足还是小事，最大的就是没有真正立身的根本去与这个恶劣的社会交战。所以，每临到自己头上，一战就败。平常任他骂人夸嘴，自己上了台，依然是不行。这并不是旧官僚的厉害，手段比别人高，武人的枪炮指使，还得说自己的力量薄弱，经不起抵抗。

由国事和历史引发的这些思考、使周恩来受到深刻的启迪，1月2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19岁，依上说法，周岁。

留东：即留学日本。

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1913年孙中山继辛亥革命后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的战争。

留西：指留学欧美。

“论起这个，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求学，第一件事情就得炼铁石心肠，钢硬志气，不为利起，不为势屈，才能有效。要是连自己还靠不着自己，那就莫如快死为妙。”

虽说周恩来心忧国事，但现实问题是，高师考试快到了，如不加紧用功，不要说丝毫没有取的希望，就是下场再考的希望，恐怕也没了。他告诫自己：“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然而，周恩来仍沉静不下来。几天后，张蓬仙由国内结婚返回东京，谈到有关东三省已入日、俄势力范围的种种传闻，王朴山的吉林老家也有信来述及这方面的事，这使三人都感慨不已。

“拿现在国势论，欲救东三省是非常的难了。不救，则关系到中国全部危险。”周恩来说。

“可现今中国国力能行吗？”张蓬仙接道。

“难矣。”王朴山摇了摇头。

“东三省不必仰仗腐败的中央政府，而要自谋出路，招收红胡子、造枪炮，先从军政两方人手，如果能练兵14个兵团，日本就不足怕了。”周恩来说。

“恩来，你这是‘军国’主张。”王朴山说。

周恩来笑而未答。是的，这是“军国”救国主张，并非他一人才有，在国内亦是颇为流行的。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将来的政局非励精图治，在军事上头着手，除此不能将“北洋系”和“士官系”军阀推翻……

三人都未及弱冠之年，这样的交谈当然还得出什么结论，他们仍在探索、在思考。

时间匆匆，眼看已临近旧历年岁末，窗友中，高仁山因家里有事已回国，而严季冲也因为要准备赴美深造而离开日本了。周恩来与严季冲不同级，他在南开时，季冲已毕业离校，但因其父严范孙看重周恩来，两人相识后竟一见如故。恩来到日本后，季冲待他如同亲兄弟一样，一切的帮助是很尽力的，恩来对他一直感激得很。未想到，这样好的人，却不能再聚，从此天各一方。想到此，他心中实在不好受。但他是个有自持力的人，无论是在奉天东关模范小学或天津南开中学，每当困惑、迷惘、情绪低落的时候，头脑中便盘旋起“立志”的事，孟子曰：“夫志，气之帅也。”他焉能失去这“帅”？

这时，在美国留学的孔云卿给他一封信，引发他一番感慨。

云卿写道：“……留美学生有一种习气，好出风头，弟视之如上海时髦，攫得一会长、书记，便以为大功业就，即此归国，便可骗人骗钱，阳面公，阴面私，造成一种最时兴争权夺利之人物……”

留学，无论是到日本、到美国，原本是学成之后，以自己的知识技艺，去挽救祖国的危亡，周恩来一直是这样想的，也希望留学生都能这样。可是，留美学生的现状竟如此糟糕，闻之，心中实在难受，这与现在留日学生没有区别，只是，从表面上看，留美的主稳健，留日的主激烈。自然，激烈的回国去到底不如稳健的香，受人欢迎。由此可见，留美学生的手段本领要比留日的高。

然而，留学生也并非人人如此，云卿信中还说：“真正的志士实在是到

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

红胡子：指西洋人。

处都有，不过不爱出风头，就没有人知道了。”这话，他是极赞成的。

外面婷婷袅袅飘着雪花，小院内一株弱柳已被压弯了枝头，周恩来仁立在窗前，思绪一如纷飞的雪片。他想，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有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者极力反对。这样的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不足论，然而当他活着的时候，总要想把他所办的事办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

正想到这里，王朴山扣门来访。他说：“朴山，你来得正好，喏，刚收到云卿的信，你看看。”

王朴山在门道边搁下伞，一脚跨进门，急切地看起云卿的

“阳面公，阴面私，争权夺利，人性之丑恶一至如此。唉……”朴山读罢叹道，“不爱出风头固然很好，还需有坚韧不拔之志，是不是？”

“太对了，”周恩来应道，“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穷’，我极赞同。所谓‘愿’即‘志向’，人生在世，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老实说，活着一天，吃还能有完的时候吗？穿还能有完的时候吗？至于国家社会的事，那更是无穷无尽的了。所以，世上人的志向，是永远没有做完的了……”

“是啊，恩来，我始终相信，你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志士

“我？噢，我自然要朝这方向去努力。”周恩来目光一掠，“朴山，你怎么不说自己呢？”

“我跟你不同。”

“有什么不同？”周恩来直嚷，“难道我们不都是为着救国、爱国吗？”

“这话诚然不错。”王朴山苦笑笑，“旧势力本已十分强大，而口口声声与旧势力斗争的，又是一般假公济私、行其奸险的人，而且，留学生中也不乏其同类，难啦！”

“朴山，我跟你一样，以为这种假公济私的人可怕得很，中国要亡，必在他们手里。”周恩来说着在房内转了个圈，“可是，我们总不能听之任之。我们非但要警惕其行骗，更应反对啊！”

“我是立定主张，自己决不做这类人。”王朴山说，“救国、爱国，我当然也不会置身度外。”

“你啊，”周恩来笑道，“我了解你。我们换个话题，怎么样？”

“哎，恩来，咱们能不能歇一歇脑筋？”王朴山说，“我原本是想约你去上野公园观赏雪景的。”

“那这就走！”

“你没见已是日暮时分？”王朴山瞅着窗外晦暗的景色说道，“你一入话题，就忘了一切。算啦，我得赶快回去，妻还等我吃晚饭哩！要不，你也过去一道用餐？”

“不，不，我送你一段。”周恩来说着，取了一把伞，和王朴山出了门。

雪，愈下愈大，一盏盏街灯，在浑沌中亮着朦胧的光，尽管街道两边毗邻着高高矮矮的建筑物，依然能感到寒风凛冽。

“啊，真冷。”周恩来不禁说道，“古人云：寒不能语，舌卷入喉，怕正是这种时刻。”

“寒不能语，舌卷入喉。”王朴山重复道，旋又发出嘿嘿的笑声，“恩来，别送了，快回去……”

孰料话未说完，不意撞到一个日本男子身上，那人瞅了瞅他们两个，骂道：“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说完，猛地推了王朴山一下，转身走开。

“你……”王朴山先是一愣，接着紧跟了两步，想上去理论一番。

“算了，跟这种人不值得计较。”周恩来劝道，“可是要记住，这就是我们中国和中国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

“娘的……”王朴山狠狠地骂了一句移动脚步归去。

周恩来目送着风雪袭裹中王朴山单薄的身影，想起刚刚过去的一幕，沮丧中颤动着忧愤。他不能不想到中国之命运，可是，救国之道在哪里？一个穷学生，迄未取得入学资格，空谈救国、爱国又有何用？一时间，他陷入茫然……

回到货间，他显得无所事事，不意目光又碰到小几上伉乃如的信。乃如虽是他的老师，相互间能推心置腹，犹如兄弟，这封信，乃如诉说了自己婚姻的苦恼，那番滋味实在难堪。他不由得又拿起信看了一遍，竟生出“自由恋爱无男女，人生何必有妻孥”的想法。未几，取出日记写道：

“……我想人生在世，恋爱是一种事，夫妻又是一种事。恋爱是情生出来的，不分男女，不分美陋，凡一方面发出情来，那一方能感应的，这就可以算作恋爱，所以马狗都可以有报恩的事体，至于夫妻，那纯粹为组织家庭，传流人种的关系，才有这个结合。”

室外流动着风的呼啸，日本深冬的夜晚是相当寒冷的，他呵了呵手，想了想，接着往下写：

“不过夫妻由恋爱中生出来的，是真夫妻；若随旁人的撮弄，或是动于一时感情的，这个夫妻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价值。按着这理推，是恋爱的范围广，夫妻的范围狭，恋爱里可以有夫妻这一义，而夫妻绝不可以包括恋爱的。”

这，便是20岁的周恩来的爱情、婚姻观。

除夕，王朴山、张蓬仙应邀到周恩来的货间相聚，三人无所不谈，谈时局，谈人生，谈家国之念，思亲之苦，不免又生出许多感慨，直到凌晨3点才睡。

只是，周恩来睡不着，一晚上当着两位挚友的面，他不愿多谈自家的事，怕勾起他们的伤感，冲淡相聚的欢乐。

灯熄了，他静静地躺着，思绪纷纷。此时此刻，四伯父身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身边无一亲人，那是何等孤寂！生父呢，奉事北京，每月的薪水仅够自己用，连一件皮衣都买不起，听说北京今年的冬天特别冷，光凭一套单薄的棉衣，又怎能御寒？至于吃，也吃不着好的，他这一辈子总是这样捱过来的。淮安的八婶，自八叔死后，心里头也不知难受到什么地方。想到弟弟妹妹，尤其伤心。弟弟真可怜，有爹爹，却远在北京看不见，有他这个大哥，却又远在日本更不能照管，心里的难受又不知怎样呢？至于天津的四伯母，在这年关不知担多少愁，挨多少骂呢！……唉，这个家实在是极难堪了，东南西北，分散各处。比较起来，还是自己处境称优，们心自问，真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忽然，他又想起爷爷奶奶、嗣父嗣母，听说他们的坟无人过问，棺材都暴露在外日晒雨淋，这是怎样痛苦的人生啊！他愈想愈难受，恨不能立即回国，为家里处置这些事情才好。可是，他回不去，他要考试，首先取得入学资格，将来才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破壁”、

“济世”……直到淡青色的黎明悄悄降临，他才迷迷糊糊入睡。

最近，周恩来依然细心地观察日本国情。他发现日本也是实行军国主义的国家。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以扩张领土为最重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怕难保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看来，军国主义在20世纪上，是绝对不能存留了。周恩来如此一想，联系自己从前所认为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实在是大错了。20世纪的进化潮流上，要不国家主义、世界主义，那是自取灭亡的，可是，国家主义、世界主义于中国能行得通吗？他未作深入的思考。

社会、人生是这般复杂，“无生主义”似乎解决不了周恩来的窘困，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牟尼所说“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可长这么大，要将与自己有缘的一一断绝，他却不能，哪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无生主义”诚然高超，然而却难以实行，既如此，又何必自寻烦恼，只好疏离它、摆脱它。他将家庭不幸所引起的苦闷放在一边，“埋头用功”迎考，同时，于国家大事，他否定了“军国”救国之道，以一种较为轻松的心情，迎来了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这天，他写下了不寻常的一页日记：

“我们家中有两句俗语，‘大年初一不高兴，一年晦气。’现在又是大年初一了，叫我高兴我从哪里高兴起，叫我不高兴我的不高兴的事情可多了。守着家规暂把那不高兴的事情不去想他，先乘着今天是元旦，立个这年内应行的方针。我平生最烦急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我嫌他是多事，今天我也立志了。但是我这志是早定了，不过今天想的是这一年内进行的方针问题……我先把它写出来，做个旧历元旦的开笔篇吧：第一，想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周恩来将这一方针谓之“三个主义”，并以此勉励自己、规范自己。天地混沌，世事芜杂，周恩来有过迷惘，但他没有停下脚

步，更没有倒退，而在摸索中前进。尽管步履不那么迅捷，也不那么坚实，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一步步走向真理。

自元旦确定他的“三个主义”后，为了寻找“新的思想”，周恩来广泛涉猎各种书籍报刊。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仍为他所偏爱，其中如《新民说》等诗文，他已熟读成诵。可是，时代毕竟发生了变化，梁氏的思想观点，与现实的距离拉得愈来愈远，显然，周恩来对此已不满足。他翻箱倒筐，《新青年》忽又重现于他面前，他取出想再看看。

《新青年》，最初叫《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正值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期间。它一出版，即使沉寂的中国思想界显示出生气，但并未引起周恩来的特别注意，“有时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烟云，随看随忘的”，他后来曾这样回忆。离津赴日前夕，有位朋友送了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旅途中他翻看过，倒还喜欢。后来，在东京，从严季仲那里又见到《新青年》第三卷全部，索性借回阅读，颇受启发，“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但未继续寻找再读，这与初到日本时的困窘和

心境不佳有关，而且，“无生主义”和“军国”思想仍困扰着他，又有何心绪关注这份杂志呢？

一个人举凡接受一种学说或一个主义，总不是无缘无故的，需要有诸多的主客观条件。当他从一种愚昧、荒诞、错误的学说或主义中碰壁，而感到极端苦闷、失望之后，才有可能弃旧图新，去探寻另外一种学说或一个主义。这大概也是个规律吧！

《新青年》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宣扬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反对保守落后的人生观，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有力地冲击着仍弥漫于中国的封建主义。此外，它对于封建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予以批判和否定；有的文章还否定了封建宗法制的重要一环——家族制度。

周恩来手头这本《新青年》上，就有一篇题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的文章，它是吴虞写的，其中有这样精辟的论述：

“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几无一事不会有阶级之精神意味，故二千年来不能铲除阶级制度。至于有良贱为婚之律，斯可谓至酷也。守孔教主义，故专制之威，愈演愈烈。”

这里，批判已进入到封建伦理的父子、夫妇等许多方面，而锋芒所向已直指孔子本人，其大胆，可谓前所未有的。此外，该刊还有一些宣传新思想、批判旧礼教、鼓吹个性解放、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同样吸引着周恩来。掩卷沉思，他不由得喜欢起半年前南开学校毕业典礼上那个冷峻、难以接近的陈独秀，他觉得当时似乎有点误解了他，因此多少萌生点内疚。如今，正是这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予他以思想启迪。他想起赴日后的种种曲折经历，眼前忽然豁亮。

这天，2月15日，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在日记中写道：

“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

此后几天，他继续阅读这份刊物，思想一直萦绕在它所带来的联想、反省、检视之中。

次日，2月16日，日记中这样写道：

“……收练了几天，这个月以来觉得心里头安静了许多。这几天连着把三卷《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来到日本，所谓的‘无生’主义虽然是高出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的，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2月11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对抗，也不可借旧有的去恋念它，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他的情绪一直处于亢奋之中，他已与“无生”主义决裂，不再像达摩那样与世绝缘，他要直面人生，积极进取。此种心境，在2月17日的日记中有所反映：

“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以前的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我

吴虞（1871—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五四”运动前后，在《新青年》误马文章，大胆冲击旧礼教和封建文化。1920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晚年任职四川大学，1949年在成都病逝。遗著有《吴虞文集》。

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

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

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了，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了。法国女优倍那儿常说自己是小儿，我今天借用她这句话，我看我自己现在实在是小儿了。哈哈！”

接着，18日的日记又写道：

“……我说我现在心里非常快活，想起我从前所‘思’、所‘学’、所‘行’，实在是无一可取……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

他的思想现状，正应了三天前日记开头“修学”栏里的那句诗：“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他已摆脱了迷惘，克服了苦闷，不再是初抵日本时的周恩来了，他的欢快可想而知。

“红日东升”，表明他已开始接受《新青年》所传播的新思想，但他并未因此而陶醉，而是清醒地看到“风雪残留犹未尽”，那种难遂人愿的事仍随时可能出现。

此后几个星期，周恩来投入了“背城一战”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日期为3月4日至6日，科目有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和博物，还进行了口试，结果，名落孙山。这对他无疑是次不小的打击，但他并不颓丧，较能平静地对待，似乎这在预料之中。尽管未能考取，但经历了这番考试，对于日本官立学校考试之内情，稍为明白了点，题目也知道怎么出、怎么答了，有了这种经验，7月间再考第一高等学校，心里觉得有点门路了。如此一想，虽然为这次考试忙了许多天，也不算白费劲，到底是功夫没有白用的。

跟他同时报考“高师”的张鸿浩被录取了该校物理科，他为鸿浩庆幸和祝贺。但鸿浩却另有想法，希望进第一高等学校，他的愿望是学工科。可是，如报考“一高”，则必须从“高师”退学，退学并不复杂，但退学后能否一定考取“一高”呢？鸿浩没有把握，他踌躇不决，找到恩来商量。

“你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愿，”周恩来说，“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与个人在哪一方面能发挥更大作用来决定取舍。你既然能考上‘高师’，为何怕考不上‘一高’呢？”

“对，我不能去学自己所不愿学的东西。”张鸿浩应道。

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张鸿浩毅然退掉了“高师”学籍，努力准备，与周恩来一起迎接7月间“一高”的考试。

周恩来深知“一高”比“高师”难考，3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以为7月里考第一高等学校，功课若不预备好了，定然没有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为此，他制定了一个课程表，每天睡觉7小时，读书13.5小时，休息和其他一切事情3.5小时。星期天，除跟朋友交谈外，也不忘找个清静的地方，或是公园，或是郊外，带着书去看，一毫的杂念也不去想，全力以赴，为了那关键的7月。

可是，客观现实却又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说是朋友的来往、阅读的报纸都要减掉，可是，朴山、蓬仙、涤非等仍时相往来；同学会的事又不能完

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

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

全拒绝；信函又多，作复也要化费时间；李福景函约他为《南开思潮》写篇小说，他不便推辞。他忙不胜忙，日子一天天浑然不觉地过去了。

岛国的4月正是暮春，柳絮乱飞，子规乍啼。

中旬，严范孙和张伯荃联袂访美，在东京稍作逗留。南开的留日学生纷纷前去拜望，周恩来自然不落人后，匆匆赶往严、张下榻的旅社。在这里，他还见到了随侍严、张访美的严季冲，令他好一番激动。半年后的重逢，师生间有许多话要说，可到的人多，没个中心话题，无非是叙说别后彼此的情况。随后，周恩来、童冠贤、王朴山等陪同严范孙和张伯荃游了上野公园。

上野公园，是东京的一处游览胜地，鸡爪枫、机树、银杏……遍植园内，葳蕤茂盛，呈现出浓郁的绿韵。尤其令人赞赏的是那连片的垂樱，那淡红华丽的色彩，仿佛浓缩了京城之春，树上开的灿烂夺目，地下却连一片落花也没有。游人如织，赞赏之声不绝于耳。

“啊，难怪日本人称之为‘国花’……”严范孙不禁感叹。

“日本赏花习俗，据说在奈良时代即已出现，距今有了千余年的历史。”周恩来说，“有一首诗写道：‘大地天光照，春时东事隆。此心何不静，花落太匆匆。’花期短暂，当开时开，当谢时谢……”

“是呀，是呀，”张伯荃观赏良久，接过话说，“这叫有所为，有所不为，它将一生的美丽和柔情，化作一时的绚烂和夺目，倏又飘然离去，让人在惆怅中留恋不已。”

“日人还有一个说法哩，”王朴山凑近严范孙，“即‘花数樱花，人数武士。’”

“把樱花比作武士……”严范孙抹了下唇髭，没说下去，目光却移向了周恩来。

“日本古代武士几无例外地都酷爱樱花，在他们看来，人生如樱花一般短暂，则应活得像樱花一样璀璨美丽。”周恩来似在解释，“一些武士在事败后，往往选择在樱花树下切腹自戕，以示像樱花凋零般壮烈。”

“呵，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喜好，就具体人而言，喜好也并不一致。”严范孙笑道，“恩来，你见过我家院子里那株梅花吧，对它，我可谓情有独钟。你看它笑傲冰雪，无意争春，生得清幽，死得凛然，展现了不屈不淫、澹泊高洁的风骨，此乃是中国之国魂也。”

“严范老之说，甚合吾意。”张伯荃沉吟道，“不过，我想，人之喜好，或许也会因年龄而异，年轻人往往喜欢樱花，而老年人则喜欢梅花。”

“校长是说在中国吧？”周恩来说，“在日本则不尽然，喏，看——”他手指处，有几个日本老人正杂在人群中，在草坪上面对一株繁茂的樱花树，婆娑起舞，他们和年轻人一样，舞动着手足，跳得如痴如醉……

严范孙、张伯荃驻足观赏了片刻，旋即参观了公园内波荡水藻的池沼和清澈见底的溪流，之后才尽兴而归。

三天后，吴瀚涛自京都来，周恩来又陪同去见严、张二位，只见满屋子都是人，东拉西扯，相谈甚欢，直到天色四合，吴瀚涛等才散去。严范孙要周恩来留下，这使他感到非常高兴，从两位先生那里了解到南开的现状和他们此番赴美考察，意在改良南开教育的想法。两位先生问到留日学生的种种，他则据实告之。他坦言了报考“高师”的失败，却未说及自己曾有过的苦恼和迷惘，也隐瞒了经济上的拮据。

“恩来，你下步打算是……”张伯荃关切地问。

“再考‘一高’，还有两个月的准备。”周恩来说。

“那你要抓紧时间温课迎考，”严范孙说，“季冲熟悉东京，你就不必陪我们了。”

“既来留学，无论如何要考上，接受高等教育，对人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张伯苓接着说。

“这我知道，我想，只要我的志向坚，所期望的事没有不成的。”周恩来笑道，“再说，两位先生难得在东京逗留，每每想起你们一贯对我的关照、爱护，陪陪你们也是应该的。”

“你要合理安排才是。”严范孙不想拂了周恩来的好意，叮嘱道。

翌日，周恩来又陪同严范孙、张伯苓一行游了浅草公园，只是，游人虽众，樱花已残，与四天前在上野公园所见大相径庭，意趣迥然。

归途，他们拐进一家门口挂着印有汉字帘子的日本小吃店。众人坐下后，季冲点了寿司卷、煮牛蒡、甘薯泥、栗子甜团，外加啤酒生鱼片。

未几，身着和服的年轻女子，垂首持盘靠近餐桌，双腿跪下，将食品一一放好，口中叽哩咕噜地说着，声音柔弱，竟听不清说了什么。严范孙见状，不禁笑了起来。

邻桌有几个日本人正在举杯对酌，并不见豪饮，而是抿一口酒，夹一片生鱼，吃相从容优雅，吸引了严范孙的目光。

“父亲，”季冲笑道，“我们也来喝酒吃生鱼片。”说着，他将山箭未放入酱油碟子，放在严范孙和张伯苓中间。

生鱼片白中带红，色彩鲜艳，看上去颇能引人食欲，可是，两位老人也只望望而已，总伸不出筷子。

“喝点啤酒，吃寿司卷吧！”周恩来边说边作着解释，“这寿司卷，用紫菜卷米饭，在米饭里放生鱼片、黄瓜、菠菜、香菇、葫芦条等，据说，味道不错哩！”

“‘据说’？你没吃过？”张伯苓看了看周恩来。

“啊……”周恩来笑而未答。

“那么，恩来今天就多吃几个。”严范孙说着也夹了一只尝了起来。

“味道还可以，”张伯苓尝后说，“不过，总还不如中餐好吃。”

接着，又都随意地品尝了其他几样食品。

餐毕，周恩来将严范孙、张伯苓送至旅社这才离去。

一夜过后，周恩来第三次登门，不过，交谈对象已换成严季冲。季冲谈了自己留美后归国从事实业、报效国家的夙愿，对周恩来也寄以厚望。

“我现在是实行‘素食’、‘不婚’两大主义，”周恩来说，“这样，生命不用说可以延长好些年，就是我那‘报恩’后离去世界的念头，也觉容易行了许多，思想起来我觉得非常痛快了。”

“恩来，你怎么这样说？”季冲惊愕道，“你实行两大主义，我无异议，‘报恩’的想法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报恩’后离去世界却不对，你是不是仍在信奉‘无生主义’？”

“啊，不！”周恩来摇摇头，“我这人凡心未收，尘缘未了，‘无生主义’于我无益，不过，我承认，它仍残留在我头脑里，偶忽即冒了出来……”

“恩来呀，可见人的醒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啊——”周恩来一摆头，“请你相信，我不会轻易离去世界的，我还有太多太多的事要去想，去做。”

“你应当把《新青年》多看几遍。”

“对！”周恩来来说，“我已抱定决心，想要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新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这就好，我听了太高兴了。”季冲一脸笑容，“那么，眼前，你务必考取‘一高’。”

“我会尽力去做。”

这天晚上，留日南开同学会 20 人，假神田“汉阳楼”聚会，严范孙、张伯苓欣然出席，觥筹交错，畅谈甚欢。

此后两天，周恩来独自留在赁间温课。20 日，是严范孙、张伯苓一行赴美的日子，他不得不放下书本，和吴瀚涛、童冠贤一道，将他们送上轮船，挥手作别。

这之后，心该沉下来了吧？周恩来这样问自己，也想这样去做。可是，都市里盛行的音乐会、博览会、马戏等，有同学相邀，他碍于情面，不好不去。此外，报刊仍对他有巨大的诱惑力。报上披露，日本政府向中国又提出“二十条”，加紧对中国的掠夺，而中国政府却“愤愤然”，这使他为之忧愤。一份《露西亚研究》杂志，则把他的思想牵引到俄国的党派纷争中去，这个北方邻国正在发生的事，引起他浓厚的兴趣……这一切，对于他的备考不能不产生影响，他能否如愿考取“一高”呢？且等着看吧！

2 动荡的五月——新中学会——回

国探亲——吴瀚涛——《社会问题研究》

——京都之旅——别了，日本！

风谲云诡，4 月初，从国内陆续传来消息，说是日本乘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德国政府单独媾和之际，准备同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日华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内政。有此藉口，短期内进入东北的日军即达七八万之多，日本迅速取代了沙俄在东三省北部的殖民地位。这事给有民族意识的中国留日学生以巨大震动。

周恩来尽管在温课迎考，却不能漠然置之。他在日记中写道：“阅英文报，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中国矣。”“早起因思昨日日本要求事，我政府尚愤愤，奈何！”

其实，早在去年 8 月，段祺瑞政府向德、奥宣战后，即愈加投靠日本，日本内阁则利用其在大战时所赚的大量资金，对中国进行侵略性投资，以控制段祺瑞政府，而段遂将铁路、矿产、森林、电讯等诸多权益出卖给日本。他又利用日本的借款和军火，并由日本军官训练皖系部队，以扩充皖系军阀势力。这些，也并非什么秘密。

进入 5 月，国内时局越发让人忧虑，段祺瑞的卖国行为比袁世凯有过之无不及，5 月 2 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

现实的危机，迫使中国民众掀起了又一次大规模的爱国运动。

在东京，先是“一高”的中国留学生倡议全体中国留日学生悉数归国，以示抗议。他们派出代表四处游说，发出传单征求各省同乡会、各校同学会的意见。其他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响应，有的学生甚至破指写下血书，表示抗争的决心。

“恩来，给你——”一天傍晚，王朴山闯进周恩来的赁间，喘息未定塞给他一张传单。

“《敬告中国留日学生书》……”周恩来念完，目光焦灼地移动着：

“……倭奴的野心!!!亡国的惨祸!!!诸君!!!其速归国!!!速救祖国!!!……
诸位热血沸腾之志士，祖国危急，岂能坐视！诸位从速归国！而祖国前途敢于断言：国民决心使祖国不亡，则祖国必不亡，诸君勉之……”

读罢，他已是热泪盈眶。

“我们怎么办？”王朴山望着他。

“应当取一致行动，回去！”周恩来捏紧拳头说，倏尔，“可是……”

“回去难道是唯一的选择吗？也得有人留在东京。”王朴山说，“其实，我现在想的不仅是救国，想得更多的是你。”

“胡说！”周恩来怒斥道，猛可里觉得自己失态了，正当王朴山惶然之际，他一下拥抱了朴山，声音颤抖着，“对不起，我知道你是为我好……”说着，泪水潜潜。

“恩来，”王朴山也落泪了，“你不能放弃‘一高’的入学考试。”

“好兄弟，听你的，”周恩来凝睇着王朴山，“让我们在东京推动爱国、救国运动。”

5月5日，留日各省各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以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决议成立“大中华民国救国团”。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对会上议决的多项“组织方法”，无不赞同，并在当日日记中详作记录。第二天，“救国团”40余人，在东京神田区中国饭店“维新号”楼上秘密集会，孰料，日本警官和侦探数十人突然持刀而入，拳打脚踢，将与会留学生全部双手反缚，送往西神田警署，途经中华青年会门口时，许多中国留学生从楼上窗口往下望，对日本警方的强暴和侮辱，无不义愤填膺。

5月10日，中国记者彭翼仲于8天前，从轮船上蹈海报国的消息传来，周恩来悲愤难抑，在当天的日记中录下了彭翼仲的两句绝命诗：

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

为了救国，不作亡国奴，彭翼仲不是第一个蹈海而死的，早在1905年，陈天华即因国事蹈海自沉。这种悲剧性的壮举，使周恩来深受刺激，他怎能沉埋学业，于家国不顾呢？

16日，段祺瑞政府无视国民反对，与日本政府秘密签署了《日华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引起留学生无比激愤，罢学归国者达千余人。但日本人假造“中坚会”传单，进行挑拨离间，少数反动学生散发署名“归国同人”的公启，警告爱国团体“救国团”和“铁血团”……

斗争变得复杂、尖锐，但恐吓和镇压都不能阻止爱国潮流奔涌向前。留学生举派代表面见日本文相、外相和警察总监，提出质询。外相发言，竟说日华协约无他事，仅关系于西伯利亚出兵问题，军事行动当然得守秘密，报纸尽属虚构。想以此诡辩来蒙混留学生。此后，日本一家杂志载文《支那民族性与豚性之研究》，对中华民族恣意低毁和诬蔑，以配合日本政府的侵略行径。中华青年会的余偕玉将此文公之于众，激起了留学生的公愤……

周恩来不仅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和变化，而且，卷进了这场斗争的漩涡。5月19日，他毅然加入了爱国团体“新中学会”。

陈天华（1875—1905）：近代民主革命家，字星台，号思黄，湖南新化人。1903年留学日本，参与组建兴中会、同盟会。1905年12月，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取缔韩清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愤而投海自杀。著有《猛回头》、《警世钟》。

“新中学会”是以天津南开学校和天津政法学校的留日学生为主建立起来的，中心人物童冠贤、高仁山均是南开的，比周恩来早到日本半年，彼此是熟悉的。

童、高提议组织这个团体，意在“敦品励学，积极救国”，并以复兴意大利的三杰事迹以自励。其《会章》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礪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

所谓“刷新中国”，即改造中国。

但怎样改造中国，答案并不明确，大致是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之类主张。

“新中学会”吸收会员很慎重，注重会员品行是否纯正，同其他会员是否相知有素，感情笃厚？学会规定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胆忠心为国为民，且含有热烈勇敢、赤诚相见的意义。这些，周恩来自然是接受的。

这天，在中华青年会会馆，周恩来借入会的机会，作了一次讲演。

周恩来分析了中国衰弱之原因，对比了中国与西方文化之差异，并探讨了中国的出路。

他席地而坐，看了看济济一堂的同辈，说：

“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东西的文明所以能够发达的原由，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

周恩来见众人都甚感兴趣，遂敞开思路，继续阐述自己的想法：

“再说我们两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是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族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叫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

这里，周恩来指出了西方发达乃源于变革（“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和“竞争”，而中国落后乃由于僵化（“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和“保守”，而儒学思想（“一孔之见”）的 2000 年统治则是问题的症结。在他看来，只要变革，竞争，中国一定能摆脱被奴役之地位，比“泰东西”（东、西列强）要强万倍。这实在是极有见地的理性思考。

在演说中，周恩来表示：

“……我刚入会，见着这个‘新’字，心头非常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有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

接着，他分析了到日本求学的两大利害，一个是“主动的观察力”，一个是“被动的熏染力”，务求的应是前者，防止的则为后者。说完这两层意思，最后，他以两句要紧的话赠给大家，即：

“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新中学会”注重集体生活，在牛达区鹤卷町 141 番，租了个会址，有十七八间房子，名为“新中会庐”。每逢星期天上午举行例会，由会员座谈国家大事或个人心得。学会有严格的作息制度，不许无故迟到或早退，凡无故迟到者，只能站在一旁，等主席招呼后方能入座。会员除确有困难者外，都搬至“新中会庐”的宿舍集体居住。他们不用杂役，凡烧饭、洗碗、看门、打扫等一应杂务，由会员轮流担任。各人所有现款交公存储，众人按需支用，

不许浪费，经济比较宽裕者，还一次或多次缴讨互济金，帮助有困难的会员解决学膳费。

周恩来和其他会员一道，参加了在“新中会庐”和中华青年会会馆等处召开的留学生反日爱国集会，他书写传单，起草宣传文件，在集会上发表演说……

“新中学会”是个爱国团体，却不是革命团体，救国拯民缺乏明确纲领和行动规划，对此，周恩来并不满足。是的，他对这个团体的“新”，心里头有过“非常痛快”的感觉，但却是短暂的。国家现实的危机感和生活的困顿一直烦扰着他，未来的社会是怎样一幅图景，又该怎样去奋斗，在他思想上也较模糊，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情绪。

5月28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今日我心里头闷的异常，一个人跑到神田剧场去观新剧，为的是解闷。现在的家国艰难，友朋困苦的时候，我哪有心取乐？也不过是像‘对酒当歌’的意思，出出胸中的烦恼罢了！”

家国之忧，爱国之举，使周恩来对7月初“一高”的考试不可能作充分准备，终因会话（口语）不好，录取无望，心中难堪异常，他苛责自己“来到日本，还说不好日本话，岂不是太可羞了吗？这叫做自暴自弃，还救什么国？爱什么家呢？不考官立学校，此羞终不可洗”。进而发出“二十年华尘与土，愧对周郎”的感叹。

7月13日，他去“一高”看榜，寻找不到自己的名字，果然落榜。对此，虽说多少有些思想准备，可一旦成为事实，却又是一番心境。想起自己来日本的旨归，想起在严范孙和张伯苓面前的慨然表示，想起两位先生和亲友对他的期望，他陷入深深的懊丧和痛苦之中。整整半天，他在东京的街巷里盲目地转悠，直到天黑，他想去王朴山那里，走了半截，又转回来，疲软无力地进了自己寄宿的赁间，就地一躺，头脑里杂乱无序。突然，他一跃而起，拽亮电灯，从小几上拿过酒瓶，“咕噜咕噜”，将半瓶酒喝了个点滴不剩，醺醺然“嘣”地倒在榻榻米上

但懊丧和痛苦毕竟是短暂的，他并未被击倒，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他的目光又投向欧战这一关系到人类命运和未来的世界大战。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下了这场战争所化的军费，死亡、受伤、从军人数，真是万家忧乐在心头。

暑假开始了，7月28日，距“一高”看榜落第半个月，他离开东京回国探亲。次日晚抵下关，登船穿过对马海峡，于30日抵韩国釜山，经汉城、平壤，于31日跨越鸭绿江抵安东，再转车经沈阳、锦州、山海关、唐山，于8月1日下午4时到达终点站——天津。回津后不久，他即去母校，见到了思念中的马千里、仇乃如、张彭春等先生和好友李福景、吴峙之、潘述庵、陈颂言等，海阔天空，把晤畅谈，也不失为人生一大乐事。其间，他还去北京看望了生父贻能，谈了自己在日本的大致情况，只是瞒了曾有过的困顿和痛苦。父亲边听边问，勉慰有加，并和他至东安市场合影，使他重温了那份舐犊之情。此番相聚，稍减了他的思念之苦。可是，贻能又要去南京谋事，恩来凝望着父亲脸上罩着一层忧郁和无奈，脚步也不如从前矫健了。想到父亲半辈子就这样四处颠簸，像鸟儿似地在觅食，可终究与家无助，感慨、内疚

伴着父亲度过无数忧伤的岁月，而自己已届弱冠，却不能助父亲一臂之力，替他分忧，心中很难受。贻能和儿子先到天津，在贻赓家住了一宿，次日清晨4时即赴南京。儿子执意要送，贻能却只让送至巷口，望着父亲伶仃的身影悄然远去，想到自己青春年少，却家世难言，孑然一身，他的泪止不住流下来。

在天津又盘桓了数日，9月4日，周恩来黯然返回东京。这次，他还带了一位叫罗泽霖的南开同学来日本，并帮他在东京找了“贷间”，办了进预备学校等相关事宜。

在周恩来回国度假期间，日本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米骚动”，他回来时，斗争仍未平息，无论是报刊的文章，抑或街头巷尾的谈论，也都不离这个话题。他深入地进行社会调查，想弄个明白。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出口急剧增加，大笔资金流入岛国，引起物价暴涨，严重影响工人、农民的生活，劳资纠纷增加。年初，入侵西伯利亚，更使这种社会危机雪上加霜。

7月，富山县中新川郡西水桥町，有一百七八十个妇女袭击了米店和财主家，要求大米减价。

“发生妇女暴动”的新闻在《大阪朝日》、《大阪每日》等全国报刊一登，暴动立即扩大到日本列岛的许多城市和乡村。

8月9日，京都王生停车场的市区电车公司职员成了城市抢米暴动先锋。

8月12日，神户三菱造船厂工人暴动，遂有数万市民参与纵火破坏活动。

这一斗争迅速蔓延到东京，几乎各个阶层的人都卷了进去，这给日本政府以极大震动。鉴于一年前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俄国二月革命也是以首都彼得堡的“妇女暴动”引起的，日本内阁对这场全国规模的“米骚动”，出动大批警察予以镇压。

暴动、镇压，镇压、暴动……民众的血没有白流，寺内内阁被迫总辞，随后出现了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和普遍选举权运动的新高潮；工会和农民协会，进一步形成有组织的群众团体；社会主义政党也相继建立。这一切，使周恩来深受鼓舞，认为这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是“国民自觉的事绩”。

对“新思潮”，周恩来不仅关注，而且在思考。早在今年4月，他从日本出版的《露西亚研究》杂志上，即注意到了“露西亚”（俄国）的党派斗争，从中，他知道了十二月党人对沙皇的反抗，和推翻沙皇后建立的临时政府。他把俄国的党派分为三类，即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研究了各派之政治主张，特别注意社会民主党内的“过激派”（相对立的为“温和派”）。这一派“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他的行为大半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党魁就是‘赖宁，氏’。他并认识到“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他把这些写进日记，时为4月23日，距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仅五个多月。“社会民主党”、“赖宁”、“社会主义”这些属于“新思潮”的词语，第一次出现在他笔下。几天后，留学生们掀起了反对《日华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高潮，转移了他

赖宁：即列宁。

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

的注意力，对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探讨。而今，在“米骚动”中，他又翻看了那天的日记，重新阅读了《露西亚研究》，感受则大不同了。眼下的日本，各种西方思潮已纷纷涌入，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的时机，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竞相出现。尽管月夕风晨，雨窗花前，思念故国亲人而心情悒郁，可他对“新思潮”热情不减，远远超过4月间的初次涉及。他接连阅读了约翰·里德的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震动全球的十日》和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书刊。他还涉猎了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所有这些，开拓了他的视野，使他在比较中得到启发，明显地倾向于俄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这年10月20日，他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

“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西伯利亚寒流，越过北海道，早早地摇落了东京街道两旁的树叶，秋季尚未结束，冬天即已来临。

整个冬季，周恩来仍常去“新中会庐”，参加留学生的一些活动。在来回的路上，只要有时间，便到书店去搜罗介绍“新思潮”的书籍报刊，或在那里浏览，或购回细读。他已走出“落榜”的阴影，思家之苦也渐渐得以化解，并在考虑下一步行动。

其时，在古老的京都，有一个人总惦念着他，那就是南开同窗好友吴瀚涛，他来东京看望过周恩来，一再邀请恩来去京都。3月下旬的一天，恩来又接到他的信。

“……你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将化点时间谈谈你去京都大学一事。”吴瀚涛信中写道，“我曾多次问过你，但每次你都说不愿靠朋友生活。不管怎样，即使你不考虑我们在南开的友谊，可我们现在都是身在异国的外国人，我们不应该彼此帮助一下吗？”

信写成这样，周恩来还有什么好分辩呢？一想起能跟吴瀚涛夫妇朝夕相处，想到京都帝国大学和“帝大”有位河上肇博士，他难以抑制自己西行的念头。

这时，偏巧国内传来消息，说南开学校将开设大学部，周恩来的心怦然而动：既然在日本求学不成，何不返回母校再读？！他作了深思熟虑，去意已定，打算取道京都，在吴瀚涛那里住些日子而后回国。

周恩来的回国决定，很快在留学生中传开，朋友们都舍不得他离开，但谁都知道他的主张一旦定下，是难以改变的。

张鸿浩约了南开同学子鱼（王嘉良）和幕天（穆敬熙）一道，置酒为周恩来饯行。

四人各据一方，举杯畅饮，酒酣耳热之际，鸿浩搬走碗碟，擦净几案，然后放好笔墨纸砚，请恩来题字留念。恩来凝思一想，挥毫写下了当年东渡日本前夕作的那首七绝：

大江歌罢掉头东，遂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倏忽，又在诗旁附言：

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英文 guild 的音译，即“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系行会社会主义。

周恩来旅日日记手稿。

“右诗乃吾 19 岁东渡时所作，浪荡年余，忽又以落第返国图他

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轮扉 兄以旧游邀来共酌，并伴以子鱼、幕天，醉罢书此，

留作再别纪念，兼志吾意志不坚之过，以自督耳。”

周恩来人缘好，东京诸友中，为他置酒饯行的不独张鸿浩，一连几天，你请我邀，他置身在浓厚的惜别氛围之中。一天，王朴山来到恩来住的赁间，两人抵足而眠，唠个没完。“一想到你离开这里，我就有一种孤单感，”王朴山说，“可我知道留是留不住的。”“朴山，别那么伤感，中日不就一水之隔么，我们会重逢的。”“世事难料，”朴山仍有点忧郁，“不过，一毕业我就回国。”“我一定在那边迎你。”周恩来笑道，“啊，我想起一件事，”他掀亮电灯，爬起来，找到纸笔，说，“朴山，我想起梁启超的一首《自勉》诗，我把他写出来，算是临别留念吧！”“好啊！”王朴山一跃爬了起来。于是，朴山研墨，恩来展笺写道：

献身甘作万矢 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 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并附言：翔字周恩来印。“恩来，这太令人感奋了。”朴山看了一遍快乐地嚷道。“就让我们共勉吧！”梁启超一直为周恩来所推崇，但他题这首诗赠王朴山并非偶然，去年 1 月 23 日，他曾在日记中录下此诗以自励。他难忘这首硬语盘空、气势豪迈的诗，借它抒发自己的情怀，与梁启超 1901 年写作此诗时的意境是不同的，赋予这首诗以新的理解。事实上，他早已摒弃了梁启超的“改良主义”，而在探索一条新的救国之路。梁诗中的“誓起民权移旧俗”中的“民权”，在周恩来看来，既不是梁启超所主张的君主立宪的“民权”，也不是辛亥革命式的不彻底的“民权”，而是要深入广泛地发动劳苦大众，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运动。梁诗中“更研哲理脆新知”中的“哲理”，也不再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哲理”，而是科学社会主义。

次日，王朴山作陪，周恩来又到了“新中会庐”，辞别了在那里的同学，这才搭车西行。

京都车站，吴瀚涛夫妇已在月台静候，车嘎然停下，周恩来刚在打开的车门口露面，吴瀚涛已张臂迎了上去，连声叫着：“恩来，恩来……”

他们乘车到了市区，到处是古色古香的商家招牌，蓝底白字的门帘旁边挂着一只只小小的纸灯笼，古都给人以典雅、优美之感。半小时后，三人穿过一条僻静的街道，进了一栋住宅。

这房子是吴瀚涛夫妇和另外两位中国留学生共租的，周恩来同那两位留学生住一间。他每天都起得很早，忙着拿开铺在地上的被褥，再打扫各个房间，遇上吴瀚涛夫妇回家较晚，他就替他们做饭。有时，吴瀚涛带回一瓶酒，共享周恩来做的菜，边吃边谈。吴谈他听的课，周谈他读的书，这种时刻是很惬意的。周恩来的勤快、谦和、彬彬有礼，很快获得同屋留学生的友谊。瀚涛的妻子，也感受到了周恩来的魅力，觉得他是个优雅的、很容易亲近的

轮扉：即张鸿浩。

矢（shì）：即箭，此处为责难、反对的意思。

牖（yǒu 有）：意为窗户，又作诱导解。

人。

在京都如同在东京时一样，周恩来的思想仍集中于“新思潮”上，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强烈地吸引着他，成了每天必读的刊物。

那么，《社会问题研究》，究竟是怎样一份杂志呢？

在《社会问题研究》第一期（1919年1月出版）中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一，河上肇介绍了1916年8月，在京都帝大夏季讲习会上发表的讲演内容，其要点为：

“今天，我选择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第一个理由是……最近在俄罗斯掀起了革命，其后，革命也波及到了德意志，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所致。而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在我国很多人还不是真正了解的。为了消除误解，为了对时局问题有正确的认识提供参考资料而选择了这个题目，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今年（1918年）正当马克思诞生100周年，为了纪念他的诞辰。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理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今天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与亚当·斯密的个人主义经济学的根本思想不同，其后，感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随后又出现了人道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毕生的巨著《资本论》三卷，是与以往的个人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提出了与之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观点，是一门将现代的经济组织加以剖析说明的、独创的科学。因此，我命名之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社会主义摆脱了感情论和空想论的境域，开始拥有科学的基础，完全是由于这部著作的缘故，马克思在科学上便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

这真是闻所未闻，仿佛一阵阵春风拂面，周恩来感到从未有过的畅快，他静静地读着，竟入了迷，以至有一次忘了做饭。“恩来，你可别成为一个书呆子啊！”瀚涛的妻子笑着说。“怎么会呢？”恩来回应。“你啊，还是把它放在一边，温课迎考吧！”瀚涛说着伸手欲去拿这本杂志。“别动，”恩来下意识他说道，倏又笑了笑，“是啊，我知道你们在关心我……”他回避了报考京都帝大的事，他已没那份心思。接着，他又迫不及待地看起《社会问题研究》第二期，里面刊有《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二，河上肇这样论述道：

“……总之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三者是涉及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这三大原理是根本，贯穿着一条金线，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没有停留在最初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上，进一步写了一定的公式发表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读着这些，周恩来像是感到河上肇就在面前，可这毕竟是幻像。他急切地想见这位名重一时的大学者，便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吴瀚涛，请他引见。

吴瀚涛的反应却让他失望。

“你知道吗，河上肇博士被日本政府看成是一位危险人物……”吴瀚涛说，他担心恩来误入歧途，担心恩来这样下去，两人的友谊会因政治歧见而破裂，而这是他十分不情愿的。

关于《社会问题研究》对周恩来之影响，见《周恩来青年时代》第七期（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其代表作为《国富论》，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你也这样看？”恩来凝视着瀚涛。

“不接触为好。”

“我不这样认为，”恩来低着头，边摆弄几上的茶具边说，“河上肇博士在《社会问题研究》中，谈到了自己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问题的理由，是很充分的。而且，事实上，在俄国已这样做了。”

“别说了，”瀚涛有些冲动，“那是俄国，不是日本，更不是中国……”

“《资本论》使社会主义摆脱了感情论和空想论的境域，开始拥有科学的基础，它是科学，”周恩来说得很慢，“瀚涛，难道你真的不明白？”

“我……”瀚涛有点后悔替恩来借到《资本论》，但他没把这想法说出来，而是说，“我总觉得，在中国必须寻找一位俾士麦式的政治家，实行强有力的铁血政策，才能把我们国家引向现代化。”

“可中国的变革，必须改造国民的思想意识才能实现，这需要‘新思潮’的传入。”

“嘿，”瀚涛苦笑笑，“又是‘新思潮’……”

两人愈说愈拉开距离，脸色都变得严肃起来，这使一旁的瀚涛妻子颇感不安，担心他们伤了和气。她多次听瀚涛谈过两人在南开的友情，以为十分难得，应该珍惜。见两人并不想停止争论，她说：“你们能不能换个话题？意识是次要的，友谊才是珍贵的。”

“那好吧，不说了。”周恩来见这位女士伤感的样子，笑着答应了。

可是，争辩仍在另外的场合继续着。

一次，在饭桌上，不知怎么又扯到如何救中国这个敏感问题。

“单靠强有力的领导，你不能挽救局势，你必须要有大批追随者来支持强有力的领导，”周恩来边说边给自己兑酒，一饮而尽后，继续说，“你必须首先对年轻一代进行彻底再教育，你必须使他们全都跟着你，才能把一次革命推向胜利，而没有一次革命，中国就不能得救……”他似有些醉态，说着，又拿起酒瓶。

吴瀚涛猛地从周恩来手中夺过酒瓶，“叭”地摔在地上，大声嚷道：“如果你再喝酒，你将不会救中国了。”

“恩来，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要喝得太多，”瀚涛妻子劝道，“在你来这里之前，他就很担心你独自呆在东京，他说，在南开，你已经太喜欢喝酒了。”

周恩来睨了睨她，没说什么，转身找了一把扫帚，把地上打扫干净。

第二天，外出时他带回一束鲜花送给瀚涛妻子，这时，他已身无分文。

“哇，谢谢！”她又惊又喜，看着恩来趑入自己房间后，说：“他是那样困难，还买这花……”

“是啊，他已囊中如洗，”瀚涛说，“你想，怎么能跟这样的人真的生气呢？”

过了几天，又重现了吴瀚涛夺走酒瓶的情景，周恩来醺然欲醉地跑回房间，将自己反锁在里面。

吴瀚涛“笃笃”地敲门，没有回应。

“他是苦于没有其他朋友。”瀚涛对妻子说，“日语又不好，不能多外出，他心里寂寞。”

吴瀚涛的话不全对，周恩来“性恶静，好交游”，他不缺乏朋友，无论是东京或国内（南开、清华、金陵大学）甚至美国，他都有朋友，书信往来

一直未断。他缺少的是共同探讨“新思潮”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瀚涛不失为好友，却不能志同道合，这使他失望。他感到另一层意义上的孤寂，加之他日文不好很少外出，有悖于他“好交游”的本性，几乎与社会隔绝了，心中不免沉郁。

但所有这些都妨碍他继续探寻救国之路，他的兴趣仍倾注在河上肇的著作上。

《社会问题研究》第三期(1919年3月出版)又到手了，里面刊载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自己写的关于唯物史观的公式的解说，是河上肇翻译的。周恩来的目光移了过去：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结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在对唯物史观公式的一至五节作了介绍之后，河上肇又写了下面的附加语：

“社会上，攻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人是不不少的，不过我们在听那些批判之前，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究竟是什么内容必须得到正确的认识。”

周恩来反复阅读这些论述，觉得自己正一步步走近河上肇。

河上肇的思想，1917至1919年，已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学，从人道主义进入马克思主义。作为学者，他的态度是诚实、真挚的，自己的见解不成熟，受到批判，就舍弃错误，是一个不容分说就继续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周恩来想，自己也应像河上肇那样，不停地舍弃错误，追求真理。

自从去年五六月以来，在留日学生的政治运动中，“向何处去？怎么办？”这个现实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使他深感苦闷，如今，他从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教育，受到深刻影响，于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周恩来心里已不再感到沉闷，除阅读书刊，有时也外出走走。京都这座城市佛教气氛很浓，也很幽静。4月5日这天，他来到郊外的岚山游览。大堰川畔，万木芳馨，树叶簌簌，流水淙淙，杨柳依依，樱花灿灿。不远处，有一群游人载歌载舞，那歌词的意思是：“樱花啊，樱花啊！阳春三月晴空下，一望无际的樱花啊，花如云朵似彩霞，芳香无比美如画。去看吧，去看吧，快去看樱花。”听起来十分优美。可是，与这情景很不协调的是，有一女子兀自站在一隅，凝然不动，周恩来不禁触景生情，诗兴勃发，写下《游日本京都园山公园》：

满园樱花灿烂，
灯光四照，
人声嘈杂。
小池边杨柳依依，
孤单单站着一个人。
樱花杨柳，哪个可爱？
冷清清不言不语，
可没有人来问他。

诗，似乎完全写景，可是，周恩来选取灿烂樱花，依依杨柳与孑然一身

的女子观照，则显示出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这位孤单女子的同情。女子是谁，无从考证，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周恩来那份真挚的感情。

下午，周恩来又一次来到岚山，耳濡目染，又是一番情景：春雨淅沥，雾霭氤氲，山峦呈现一派深蓝的暗色调，泉水叮咚，像谁在弹拨着弦乐。瞬间，雨停了，云层稀薄处，忽有阳光闪现。他激动不已，遂写下《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濛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这首诗，明为写景，实写心境，正所谓“诗言志”。“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他从“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光明”者，即真理。诗抒发了周恩来于纷坛复杂的

“人间万象”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时的无比欢快，他的生活道路从此开始了至关重要的转折。

周恩来在公园里像是盘桓了很长时间，直到黄昏来临，在静谧中，或凝眸观景，或登高远眺，不禁思绪纷纷，又写下第三首诗《雨后岚山》：

山中雨过云愈暗，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美，不假人工；
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
粉饰的东西，
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
的制人学说。
登高远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持”？

在这首诗中，周恩来点出了“惹得人心醉”、“不假人工”的自然美景，然而，他并非只为写景和礼赞大自然，而是把美的自然与丑的人间作了强烈对比。他抨击了用以维护反动统治的“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等手段与工具，揭露他们宣扬的“信仰，情感，美观……”都不过是巩固其

统治的“制人学说”。诚然，现实仍是“渺茫黑暗”，但人民群众正在日益觉醒，统治者的末日终将来临。周恩来以极大的蔑视和对未来的乐观宣告：“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从此后，‘将何所恃’？”

4月9日，周恩来又一次出游，遂成诗一首《四次游园山公园》：

四次来游，
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
树上只剩得青松与绿叶，
更何处寻那“淡红娇嫩”的“樱”！
灯火熄，游人渐渐稀，
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
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
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

这首诗，前四句白描园山公园暮春时节的自然景观，后四句则见景生情，联想到西京（京都）的炎凉世态和成败繁枯的人世“客观的现象”。末尾，周恩来以含蓄、深沉的笔触，抒发了自己的情怀，不管何时再开芳草春花，也不论客观现实如何演变，都无挂碍，都不能动摇他对真理的热烈追求和向往光明的坚定信念。

周恩来已摆脱了因袭的精神负荷，走上了新的人生阶梯。

风光绮丽的大自然，固使周恩来流连，可他不是放情山水的行吟诗人，也不是象牙塔里的唯美主义者，他像是一个长途跋涉历经艰险的人，在日本盘桓了一年半，这个国家给了他什么呢？

因明治维新带来的繁荣所造成的大和民族的优越感，连语言也成了一种殖民手段；向外扩张明白告诉世人，日本奉行的也是军国主义政策。但波及全国的“米骚动”，却暴露了繁荣掩盖下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异国留给周恩来的唯一好印象，恐怕是这里的豆腐比中国的好吃。

至于说到个人，在这里，他曾一度迷惘，而报考“高师”、“一高”的受挫又令他沮丧，唯有与河上肇学说的邂逅，是使他感到无比幸运的事。

这天，他收到南开同学马骏的一封信。

马骏，字遁泉，号准台，原籍吉林省宁安县。1915年考入南开学校，比周恩来晚两年。为人慷慨磊落，口才便捷，曾两任南开演说会、学生讨论会和自治励学会会长，又任义塾服务团总董和教务长。周恩来在南开时两人颇熟，志同道合，曾一道组织过学校的课外活动，共同探讨社会问题，寻求救国真理。周恩来东渡日本后，马骏成了南开学校最活跃、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

1919年三四月间，正是“五四”运动前夜，巴黎和会也正在召开。中国广大爱国民众密切注视着和会中关于山东问题的争执，要求取消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收回被日本人在欧战中夺去的原属于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坚决谴责和反对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京、沪等

上述四首白话诗，均以“五”署名，发表在《觉悟》创刊号（1920年1月20日）。

青松：疑是“青枝”之误。

曹汝霖（1877—1966）：上海人。1915年与陆征祥（外交总长）一起奉袁世凯之命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1916年后任交通总长、财政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中被免职。1966年病逝美国。

章宗祥（1879—1962）：浙江吴兴人。1916年任驻日公使，与曹汝霖、陆宗舆等受段祺瑞指使，出卖国

地的舆论，迅速、广泛地传播着人民的这一呼声。

巴黎和会一番勾心斗角，到1919年4月，英、美、法、日等列强达成妥协，基本上将“战胜国”所得利益已瓜分完毕，中国没有从德意志等“战败国”手中收回任何权益，而日本以武力夺得的山东权利反而被和会肯定了，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得到的结果却与战败国无异，民众陷于深深的失望与痛苦之中。

马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信的，他以为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周恩来应当尽快回到祖国，回到南开。信里最重要的话是：“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上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周恩来深以为是。他决定即刻回国，一方面投身救国运动，一方面暑假后侯机报考南开大学部。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吴瀚涛，孰知，两个好友之间的争执又出现了。

“我们这一代人能做什么来挽救中国呢？”周恩来对吴瀚涛的劝阻不以为然，他的思绪执着地集中于“救国”上。

“学习。”吴瀚涛的回答很干脆。

“可是，”周恩来引用了马骏信中的话，“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上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瀚涛，我们一道回去吧！”

“可我们争得留学机遇并不容易，”吴瀚涛说，“我不想中断自己在京都的学业。当然，我也希望你不要放弃报考帝大，进了帝大，你不就能得到河上肇博士的耳提面命了吗？”

周恩来乜斜了吴瀚涛一眼，心想，求你引见河上肇你都不愿，这会儿要劝阻我回国，却又搬出河上肇，他感到有点不快。但转而一想瀚涛也并无恶意，还是出诸友谊的考虑，他说：“瀚涛，你对我的情谊，我很感动。可是，我已复信国内，申明不日即返国。”

“不可改变了？”

周恩来未加犹豫地摇了摇头。

“可你两手空空，怎么回去呢？”

“我也无需购置什么，只是得筹措点路费，”周恩来稍停又立即补充道，“我正在想办法……”

“恩来啊，想到你就要回国，不知何时我们再能见面，我心里很难过。”吴瀚涛说，“可我又能拿你怎么办呢？”

一场争执，以相互体谅了结。翌日，瀚涛的妻子将自己的一条项链和一枚戒指拿到市中心的店铺卖了，给周恩来凑足了回国的旅费，而后夫妇俩送恩来上车去神户，再乘船回国。

海天一色，浊浪滚滚，周恩来此趟的心境，已不像去年夏天回国度假时那样一片迷茫。而今，他心中已有娇妍的“一线阳光”，回国只在“图他兴”，想到很快就要与南开诸友见面，他兴奋不已。

4月中旬的一天，轮船抵达大连，而后他又换乘火车到了沈阳。在这里，四伯父贻赓备了酒菜迎接他的归来。

两天后，他又北上哈尔滨，这座城市有一所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在

家主权，引起“五四”运动爆发，后被免职。1962年病逝上海。

陆宗舆（1876—1941）：浙江海宁人。民国成立后，曾历任驻日公使、交通银行股东会会长、中华汇业银行总裁、币制局总裁等职。因出卖国家主权，在“五四”运动中被免职。1941年病逝北平。

1913至1914年间曾与周恩来有过同窗之谊，邓洁民有意邀他来的。

这所学校坐落在哈尔滨道外正阳街和十九道街的西北拐角上，离邓洁民家不远的正阳街路南一排楼房里。学校西面一排楼房是学生宿舍，周恩来临时下榻于此。

4月的哈尔滨仍有寒意，邓洁民陪周恩来在松花江畔散步，两人尽谈些有关东华学校的事。

1917年（民国6年）秋，邓洁民从日本留学归来，有感于中国学术不振，人才羸弱，怒然忧之，依靠一批朋友“擎划筹思”，以南开学校为雏型，规划了一个建校方案，而后一步步实施，遂成。

名为“东华学校”，缘因“命名之初，志蓄良奢，意在于中华东部完成一完全教育机关，孕育东华之人士，即用以引起国人对于东华之大注意。”并把学校的宗旨规定为：“培植社会中坚人材，兼重德智体三育，以养成爱国精神，陶铸济世能力。”这是针对长期受俄、日强邻欺凌控制和军阀张作霖统治压榨之下的东北现状而发的，具有深刻寓意。

周恩来到时，学校已开办三年，对东华刻意效仿南开，他颇赞赏，但他以为，南开也有不足之处，不能全部照搬。对东华现状，他也提出了不少改进建议，几乎毫无保留。能这样，也不枉来了一趟东华学校。

未料，邓洁民向周恩来提出，请他留下执教，教员张西曼也在一旁劝说。

执教，固然可走“教育救国”之路，但事实上，这条路走不通。何况，周恩来要回天津“图他兴”，他有自己的宏远抱负，他更不能将自己置身于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之外，遂婉谢了邓洁民的邀请。

离开哈尔滨，周恩来经沈阳径奔天津，径奔南开。

他注意到，关外民众的爱国之举，虽因日本殖民势力和亲日派军阀的高压政策，几近沉寂。可是，列车上，旅客激愤的爱国言论，却使他心潮难平。梦幻的年代，迷惘的岁月，连同躁动无着的心态，统统成了过去，现在是个决定性的关头，他比任何时刻都强烈地感到，自己对祖国有一份不可推委的责任。

《记周恩来和我父亲邓洁民的友谊》，见《周恩来青年时代》第六期（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

张西曼（1895—1949）：又名百禄，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中央大学教授。

第五章 “五四”风暴

1 曹汝霖赠款南开事件——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五四”与马良祸鲁

“……毕业同学周恩来君前由日本回津。”

《校风》披露的这一消息不胫而走，母校欢迎游子的归来。在最初的那些日子，拜访，酬酢，忙得周恩来席不暇暖。是啊，师生、同窗情谊如陈酒味醇，别后再聚，话，说不完，道不尽，但他没有放松对时局变化的观察。他有时任学校，有时住李福景家，阅读京、津、沪的报纸，是每天必不可少的事，巴黎和会、山东问题、正在兴起的群众性爱国运动，最为他所关注。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这天，北京学生3000余人，冲破北洋政府军警设置的障碍，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收回山东主权”、“抵制日货”、“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欲赴东交民巷，向英、法、美诸使馆表示中国民众对于日本强占山东之激愤，请求各国维持公理、主持正义。大队行至东交民巷西口，被巡捕拦阻，不允前进，因改推代表数名分赴各使馆接洽，其余群众遗赴东城赵家楼曹汝霖私宅，要求召见。守卫警察劝阻不听，冲开大门蜂拥入宅，寻曹不获，即将家中物品捣毁，并纵火焚屋。驻日公使章宗祥适归国，时在曹宅，与学生相值，遭痛殴。未几，警察和保安队300余人驰至，以武力弹压始散，当场捅去学生30余人，激起民众公愤，一场大规模的斗争已不可避免，自此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序幕。

第二天，消息传到天津，高等工业学校的湛志笃，南开学校的马骏等，在各校间奔走呼号，联络发动。官立中学的于兰诸（于方舟）誓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郭隆真、邓文淑（邓颖超）等也起而行动。

“五七”国耻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冲破省公署和警察厅发布的“临时戒严令”集会；

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湛志笃、马骏分别担任正、副会长；

5月25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由刘清扬、郭隆真、邓文淑等负责；

也就在这期间，曹汝霖迫于众怒，呈递“辞职书”，悄然来到天津，藏匿于日租界一幢幽雅的洋楼里，受到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的特别关照。北洋政府虽说免了他交通总长的职务，实际上并未惩办，反而褒奖他“体国公忠，有俾大局”，指示天津警察厅对他“悉心保护”。

这样，曹汝霖安稳地住在租界内，在替北洋政府出谋划策对付爱国群众的同时，为笼络人心，又故作姿态，表示愿捐出

1万元巨款，以资助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

张伯苓正因建筑费用之短缺，而处于窘困之中，见曹汝霖此举，一时心动，准备聘任曹汝霖为南开大学部校董，以酬答这笔捐款。除曹汝霖外，拟聘为校董的还有北洋政府交通银行董事长梁士诒和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

见1919年4月30日出版的《校风》第一百二十三期。

等。

这件事引起周恩来的强烈不满，他先后跟南开的一些老师交谈过。他找到马千里，打听张伯苓的真实意图，马千里也并不了解。

“先生，你跟校长是亲戚，能否跟他说，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容易遭致公愤。”周恩来不无忧虑。

“说是要说的，作用如何，我无把握。”马千里说，“恩来，你顶好去见见严范老。”

“也好。”周恩来说罢便离开学校直奔严府拜访。

“是不是有什么要谈？”严范孙笑道，“坐呀——”

“照理讲，我已离开南开，学校的事，我是不便多说的。”周恩来尽量让声音平静些，“可是，接受曹汝霖之辈的捐款，实在让人想不通。曹为何人，校长难道不知道？是装糊涂呢，还是有意跟他拉拉扯扯？”

“恩来，你应该了解，筹建大学部实属不易，南开是私立学校，政府不予拨款，除了向私人募捐，没有更好的办法。”严范孙耐心解释。

“我理解校长的难处，募捐也的确是个办法，”周恩来说，“可是，募捐也要看向什么人募捐。”说着，他激动起来，“曹贼如今已是众矢之的，民众一片声讨，莫非校长未闻？此时此刻，却想以校董名义换其捐款，试问校方，在目前这场爱国运动中，将自己置于何种地位？”

“盗泉之水不能饮，让他洗脚总可以吧？”

周恩来知道“盗泉”的典故，《淮南子·说山训》云：“曾子之廉，不饮盗泉。”陆机《猛虎行》云：“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他说：“严范老，盗泉之水，实为以不正当手段得来的污秽物，既如此，用来洗脚也不宜啊！退一步讲，倘若曹汝霖果有意资助南开，他就没有必要沽名钓誉，校方也没有心要聘其为校董，否则，将污损南汗的清白。”

“你……”严范孙有些愕然，可他理解周恩来这番激烈的言辞乃是出于爱国热诚，不应责备，只说，“我再跟张校长商量商量。”

事情虽有了通融的余地，但还没有结果，周恩来和马骏等发动在校师生开展拒款活动，同时，他又联络南开留日、留美的校友予以声援。

5月上旬，他致函留日同学：

（一）

“南开的事体，我是不愿意冒昧说，冒昧管。现在我从各厅面看，我说一句，实在是危险的很。校长也许别有肺腑，不过我总看不出，不止我，所有知道校长的人，都这样说。”

（二）

“你们诸位离天津远，还不知道内情。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人要为社会所不容，而做的是为社会开路的事情，那还可以；若是反过脸来，去接近十七八世纪，甚至十三四世纪的思想，这个人已一无可取，何况南开是个团体。团体要做的事情，是为‘新’，倘要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哪能谈到为社会的事。”

（三）

“南开校内的学生部可造就，并且极有热心毅力，校中却不拿真学问教他，弄的一个个都是空的。并且校长近来人心大变，总是拿中国式的政治手腕办教育，‘新’的一线生

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卖国贼：指曹汝霖等。

机仅仅在于学生。校长方面是天天讲 Democracy，可是佯样事武断，闹的人心都离体了。”

在此，周恩来不仅对张伯苓的政治立场提出异议，而已对南开的办学方向和教学方法也提出了批评。

在这之前，他曾见过张伯等，就南开教育问题申述过看法。那天，他据自己在南开的经历，对张伯等说：“从中学二年级起，耳朵里不大听中国话了。除国文还有一位先生讲中国话外，英文、代数、三角、几何、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等，都是用英文教，用英国课本。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科学术语，要我说出中国名字，我还说不出来。”他直视着张伯等，“校长，把一个青年搞成这样，还有什么办法跟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又怎能培养爱国之士？”

“尽心为学，以备将来之用，是吾一贯之主张，你应当是清楚的。”张伯苓凝重他说。

“可校长说过，欲强中国责任谁归？曰正赖一班新少年。可见，救国、强国乃是校长创办南开学校之目的。但倘若培养的学生有一天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校长的愿望岂不是要落空？”

张伯苓没有答腔，周恩来想，连这都谈不拢，还遑论拒款之事？难堪的沉默中，他只好离开，心中有说不出的遗憾和不满。

他写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显然是这一遗憾和不满的延续。5月下旬，留日南开同学会将此信节录寄留美南开同学会，并云：“顷得同学周恩来自津来信，节录于后，亦可见南开现状的一般了……”

留日、留美同学会相继有信直寄南开，对张伯苓的想法表示异议和不满，张伯等接纳了多方意见，取消了聘任曹汝霖为校董的计划，同时，拒绝了曹氏的捐款。他毕竟是个能顺应时代潮流的人，此后，在南开教育问题上也有了改进。在学校各种会议上，反复申明，教育之目的不能仅在个人，还在谋社会进步，教育要尚实勿虚，联系实际，按科学方法教之作事。他还亲自拟定改革草案和宣言书，后来，他还委托周恩来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改革大纲，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遂得到了缓解。

不用说，围绕拒绝曹汝霖捐款的斗争，乃是整个“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一部分。

周恩来迅速投入了这场震撼世界的爱国之举。

一波三折，时局在急剧动荡之中。

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免职令下之翌日，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钱能训引咎辞职，对此，周恩来的反应是微妙的。钱氏是他的堂伯父周贻谦的岳父，这样，他与钱氏也就沾着一点亲了。不过，他从没去攀。而且，也未见过钱氏一面，但有这层关系却是事实。在他，觉得钱氏早该辞职了，甚至就不应担当那个职务。钱氏在任，唯总统徐世昌之命是从，教育部次长兼代部务袁希涛闻学生罢课、风潮扩大，曾三度走谒，为钱氏所拒，一意孤行，助纣为虐。这一切，在周恩来已不是什么遗憾，而是憎恶。可是，有时，他又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一亲属关系，总觉得似乎有一种无形的东西，或多或少地束缚着自己。现在好了，在这方面，他可以无所顾忌了。

罢免曹、陆、章，释放拘捕之学生，表面看，北洋政府向氏众作了一些让步，但实际上对爱国民众的镇压却愈来愈严重。官僚、政客和军阀们深知，

“五四”烈火是青年学生点燃起来的，青年学生是这场大规模爱国运动的先锋和中坚力量，因此，他们始终不忘与青年学生作对。6月中旬，北洋政府密令各省、市教育厅转各大中学校当局提前放暑假，并让家长劝说学生回家，图谋釜底抽薪，瓦解这场爱国运动。

这一着，果然奏效。如今能在大中学校读书的，大部分属官僚、地主、买办和资本家等有权势的家庭，这些人生活无虞，国家主权的沦丧像是跟他们无关，他们只关心子女的安全，纷纷发函或亲自出面督促。加上一些学生风闻曹、陆、章已罢免，稍后，巴黎和会上中国已拒签字，斗争已持续了近两个月，遂在他们中间出现了松懈、疲沓的情绪，回家势成必然。这样，离校者众多，连各校学生会的骨干也大都星散。

湛志笃，作为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当他了解到还有一些家在远方的同学没有离校，便断然决定，邀集天津各校留下的学生会负责人集中到南开办公，他还动员《北洋大学日刊》的编辑、经理也都搬了过去。这时，他有意办一份全市性的学生报刊，并把这个任务交给《北洋大学日刊》的经理兼记者湛小岑。

湛小岑当即拉了几个人说干就干，没几天功夫，《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印出来了，湛志笃细细看了一遍，觉得内容贫乏，力量不够，缺少对全市学生爱国运动的指导性。

“小岑，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湛志笃搁下报纸说道。

“谁？”小岑莫明其妙。

“见面你就知道了。”

两人出了南开学校，来到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见到了一位中等身材，穿一套白夏布中式褂裤，沉静、和蔼的青年。

“他是周恩来。”湛志笃作了介绍。

“周恩来？！”湛小岑嚷了起来，他虽未见过，可是，《敬业》、《校风》这两份南开的刊物却早已知道，自然，周恩来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有关周恩来的传闻也知道不少，今天蓦然相见，他是又惊又喜，赶忙伸手相握，笑道，“原来，周恩来就是你！噢，我叫湛小岑。”

“他呀，北洋大学的，校刊经理兼记者。”湛志笃说着，目光一转，“恩来，天津学生联合会拟办一份会报，恩请你主持笔政，如何？”

“行啊！”周恩来当即应道。

湛志笃未料到周恩来回答得这般干脆，正自寻思，只听周恩来又说，“这事，马骏跟我谈过。”

“啊，这匹‘马’跑得真快！”湛志笃快活地笑道，这才想起，周恩来和马骏原是志同道合的窗友。

事情就这么顺利地定了下来。

回国之初，周恩来基本上在南开学校活动，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即使校方取消对曹汝霖的董事聘任和拒绝曹氏捐款，而马骏则投身于全市性爱国学生的联合。此后，周恩来一直关注着马骏的行动——

6月5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假南开广场召开爱国运动大会，身为学联副会长的马骏，带领与会群众宣读了六项誓言：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始终。

6月8日，学联组织各校讲演队在东南城角汇集，游行到北马路的天津总商会。商会会长在马骏说服下，应允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罢市。接着，马骏

又率众前往省署衙门，面见省长曹锐，迫其答应四项要求：准许自由讲演，准许成立讲演所，不用警察“保护”，6月9日在河北公园召集公民大会。

6月9日，马骏在河北公园的公民大会上发表了激昂的演说。

6月10日，商会罢市。但次日一早因罢免曹、陆、章的要求尚无最终结果，商界竟毁约开市，学联得此消息，于当天上午推举马骏等代表赶往商会。

面对商界的出尔反尔，马骏感到忿然，他说：“今天商会已经开市，昨晚，却未跟绅商学教各界协商，所要求的各项条件又没达到目的。似此情形，商界的罢市与开市，究属何为？这样自相矛盾，恐各位董事也无以自解。”他目光炯然逐个审视着在场的商界人士，“国人奔走呼号原为救国，目前公民大会全体一致表示‘誓死救国’，商界诸君，竟不能牺牲眼前利益，使罢市坚持到底，请问诸君爱国良心何在？国民资格何在？”

“哎，我倒要问一声，”马骏话音刚落，一名商会董事板着面孔，狡黠他说，“马君何处人士，天津有无财产？”

马骏愤然回答：“敝人是吉林人，天津固无财产，然敝人尚有生命热血可流于诸君面前，一死以谢同胞。”说着，便向大厅圆柱猛然撞去，一旁的商会文牍长（秘书长）夏琴西立即将他抱住，才幸免于难。最后，商会终于答应12日继续罢市。

……关于马骏的种种，周恩来从不同渠道获悉，马骏的大智大勇令他钦佩，相信马骏是位极可靠的人，故当马骏向他介绍学联内部情况与暑期同学趋向，并请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时，他应允了下来。

“办这样一份报纸是非常必要的，”周恩来若有所思他说，“要想这场运动能坚持下去，务必要注意爱国教育，遯泉，你说过：‘我们国家正在走上危亡。’在日本，我读到这封信很震动，促使我尽快回来，参加救国运动。如今，既然需要我编辑学联合会报，我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停了停，他问：“这事，志笃是怎么想的？”

“我们议过，想法一致。”马骏笑道，“或许，他也要找你商量的。”

“啊，”周恩来微抬起头，“那样的话，我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

现在，湛志笃继而提起，周恩来遂挑起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的重任。

可一切并不顺利。

相比而言，人选倒好办，当周恩来归国后，他的好友潘世纶（述庵）也毅然离开金陵大学回到天津，接受了周恩来的邀请，担任编辑。接着，赵光宸、胡维宪、薛撼岳等几位南开同学也来了，担任采访（记者）。

昔日窗友的鼎力相助，周恩来倍感鼓舞，当立案、经费、印刷等事宜尚在洽谈之中，他就撰写了一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在天津各报刊出，颇具破釜沉舟之气概。《旨趣》写道：

“……日本的米骚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我们学生感受这种潮流……实在不能不有个觉悟

……可是社会各种团体受这环境的影响同束缚，不能将意志直接表出，所以我们学生

曹锐（？—1924）：北洋直系官员，曹锟之弟，天津人。1918年任直隶省长。1921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氏兄弟同被软禁。11月29日，曹锐吞食鸦片自杀。

遯泉：马骏的字。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原刊于1919年7月21日《南开日刊》第三十五号上。

惟有不顾利害先动起来，求大家的同情。

我们学生联合会在求社会同情的时候，不能不有两个利器：一个是演讲，一个是报纸。演讲，报纸，全是表现我们学生思潮的结晶。现在，学生的演讲，已经实行两个多月，报纸还没有组织，求社会同情的利器终究不算完全。所以，联合会本着自动的精神，宣言下列主要条件，起首组织，预备定日发行。我们学生思想、学识的程度实在不敢说办报，不过拿我们的意见贡献于社会，与大家讨论。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

——本日报是学生联合会的舆论机关，所以必须同联合会致始终。

——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

——本日报完全是学生自动的组织。

——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

——学术研究的发表不党派别，但以稿件合于社会的生活作标准。

——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

——新闻的记载以有关于社会生活、人类进步为范围，并且力求敏捷。

——对于社会生活同各种学术，用哲学的眼光科学解析，公允正确的批评。

——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

——文艺的登载以切合人生为范围。

——联络各新闻同各通信社，交换新闻消息。”

……

不难发现，在这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中，周恩来阐述了“革心”、“革新”的办报方针；报纸对政府的“指导”、“监督”作用；对“新思潮”的介绍；为“人生”的艺术；以及新闻界的广泛联络等等一系列重要主张，鲜明，翔实，这在20世纪初的中国报界也并不多见。

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发表的同时，办报相关的具体事宜，在困境中也逐一得以解决。

其中，立案是最大的难题。

申报立案的函件已送警厅，却迟迟未得答复，而无数要求订阅“会报”的信函、电话纷至沓来，不容延搁。

周恩来不得不造访警厅。

“‘革心’、‘革新’是嘛意思？”一名警官挥动载有《旨趣》的《南开日报》嚷道。

“‘革心’即改造思想，‘革新’即破旧立新。”周恩来解释道。

“‘破旧立新’，哼，”警官一声冷笑，“嘛叫‘旧’？嘛叫‘新’？！”

“一切推动时代进步的就是‘新’，一切阻碍时代进步的即为‘旧’。”

“嘛叫对政府的‘指导同监督’？”警官又挥动《南开日报》，脸色陡变，“才读了几天书，竟想‘指导’政府，还要‘监督’，是嘛居心？！”

“监督政府乃国民之权利和义务，”周恩来冷峻他说，“即以罢免曹、陆、章来说，尚无监督，政府能这样做吗？”

警官无言以对，背着手在接待室里转了个圈，才说：“你们先回去，这事，警厅还得再研究。”

“警官先生，我要提醒你注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文规定有办报自由，”周恩来说，“而且，我们的申报手续也是齐备的。”

“《约法》，我知道，不用你教我……”

“那好，我不希望警厅作出有违《约法》的事。”

“这个么……”警官讷讷地，“我也没说不准，你等答复吧！”

显然，这话等于是默认，你默认，我就干。于是，周恩来、潘世纶等抓紧解决经费和印刷问题。

周恩来首先想到南开新剧社，何不劳驾他们义演募捐呢？他这一动议刚提出，即得到马千里、仇乃如等先生和李福景等同学的赞同。天津民众激于爱国热情，纷纷购票，每场戏票几小时内便销售一空。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招揽广告，爱国厂商纷纷解囊，支付高价刊登广告。这样，义演和广告两项收入，基本可抵办报的开支。

至于印刷，他们没有自置印刷设备的条件，唯有找厂家承印，这事得到仇乃如先生的相助，由其兄开设的南市协成印刷局承印。

几个先决条件的逐一解决，周恩来和编辑部人员立即着手发刊。出版预告登出之后，来自各处的订购信函雪片似地寄到南市荣业大街的“会报”编辑部，截止出刊前一日，订户即达两万，这在天津以至中国的报界，是个很大的数字。其中，不仅有学生、教员，还有工人、商人、职员，以至家庭妇女。不仅有本埠订户，还有远在南方城市的订户。这未曾料到的收获，激励着编辑部全体人员。

1919年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出版，通栏报头下面用英文印着：

Democracy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is our motto.

此话出自林肯在葛底斯堡的一次演说，亦称《葛底斯堡宣言》，乃美国立国之基。

周恩来还将他撰写的那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易名《革新·革心》作为“社论”刊出，这对方兴未艾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坚持和发展，对提高广大学生的认识和觉悟，都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报纸一到，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争相传阅。马骏拿着它，兴奋地对身边的人说：

“看看，这篇社论多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有用得多啦！”

从此，周恩来成了天津学生运动的中心人物。

“五四”运动，是以山东问题为导火线的。

先是1897年至1898年，德国以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占领了胶州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日本对德宣战，11月，占领青岛。之后，又派兵侵占胶济铁路沿线，驻军济南车站。济南这座山东首府，成了日货倾销的市场。

7月初，济南的青年学生挟“五四”风暴，数次发起游行示威，提出“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主权”、“抵制日货”等口号，鼓动市民和商界勿购日货。在这紧急关头，北洋政府指定亲日派皖系军阀马良为济南镇守使。马良一到任，即宣布全肖戒严，并于8月5日下令屠杀了回教救国后援会领

译文为：民主——就是要民治、民有、民享——我们的座右铭。

林肯（1809—1865）：美国总统。主张维护联邦统一，废除奴隶制度。南北战争中，颁布《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内战结束后，被南方奴隶主指使的暴徒杀害。

袖马子云等三人。

消息传到天津，周恩来立即派报社的外勤人员赶赴济南，深入现场采访，及时报道了血案真相。在此之前，《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还刊载了编辑潘世纶写的《请看对于山东的要求案件》，报道了山东坊子城的日本人提出的“九条议案”，其内容是保持日人在山东铁路和山东的政治、经济、军事、警察特权，扑灭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并由中国赔偿日本在抵制日货中的损失等等。

马良对民众的凶残和对日人的献媚，激起爱国民众的无比愤慨。在那些日子里，周恩来日以继夜地忙碌着，从汇集新闻到组织采访，从排版到校对，都由他主持。重要报道和社论，他得亲自执笔。这天傍晚，潘世纶给他捎来两块饼，他匆匆吃完，便取出一叠稿笺，凝思片刻后，伏案疾书：

“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

“山东学生游行，被军警捕去 300 多人，关在第一师范，听说还要枪毙几个。

“北大学生被捕，现在警厅发出布告，连他们的事实，都不许报纸登载。

“安福系的报纸，同被他收买的通信社，天天造谣说过激派怎样厉害，外蒙怎样同过激派通消息。边事越说得危险，他们的军事协约 越有延长的希望。

“日本人对山东的九条决议（见昨天报）简直看中国不成一个国家。”

周恩来愈写愈悲愤，以至笔都颤栗起来，他仰首长叹了一口气，平了平气，继续写道：

“国民啊！黑暗势力，越来越多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

“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

“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的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藉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

“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

写毕，他又复看了一遍。接下去，他又忙着划样，尔后径往排字间，与工人一道研究拼版、校对。夜已深，偶尔传来海河上断续的汽笛声，旋又沉寂了，困倦向他袭来，他揉了揉眼睛，仍守在印刷机旁。等报纸印出，已是凌晨，泛白的曙色，从洞开的窗户里浸润进来，裁叠，搬运，他又忙乎了一阵，这才步出印刷间，向元纬路元吉里的伯母家走去。

这篇以“飞飞”笔名发表的《黑暗势力》，矛头直指安福派头目、北洋政府及其背后的日本政府。面对北洋政府和天津警厅的加紧迫害，周恩来不避危险，毅然为之。

翌日，周恩来又与潘世纶合写了一篇《讨马良》的时评。它历数济南镇守使马良的罪行，文末发出“讨！讨！讨！山东的牺牲实现，我们天津的各界要再不起来讨他，更待何时？”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感召力。

第三天，8月8日，周恩来又组织、签发了《速逐残害回教徒的马良，速要求北京政府取消山东戒严令》的文章，进一步揭露马良镇压民众媚日卖国、充当安福派爪牙和日本鹰大的真面目，号召民众立即起来，对马良举行“国民公判”，掀起了新的爱国热潮……

这期间，周恩来不只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阵地，对安福派军阀政

安福系：北洋皖系军阀的政客集团，均系国务总理段祺瑞之亲信。他们于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伪造选举，成立国会，时称这一集团为安福派。1926年，段政府垮台，安福系瓦解。

军事协约：即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刊于1919年8月6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客及其后台日本政府进行讨伐，而且，还要设法改变津市某些报刊，在北洋政府高压面前“噤若寒蝉”的现状，并对付报界的某些败类。

事情要追溯到3月初。那时，北洋政府为讨好张作霖，将盘踞吉林多年的原督军孟思远调往北京，孟和部下高士倌等抗旨拒调，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几成冲突。这件事被称之为“奉吉风潮”，并成了国内一些报纸的报道热门，“五四”运动爆发后，仍有报纸把版面集中在这上面，天津《益世报》即是其中之一。

《益世报》是中国一份有影响的报纸，在“奉吉风潮”的报道中，却明显地偏向安福派支持的张作霖，“维护”北洋政府的“威信”，而对正在斗争中的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签字、马良枪杀爱国人士以及北大学生被捕等事，却极少涉及。

周恩来对此感到遗憾、痛惜以至不满，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连续写了两篇时评：《评现今舆论界并问〈益世报〉》、《再问〈益世报〉》。在揭露了舆论界尤其是《益世报》令人不解的立场后，写道：

“我是爱《益世报》的，当着‘五四’运动后，《益世报》终算是‘敢于发言’，我们也很尊重他，但是总觉他没有一定目标，拿着现（在）现象看，我很盼望《益世报》不要让社会‘回想当年’。

“再说现在的外交内政，事事危急，《益世报》负‘转移社会趋向，的责任，为什么每天总拿奉吉私争一事纠缠不休？其余所发生比着这个大的事情，却不甚记载，移开国民的注意点，这里是否别有作用？”

很明显，在两篇时评中，周恩来肯定了“五四”运动后，《益世报》总算“敢于发言”，并未把该报看成与安福派同一营垒。他基于整个斗争全局的需要，旨在争取该报，而争取也不是无原则的，严肃地指出了该报“移开国民的注意点，这里是否别有作用”？这就有了告诫的意思。由此可见，在建立反帝爱国同盟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成功地运用了有团结有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的策略。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其后，《益世报》发表了《请看今日之山东》的文章，历数了日人在山东横暴不法、荼毒同胞的行径。接着，又载文抨击马良残害民众的暴虐，还要求“将马良明正典刑，并解除戒严，以谢国人而申公愤”。

“五四”运动的大潮，在汹涌澎湃一阵之后，延至8月，在天津“已渐渐入于低沉”。这时，继续发动民众，就成了需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而舆论在这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为此，周恩来倡议舆论的联合，并由天津学联报社、北洋大学日刊社、醒世周刊社、南开日刊社、师范日刊社等多家报刊组成“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周恩来被推举为主要负责人，通过这个组织，密切各校报刊间的联系和配合，加强对中外反动势力的斗争，扩大爱国运动的影响，使这场爱国运动始终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为此，周恩来还写了《敬告男女青年》的时评，大声呼喊：“女学生，男学生，我们现在不是憩着的时候，我们应当每天实行警醒社会的事业。”

周恩来不只注重国内青年学生的发动，而且，还注意到日本青年学生在这场爱国运动中的作用。

也在这个8月，曾有“日本学生代表团”访华，且发表了《日本东京学生致中国学生书》，表达了他们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主张中日亲善的愿望。

见1919年8月5日、6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这件事的重要性，立即写了《敬告日本来华学生》，刊于8月9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他在文章中写道：

“……现在诸君既知道军阀不好，侵略主义不好，社会要改造，平民势力要增加，人类要平等，诸君就应该同去做真正的平民运动，推倒你们的军阀，打破日本国民侵略的野心，然后，两国国民的社会运动，才可以接近。

“总之，两国国民真正的亲善，万不是口舌、文字所能（表）达出的，紧要的就是双方国民对内对外，要有一个社会根本改造的实现。”

而“社会根本改造的实现”，内涵是什么呢？

在日本，诚如这篇文章所指出的，就是“推倒你们的军阀，打破日本国民侵略的野心”。

在中国，则像他在《黑暗势力》一文中所说的“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的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藉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

周恩来言之凿凿！在强大的国内外黑暗势力面前，斗争目标坚定、明确！这场爱国运动，表面上似已沉寂，但地火仍在运行、突奔，更为波澜壮阔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当然，仅仅把民众发动起来而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爱国运动可能将会“事倍功半”，甚至“功亏一篑”，周恩来对这是明白的。他回顾了“五四”民众斗争的经验教训，殚精竭虑，写了《讨安福派的办法》一文，刊于8月9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

安福派已成为国人唾弃的团体，讨伐它已刻不容缓。

事实上，“有些人天天打电报，发宣言书，上请愿书，骂安福派，请去安福派”，这不好似“捉贼同贼窝里人讲话”？安福派非但没推倒，而且“依然稳固在北京太平湖”，“依然‘到处横行’”。

怎么办？

周恩来提出：

“……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的发动力，第一是学生应当鼓动各种分子快快成立各种组织、各种工会，同业公会尤其要紧；第二是要女学生天天出外演讲内政外交的黑暗，国人当求根本的改造；第三是公民大会，应当看着时机聚会，好让国人对于国事知道真相，并且得一种群众意志的表现。”

文章最后，周恩来号召“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致安福派的死命”。他以无畏的气概，发出警告：

“安福派！安福派！‘看你横行到几时’！”

2 京城请愿前后——“觉悟社”的诞生

——“双十”巨澜——《觉悟》——“一·二九”事件

草厂庵，青灯佛案，晨钟暮鼓，座落在天津东南角，自从天津学生联合会设在这儿，它已不再像往日那样空寂、荒凉。

这天，一个紧急会议正在这里召开。

“济南学联的代表抵津已有数日，请求我们支援，”蓄有一脸络腮胡子的马骏说，“这事得商量一下。”

“义不容辞，”刘清扬爽快他说，“女界爱国同志会已作了准备，随时可以出发。”

“从马良祸鲁看，安福派及其爪牙是很凶残的。尽管我们赴京是和平请愿，但政府极有可能以武力镇压，被捕以至伤残都难说。”周恩来看了看在

场的人，“因此，学界、女界、商界推举的代表，应是坚强的、富有牺牲精神的。”

“恩来说得对，”谌志笃接过话，“不能指望一次请愿成功，挫折，恐怕在所难免，意想不到的事，随时可能发生，每一位赴京请愿代表都应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推派的代表，一定要是本人自愿的，只有自愿，才能自觉，义无反顾。”周恩来说，“请愿队伍要严密组织，京津之间要加强联系，前后呼应。”

“志笃、恩来说的都很重要，就这么办吧。”马骏抹着大胡子，“总之，准备要细，信心要足，非闹它个天翻地覆不可。”

会后，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从8月21日起，学联组织的天津学生分批向北京出发。23日抵达北京的天津学生将近千人，会同北京学生3000余人，集中到了天安门附近。

清晨，灰沙弥漫，请愿代表齐集于总统府门前，递呈请愿书。这时，到处已布满了军警，门口的警官态度蛮横，请愿书只接不转。交涉了一整天，非但不让见总统徐世昌，而且，还要驱逐请愿代表。于是，代表们与北洋政府的接待人员辩论说理，并向过路群众演讲宣传，浑然不觉中，太阳偏西欲沉。突然，大批军警包围了在场请愿的学生，军警中间还夹杂着一些身穿黑大褂的便衣侦探。代表们仿佛视而不见，天津第一师范的关锡斌跳上一处栏杆，对着新华门内的总统府大声疾呼，直隶女子师范的张若茗也在一旁呼应，指名道姓要见徐世昌。不料，一个警察用枪托猛砸关锡斌的脑袋，关锡斌应声倒下，头流鲜血，张若茗与另外一个女代表赶忙上去搀扶，将关锡斌护送到米市大街青年会的三楼，替他包扎伤口后，三人旋即又返回新华门前。

少顷，又开来一批全副武装的军警，冲入请愿代表群中，将他们一一逮捕，押解京师警察厅。在被捕者中间，有天津的刘清扬、关锡斌等，还有外交部部立俄文专修馆的瞿秋白……

京师警厅一常姓处长与刘清扬的哥哥刘铁庵相识，以为女性在厅不便，劝令回家，刘清扬回答：“此番，我是奉母命救国，且男女同为国民，我理应与男界同受甘苦，即便死于厅内，我亦心甘。再说，警厅既将我们押来，我们就是罪人，好打官司，我不能出去，谢谢处长的善意。”

常某见一计不成，遂将刘铁庵请来劝说。刘清扬被邀至客室，受到其兄劝慰，半晌，她对兄说：“我们女界初次在社会上做事，绝不能比男界少走一步，即或死，我们亦在里头。代表等从此一定要予全国女子作个榜样，以免将来被男界轻视，兄想亦不愿令我偷安于一时，而做女界万世之罪人也。”言毕而退。

斗争在警厅内外进行着，指挥镇压行动的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指望“杀一做百”，扬言要枪毙被捕的请愿代表，而天津方面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叮吟吟……”电话铃声在学联合会猝然响起。

马骏猛地一跳，握着耳机在喊：“喂，喂，啊，北京学生联合会，我是马骏，什么？都被捕了，还要枪毙请愿代表！……好，我们立即去北京。”放下话机，他说，“情况十分危急，我们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快出发！”

“对，赶快进京，跟军警拼了！”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请愿代表被捕，遭害……”

众人情绪激昂。

“现在正是加强爱国运动的时候，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周恩来沉静他说，“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是这道理。”马骏想了想应道，“但是，这种时候，我应当去北京。我们不但要营救被捕代表，而且，要向国人表示我们的无私无畏、顽强奋斗的精神，以我们的行动，进一步唤起民众。”

“报纸将立即出‘号外’。”周恩来说。

当天，津门大街小巷响起了报童“号外，号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号外……”的叫卖声。

“同胞们，京津请愿代表被捕了，大家要行动起来营救他们……”暮色苍茫中讲演队的邓颖超等，分散在津门市区振臂呐喊。

深夜，张若茗等又赶回天津，向谌志笃、马骏和周恩来报告京城请愿详情。

成百上千的男女学生和各界人士，争先恐后地报名，要求再次赴京请愿。

25日，天津第二批请愿代表，在马骏率领下赶往北京。

次日，在京、津各界联席会议上，马骏被推举为请愿行动总指挥，想到政府的倒行逆施凶残无理，马骏悲愤难忍，他对与会者说：“我辈男女各界人士，原为挽回外交，促政府以觉悟，以使未来之国家不致断送于少数卖国贼之手。”他眼含热泪，愈说愈激动，“我辈各界之士孰无身家？孰无性命？而所以有此不顾生死之大牺牲者，是否为我四万万同胞将为奴隶牛马而处于水深火热中耶？今既遭此蹂躏，惟有再接再厉，冀达最初之目的。”

他的话得到了众人响应。会后，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马骏带领下，向新华门前进。

烈日炙烤着大地，也炙烤着每一个请愿者。沿途，便衣侦探身藏暗器，散布于街道两旁监视着，而保安队员则端着刀枪来回巡视。新华门前，密匝匝地站着两排军警，手枪在握，虎视眈眈……

请愿代表一步步走近总统府，由一旁的小门递交请愿书，却被拒绝了。马骏上前与警卫队长论理，突然，“嘎啦啦”门关上了，他被堵在门外。一连三天，徐世昌就是不见，代表们旋又推马骏等14人，由西苑门入至集灵园，靠近徐世昌办公处，猛然问，跑出一队预伏的警察，不由分说，将代表的手一一背上，两个军警押解一人推走。

“吾人死为国死，死为争国不亡而死。”马骏挣扎着大声嚷道，“死后惟愿全国父老和后之来者，万不可把国忘了。将来如得幸福有日，则吾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警察闻此，或许动了恻隐之心，这才松了手，马骏等遂回到请愿队伍中，继续组织游行。

夜幕降临了，一番策划之后，警厅决定逮捕马骏。

“天津代表马骏出来！”警察冲着人群，气势汹汹地嚷着。

回答他的是一片嘘声。

军警用刺刀、枪托向人群劈头盖脸打来，接着，将掩护马骏的请愿代表拉至一旁，逐个拷问，马骏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不忍别人因他受苦，毅然走出来，束手被捕。

“快解散队伍。”军警朝马骏喝道。

“马骏可死，队伍绝不解散。”马骏答道。

随后，一行被捕者由军警押解别处。

京师警察厅对请愿团的镇压，马骏等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向全国各地。一些大、中城市游行集会，通电北洋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者。在天津，大批学生包围了直隶警察厅，要求电告北洋政府，若不立即释放请愿代表，绝不散去。

8月27日，为营救马骏等人，周恩来冒着铺天盖地的暴雨，带领大批天津青年连夜赶往北京。他一面组织天安门前的请愿群众坚持斗争，一面以天津学联的名义通电四处，呼吁举国一致，互作声援，要求各省速派各界公民代表进京请愿，并做群众运动的事，罢工、罢市、不纳税、不当兵……他还将这份电报刊登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以扩大影响。

周恩来到了北京的事，不知怎么让堂伯父周贻谦知道了，着人找到他，要他无论如何去一趟。恩来很矛盾，一则他太忙；再则，堂伯父住在钱能训那里，他不想见到这位前任内阁总理，以免另生枝节。可是，一想到九年前，正是堂伯父贻谦把他从淮安带往东北，他才能读小学、中学，又去了日本……堂伯父对他一直有所关照，人非草木，这回焉能拂了长辈的心意？想想，他还是匆匆去了。

“啊呀，你可来了。”一见面，贻谦便拉着侄儿的手，“你外公爹一直在惦记你，生怕你出事……”

恩来知道，“外公爹”即是钱能训，他未吭声。

“外公爹原本要见你，不巧偶染风寒，就免了。”贻谦坐下说，“恩来，你怎么也晋京请愿呢？须知维持政纲，责任有属，以言爱国，同此心理。惟当挽救艰危，端在持以镇静，稍涉纷扰，恐速沦肯，名为爱国，实为误国……”

“三伯父，”恩来耐心听着，却感到不对劲，他竭力控制情绪，“日人夺我土地，侮我人民，学潮纯基于爱国热诚，国人同仇抗争，岂忍责其过？”

“可是，潮流所激，举国骚然，神州岌岌可危，这，这哪里谈得上是爱国？！”

恩来见三伯父有点生气，想再作解释，可又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时间又不允许他再耽搁下去，便说：“三伯父，容我改日再来聆听教诲。”说罢，起身告辞。

“要知道，现在是武人政治，不像你外公爹那样的文治派，你要当心。”贻谦见侄儿执意要走，又不好阻拦，只得叮嘱，“要离远一点，唉……”

“三伯父，记得你曾对我说过：‘义所当为，毅然为之。’我

已不是小孩子，知道该怎样去做，你就放心吧！”说着，周恩来一脚踏出堂屋，穿过四合院，小跑似地直往前奔……

北洋政府欲瓦解青年学生的斗志，教育部电请张伯苓赴京劝说。张伯苓深感忧虑，先去了一个马骏，闹成那样糟糕的

局面，后去了一个周恩来，还不知闹到什么地步。这两个人虽说都已离校，但毕竟是他的学生，他担心事情闹大，于南开的影响，于青年学生本人均非好事。这样，他去了北京。孰料，他

尚未见到周恩来，一些代表已向他表示：“校长若能把大家带

回天津就行。”分明是拒绝，而且，代表们还纷纷劝他参加请愿行列，张伯苓无望，第二天便返回天津。

全国性的大规模声援，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于两天后释放了马骏等被捕代表。周恩来特地从衣铺里买了八套男女衣服，给马骏、刘清扬等送去，使

他们感动得不知说啥是好。

“什么也别说了，”周恩来爽朗一笑，“要做的事还很多，走，回天津。”

午后的太阳，像只浑沌的圆球，悬浮在风沙弥漫的旷野上空，热气在车厢内蒸腾着。

一节车厢的尽南头，坐着八名男女青年，他们是办理请愿后勤结束，迎出被捕请愿代表之后，乘坐这趟客货两用的慢车返津的。这八个人是周恩来、谌小岑、郭隆真、张若茗、关锡斌、郑漱六、周之廉和李锡锦。此刻，他们在一块，围绕国家的现状，在小声地议论着。

最初，他们只谈论赴京一周的见闻感受，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几份介绍“新思潮”的刊物，对“打倒孔家店”、“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口号尤感兴趣。交谈中，也都感到北京的爱国运动已前进了一大步，天津应急起直追。旋又谈到天津今后的爱国运动，应引到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上来。在日本，周恩来即已接触了“新思潮”，不过，与实际的爱国运动结合起来，却是眼前的事。

“被捕代表尽管释放了，但不等于斗争就此结束。”坐在周恩来旁边的郭隆真说，她的胳膊斜倚在窗口，风扬起她乌黑的短发，双眸十分明亮，“几次斗争的反复，使我感到团结紧才力量大，学联会与女界同志会也应更紧密合作……”

“对，”坐在对面的张若茗激动地一挥手，“我看，索性把女界同志会并入天津学联会，以壮大阵营。”

“就像恩来搞的‘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一样，实现团体联合，”谌小岑慢条斯理他说，“这样，便于密切联系，统一行动，扩大影响。”

“我就这个想法，”郭隆真碰了一下邻座，“恩来，你以为如何？”

“这当然好，”周恩来微蹙着眉，似乎一直处在思考之中，“我们倘能先将两会骨干分子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比学联会更坚强有力的团体，作为爱国运动的坚强核心，来领导、推动各项斗争工作，实为必要。同时，可考虑出版一个刊物，发表鲜明见解，作为引导社会的先锋。”

“这样好，”郭隆真即表赞同，“照恩来的意见，一联合，二办刊。”

基本原则确定后，他们又议论起这个组织的名称、吸收成员之条件、如何开展活动以及刊物怎样办等等，只是，意见还显得零碎和浮泛。周恩来希望各自再想想，并开始着手筹备。

入暮时分，火车抵达津门，一群男女学生遂握手告别。

回来后，周恩来依然很忙，《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一大堆事等着他处理。他主持召开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例会，提出了《警厅对待学生方法讨论案》、《各校从速组织周刊案》、《会报 周刊 联络案》等提案，均获通过并付诸实行。一个新的爱国团体即将诞生，他又酝酿了一份成员名单，他们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编辑潘世纶、外勤赵光袁、胡维宪、薛撼岳、学联会会长谌志笃、副会长马骏、干事李震流、第一师范学生关锡斌、北洋大学学生谌小岑，加上他本人。

几天后，郭隆真将女界爱国同志会提出的一份名单交给周恩来。

“不行，”周恩来看后连连摇头，“‘五四’精神有个重要内容即是男女平等，成立新的团体，事先讲好学联会和女界同志会各提 10 人，你们怎么

德先生：即民主，是从英文 Democracy 一词翻译而来。赛先生：即科学，是从英文 science 一词翻译而来。

只提 8 人，这本身就不平等，是不是？”

“ 恩来，你总这么认真。” 郭隆真笑道，“ 好吧，我们再商量增补两名。”

为慎重起见，“ 增补 ” 化了一周时间，最后确定的名单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直隶第一女师毕业生刘清扬，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团团长、直隶第一女师学生郭隆真、邓颖超，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议员、直隶第一女师学生张若茗、李毅韬，直隶第一女师学生周之廉、张嗣靖、郑季清、吴瑞燕，直隶第一女师毕业生、中西女校教员李锡锦。

一切准备就绪，9 月 16 日，20 名成员集中在草厂庵学联会办公室，召开了“ 觉悟社 ” 成立会。

众人推举周恩来主持会议。人类的进化，具有一种递嬗的作用，生生不息，一个激进团体即将诞生，它将在总结过去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定一个新的趋向，另辟新径，这使得周恩来颇为兴奋，开头的话就很激昂：

“ ……今天到会的，都是受了 20 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结成团体，出版刊物，以求改造学生的思想，进而唤起劳动民众的觉悟，来共求社会的改造。”

接着，他就建社方案作了说明。由于他们都是志同道合，又进行了半个月的充分酝酿，事情办得很顺利，经讨论，通过了几项决议，规定这个团体本着“ 革心 ”、“ 革新 ” 精神，以“ 自觉 ”、“ 自决 ” 为主旨，故刊物取名《觉悟》，团体就叫“ 觉悟社 ”。决议《觉悟》内容为：（1）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2）对于社会一切应用的生活取评论的态度；（3）介绍名人言论、著作和讲演；（4）灌输世界新思潮。

“ 觉悟社 ” 是“ 五四 ” 运动中诞生的、中国青年学生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它一经成立，就十分注重组织严密，没有职衔，实行委员制，分类分工负责，责任全体承担。社员需具备“ 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发展社员需经三人以上介绍方可。社员对外不用姓名，而用抓阄（抽签）方法，决定个人号码，以号码谐音取一别名，用以通信或作笔名，兹录如下：

邓颖超：1 号壹逸豪	周之廉：3 号叁珊
周恩来：5 号伍伍豪	赵光宸：9 号奈因（英译）
李震瀛：11 号石逸	郭隆真：13 号石珊
关锡斌：18 号石霸	潘世纶：19 号石久
胡维宪：20 号念豪	刘清扬：25 号念吾
吴瑞燕：26 号念陆	薛撼岳：28 号二八
马骏：29 号念九	李锡锦：31 号衫逸
郑季清：34 号衫峙	张若茗：36 号衫陆
张嗣靖：37 号衫弃	谌小岑：41 号施以
李毅韬：43 号施珊	湛志笃：50 号武陵

“ 抓阄 ” 废名，虽多少受到无政府主义“ 天下皆兄弟 ” 思想的影响，但绝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社会改革，是“ 觉悟社 ”、“ 革心 ”、“ 革新 ” 精神的必然产物。

“ 觉悟社 ” 成立后，即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力量，其影响扩大到京、沪等地。北京《晨报》称它是天津的“ 小明星 ”，其“ 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

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事实上，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领导骨干都参加了“觉悟社”，这就保证了天津的爱国运动能不断向前推进。

9月21日，李大钊先生应邀来到天津四马路11号，这是李锡锦的家，“觉悟社”暂借此活动。此前，《新青年》已先后发表了李大钊先生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文章，周恩来等对他仰慕已久，邀请他，是“觉悟社”成立时即定下的。初次见面，先生那硕大的头颅、威严的八字胡和蔼然的笑容，倏忽间就吸引了这群年轻人。他先听周恩来、刘清扬、张若茗等介绍“觉悟社”缘起和有关决议，中间还不时插问。他对“觉悟社”打破封建隔阂、男女平等并组织起来，出版《觉悟》甚是赞许。嘱咐大家认真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世界》刊登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分类研究各类学术问题”。所谓“学术问题”即革命思潮。先生表示今后“觉悟社”可跟他继续联系。

这是“觉悟社”成员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

当晚，严范孙着人邀请周恩来前往聚餐。他实在无暇应酬，可既是严先生让去，他无法推脱。等他来到严府已是高朋满座，除张伯苓外，有时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的黄郛、曾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时任直隶教育厅长的王章祜，还有澄波、芷龄等，皆为教育界的名流。

“觉悟社”的事，严范孙无从知道，可他明白周恩来已深深地卷入学潮之中，几次找他，总神龙见首不见尾，今晚他能来，老人甚是欣慰，遂将在座宾客向他一一作了介绍，旋又将他引荐众人。严范孙笑道：“翔宇，啊，即周恩来，乃是张校长和我的学生，我从不讳言。翔宇有宰相之才，今天，是个机会，特地让他跟诸君见上一面。”

“先生，我……”严范孙的话，使周恩来感到不安。开始，他还以为让他跟这些教育界头面人物见面，没准是学潮的事，不想严范孙对他如此评价，他欠身说道，“谢谢先生，可我真没这样想过。”

“坐下，坐下。”严范孙招呼道，“翔宇，你应当这样去想，张校长与我创办南开，旨在备国家于城之选，我们深望于君者，唯振起国民新精神，以重续国家新运命耳。”

孰料，黄郛笑道：“据闻翔宇君自日本留学归来，不知事业上有何擘划？”

严范孙跟张伯苓不由得交递了一下眼色，担心周恩来落入尴尬。

“承蒙总长先生关心。”周恩来从容应道，“其实，我在日本并未留学，虽说也曾补习过日文，但报考‘高师’、‘一高’均未如愿，这才归来就读南开大学部。”

“月初业已注册。”张伯苓赶紧补充道。

黄郛的明知故问并未难倒周恩来，相反，这个年轻人的诚实和镇定，却是很少见的，不能不令他惊异，甚至冲淡了他对周恩来鼓动学潮的那种反感。

“能读大学最好，”王章祜停著说道，“既是学生，务必安心向学，毋得干预政治，致妨学业。”

“厅长此说差矣，”周恩来面容白里透红，“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学生身为国民一分子，岂能置之度外？”

见1919年11月25日北京《晨报》。

《少年世界》系少年中国学会的刊物。

严范孙见此行状，故作轻松的样子，笑着摆了摆手，说：“今天，我们是否可以不谈国事？”他端起酒杯绕了个圈，“来，喝酒！”

张伯苓接着说了个笑话，客厅的气氛倏然起了变化，仿佛刚才那番对话没有发生似的。

宴罢席散，临行前，黄郛望着周恩来出门时的背影，凑近严范孙，说：“严范老，你这位学生，的确不可小觑。”

继李大钊之后，“觉悟社”曾请徐耕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研究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在周恩来组织下，多次研究过“白话文学”、“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有关新思潮的问题，他们还建立了临时图书室，各自献出收藏的书，相互阅读。

这时，尽管他们倾心于“新思潮”，可“新思潮”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他们之中较早较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仅有周恩来，但他也还没有真正确立共产主义信仰。“觉悟社”成员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都有浓厚的兴趣。究竟孰是孰非，往往莫衷一是。对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也还茫然。

“觉悟社”的历次活动，周恩来是主角。他纵论天下大势，以自己旅日的见闻体会，分析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特别指出日本亡我之心不死，用这严酷的现实，激发大家同仇敌忾的爱国心。他还把《震动全球的十日》等书籍介绍给大家，结合阅读李大钊先生的文章，以引发对俄国革命的向往。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周恩来对“新思潮”的不断引入灌输下，“觉悟社”的成员，由单纯的爱国思想，一步步转向青年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进而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大方向。

“觉悟社”是在爱国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它与那种坐而论道的小团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始终将自己置身于爱国运动之中。若论“五四”运动——中国现代史上辉煌的一页，自然不能不提到“觉悟社”。

9月下旬，为继续声援山东的爱国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决定派出10名代表，其中就有“觉悟社”的刘清扬、郭隆真、关锡斌和社友黄爱，连同山东、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代表共32人，组成请愿团，于9月30日抵京。周恩来、湛小岑等随行，替请愿团办理宣传、联络、后勤等事宜。

10月1日上午9时，请愿团来到新华门，要求面见徐世昌，为警卫所阻。徐世昌避而不见，派人与请愿团敷衍、磨蹭，双方对峙10个钟头，一无进展。正当请愿代表饥渴交加之际，周恩来带领天津学联慰问队，冲破军警的阻拦，送去了食品水果。回到住地，他又将赵光哀的现场采访记，作了修改，着人迅速送回天津交有关报刊发表。

夜阑更深，京师卫戍司令部以闪电般的行动，拘捕了请愿代表，押解警厅。

事态的急转直下，使周恩来焦的不安，立即找到北京学联。白天的请愿，他们未参加，周恩来向其负责人张国焘要求立刻行动，声援被捕请愿代表，并与京、沪、鲁、豫、鄂、汉等省市代表相约，于“双十节”同时举行游行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1921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1924年5月被北洋政府逮捕变节。曾参加红军长征。1938年4月投靠国民党，被中共开除党籍。后病死加拿大。著有《我的回忆》。

示威，这期间，他还抽空看望了高亦吾。年前，高亦吾由奉天来到北京，在京兆尹谋得一等科员职务，前不久，周恩来自日本回国，两人见过。

此番，周恩来刚进门，高亦吾便悄声问道：“恩来，觉悟社里有你吧？”

“先生怎么知道的？”周恩来有点诧异。

“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团体，你焉能不参加？”高亦吾信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他的学生，蓦然，他显得神色不安，说，“觉悟社的爱国之举已轰动京畿，当局很可能要取缔它，据传你的名字已在册，刻下密探遍布，你要速作打算。”

“最坏的处置，莫过于被捕，坐牢……”

“诚然，因爱国而遭迫害的事已屡见不鲜，可也要尽量避免损失。”

“先生说得对，”周恩来甚是感动，“我会注意的。”

“那么，今儿个，我就不多留你了，”高亦吾站起身，“该办的事抓紧去办，你要尽快离开北京。”

一刻钟的会面，这在两人间是从未有过的。作别后，周恩来绕道几条僻静的胡同，来到临时联络处，会商、处理了一些急务，当夜，即赶回天津。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在天津，就不仅是学联合会或“觉悟社”的事，而要联合更广泛的阶层，于是，他想起了马千里。马先生是天津各界联合会副会长，周恩来自从日本回国，师生间联系密切，在爱国运动中，又添了一份战友情谊。

马千里不是一般的教书先生，他一直热心为国，数月前，他在天津成立各界联合会的一段讲演，周恩来至今记忆犹新。马千里说：“……今日成立斯会，原赖各界热心国事。惧中土之沦亡，然必须同心协力，相辅前进，无论何种党派或官僚派从中设法破坏，我等必竭力抵御之。”这种无畏的气概，周恩来很是钦佩。

马千里已走出南开，登上社会斗争的大舞台。

9月，当赴京请愿代表在周恩来等营救下获释返津时，马千里主持了各界欢迎会；接着，天津各界群众万余人集会南开，追悼赴京请愿被殴致死的唐山代表郭友三，马千里任大会主席并登台讲话。下旬，南开大学成立，马千里任大学庶务主任，促成周恩来入文科班学习。师生二人时常为爱国运动的屡遭迫害而忧虑，商量与之对应的策略和方案。

7日，他们一起出席了天津各界联合会评议会，与商会秘书长夏琴西、学联会长湛志笃等共同研究了支援被捕请愿代表问题，决定代表所需衣物，由各界联合会执行部随时接济送往北京，周恩来为执行部主任，责无旁贷。旋而，又商定了“双十节”会议名称为共和纪念会，会址设在南开操场。同一天，为推动“双十”斗争，不顾警厅的阻拦，《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被迫休刊半月后复刊，并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宣称直隶省署或警厅都“不能禁止我们人民的存在”。

但是，“双十”集会游行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几天前，杨以德接替张汝桐担任天津警察厅长，天津民众对他并不陌生。辛亥革命时，他奉袁世凯密令，将革命党人工钟声逮捕，绑赴郊外杀害。

杨以德（1873—1944）：天津人。清末曾任天津商界侦探兼天津警察局副局长，北洋警务公所警务道。民国后，历任天津警察厅长、直隶警务处长、天津特别区市政管理局长、直隶省长等职。后与奉系军阀争权被撤职，闲居天津，1944年病死。

民国元年，天津发动“壬子（阴历正月十八日）兵变”。兵变之前，杨奉袁世凯密令作了部署，兵变当晚，将全城岗警撤走，任纵兵匪烧抢，一夜之间，十室九空。次日黎明，杨率武装警察四处抓人，一批批押解回衙，多达二百五六十人，草草审讯后即分别绑赴街头斩首示众，刑后将犯人首级悬挂街头电线杆上，以震慑民众。一时间，天津城内“谈杨色变”。此人凶残无忌，狡诈阴险，阿谀钻营，周旋官场，故而在走马灯似的北洋政府人员更迭中，能左右逢源，加官晋爵。

这次，杨以德甫到任，即对天津学生爱国运动采取高压政策，禁止集会、游行、结社、言论和出版的自由。

“双十”共和纪念会前，已风闻杨以德将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的消息。为此，大会主席团已就会场布置和队伍排列作了防范考虑。

这天，开会前，警厅保安总队长丁振芝即奉杨以德的命令前来干预，问这问那，提出种种限制，为大会主席团拒绝。2时整，戴着眼镜的马千里先生出现在主席台上，以其清亮的声音报告开会宗旨，继而宣读了大会《宣言》：

“……乃观近月以来，北京之所谓大总统、大总理者，曾命其军警捕请愿各代表矣！津埠又有所谓杨大处长兼大厅长，亦命其警队捕演说学生，解散各界联合会以及学生会报纸，且阴令印刷人停止印刷矣！”

《宣言》针锋相对地直指徐世昌、段祺瑞及其在天津的爪牙杨以德。接着，义正辞严地申辩道：

“夫共和国家，人民有请愿陈诉之权；有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权，均载在约法，全国共知，今之政府及政府所雇之官吏，举以上各种人民之自由权，完全剥夺。故今日吾国对于共和二字，只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吾民对于共和二字，只受假共和之害，而毫不得真共和之利。则所谓‘双十节’之大纪念，乌得不对之而发生无限之大感想也哉！”

《宣言》最后号召民众打破幻想，“对此政局，自当一心一德，努力进行，速筹自决之策”，表明了天津民众与反动势力誓不两立的斗争决心。会场气氛于激昂中透着镇定。

旋即，游行开始，队伍中涌动着各色标语，上面写着：平民万岁！热血救国！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一致对外、誓死不屈！自由、博爱！

无声的标语，不时化作有声的口号，回荡在津门上空。

早在开会时，杨以德即已在各个交通要道口，布置了大批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和保安队，以阻遏游行队伍前进。

“此次游行为庆祝共和纪念，并无他意，”一位学生上前坦然解释，“警察与学生同为中华国民，哪有禁止庆祝共和之理？”

军警非但置之不理，不予通过，反而端枪对峙，似与敌人交战一般。

游行队伍中的童子军见状，不顾一切地冲破警察封锁线。紧接着，有数名女生欲跟警察说理，但警察蛮横不听。这时，邓颖超带领女队大声呼喊：“警察也是中国人！”“警察也要爱国！”“不打爱国学生！”试图说服、感化他们，但无济于事，队伍仍被堵，邓颖超忍无可忍，一扬右臂高喊：“姊妹们冲啊——”

不料，警察动武了，枪托、刺刀竖砸横扫。游行学生有的栽倒在地，有

见1919年10月11日上海《申报》。

的眼镜跌落，李锡锦、王贞儒、聂玉清等被刺刀戮伤，正在流血，男生奋勇上前保护。混乱中有七名男生被枪托殴伤，当即由红十字会人员将他们一起抬到南关妇婴医院治疗。

缺口已经打开，游行队伍艰难地向前推进。面对残暴的警察，女队学生纷纷挥动手中的小旗杆回击，专挑警察的军帽，乘其拾帽的间隙再往前冲。邓颖超被伤吐血，坚不退却，男生则紧密配合。正在这危急关头，学联会的宣传车开来了，里外夹攻，打开了一个更大的缺口，游行队伍跟在宣传车后面突破重围，经东马路，直奔东浮桥，包围了金钢桥一侧的警察厅。

这时，警厅门前已有警察、保安队和马队千余人严密把守，双方紧张对峙着。

时间已是下午3点，学联会派出李之常、李毅韬、周恩来、韩嘉朴四人跟警察交涉，责问警厅为何指派巡警无故殴人并阻拦庆祝共和，要求警厅作出解释。

时间在流逝，警厅却没有回音，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员麒空就近讲演，揭露北洋政府媚日卖国的行为。间忽，游行队伍里响起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打倒卖国贼！”等口号。阵阵呐喊，连两里路外的日本兵营都清晰可闻。日本驻津总领事随即向警厅提出抗议，杨以德不怕民众，却怕日本人，唯恐引起外交纠纷，急匆匆派丁振芝来见游行学生。

丁振芝忽几讪笑，忽儿哭丧着脸，声言日人已提抗议云云，遭致游行学生一片斥责声。

周恩来让大家静下来，遂问丁振芝：

“‘双十节’为我国大典，是人民欢欣鼓舞的日子，我们尚未亡国，何容日人干涉？”

“你们不得乱喊口号，”丁振芝变了腔调，“让你们开庆祝会已给了面子，游行不行，乱喊口号更不行。”

“请问总队长，你何以如此惧怕日人，而视同胞如仇寇？”周恩来气愤他说，“国庆为一国之大典，警方又何以禁止庆祝游行并纵警伤人？”

“打伤学生是法律问题，你们可以到法庭起诉去……”丁振芝挥着手说。

“警厅作为一个团体，是维持社会治安的，你们却指派警察打伤我们团体的人，当然要由你们团体负责。”周恩来据理驳斥，“这件事属团体间的交涉，而你又是一个团体之首领，当然要向你责问。”

“我们不负责！”丁振芝说。

“禁止我们庆祝共和纪念游行，究竟是嘛理由？”李毅韬大声喊道。

“你们上法庭好啦！”丁振芝冷笑着干脆背过身去。

“这是嘛话？”

“让杨梆子出来！”

“警方逃不脱法律责任！”

零乱、愤怒的声音在人群中呼喊……

“你们都喊够了吗？”半晌，丁振芝侧转身子，阴沉着脸，“没错，你们的游行，是我们警察禁阻的；你们的秩序，是我们警察破坏的；你们的人，也是我们警察打伤的，你们可以向法庭起诉，……”话音未落，人已跨入警

杨梆子：杨以德的绰号，其人脸型似木梆。

厅大门。

人群中掀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很快又静了下来。

月亮升起来了，悄然爬上半空，空气湿漉漉的，像是有露水，增添了明显的寒意，人群却依然是一个整体。

过了一会儿，众人又推马千里、时子周、谌志笃等 10 名代表去省公署见省长曹锐。半路上，遇见教育厅长王章祜，遂同至省公署，适曹锐外出。稍后，本埠绅士李星北、宁星普、刘渭川等出面调停，马千里等暂允退出省公署返回警厅坪前。

午夜之后，在多方劝说下，游行学生整队各自返校。谁知杨以德却藉口逗留警厅坪前公民尚多为由，令马队数十人冲入人群，一时被踏伤和落入海河者甚众，伴以呼号哭喊，使周围民众怵目惊心，直到黎明，这里才归于空寂。

清晨，杨以德命警察把守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的大门，禁止出入，并封锁了附近的道路。周恩来、谌志笃、谌小岑和李毅韬，摆脱了警察的监视，躲进了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在这里，周恩来起草了《天津中等以上学校短期停课宣言》，揭露了杨以德镇压爱国运动的行径，表示“救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救国”，并指出，只要“群策群力”，便能“众志成城”，目的一定会达到，鼓舞了学生和民众的士气。

也在这里，谌小岑以旁观者的口气，写了一份传单，署名“李宁二”，详述了此次“双十节”事件之经过，经周恩来大量删改后，铅印 2000 份，除在天津城厢、租界张贴外，又寄往全国各大报社，10 月 23 日，《上海时报》全文转载，扩大了影响。

在持续不断的爱国运动面前，北洋政府和直隶省公署，不得不表面作出撤换杨以德的决定，北洋政府又于 11 月 7 日释放了 10 月 1 日在北京新华门前拘捕的各地请愿代表。

出版一种不定期的刊物，刊物取名为《觉悟》，这是 9 月 16 日“觉悟社”成立时确定的，自那以后，一直在筹备。

北京请愿、“双十”游行，爱国运动的沉寂和奋起，北洋政府及其爪牙的残暴和阴诈，杨以德的实际并未去职……这一切，使周恩来感到“觉悟社”有必要召开一次特别会议。

12 月中旬的一天，“觉悟社”成员相约来到新租的社址：宙纬路三戒里 4 号，这是社友李愚如的家。

回顾既往的经验教训，明确今后的奋斗方向，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周恩来在会上重点谈了思想锻炼问题。经讨论，一致认为，应当把觉悟社建成“一个预备‘牺牲’、‘奋斗’的组织”、“引导社会的先锋”、“一个作战的大本营”。而作为“大本营”喉舌的《觉悟》，出版已是刻不容缓。同时，会议还就第一期的内容、作者分工和编辑发行等有关事项，进行了研究。会后，分头去作准备。

这期间，周恩来已无暇读书，但与南开仍保持着联系，曾以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办事人名义，在《校风》杂志上发表了《给南开出校同学诸君的信》，勉励南开校友和在校同学要“为南开谋精神上的发展，事业上的改造”。

李宁二：李，“列”之谐音。因向往十月革命，希望中国有第二个列宁出现，故取此名。

当然，他主要精力则化在《觉悟》的筹备上。

1920年1月20日，《觉悟》第一期正式出版。大32开本，100余页，近10万字，颇引人注目的是封面右上角，紧挨“觉悟”刊名处画有一个五角星。也许，这象征着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吧！

这期刊物，集中发表了周恩来三篇文章，即《〈以觉悟〉的宣言》、《觉悟》、《有什么分别？》和他的五首白话诗，即《游日本京都园山公园》、《雨中岚山——日本京都》、《雨后岚山》和《四次游园山公园》以及《死人的享福》。

《〈以觉悟〉的宣言》和《觉悟》，是在觉悟社全体社员讨论的基础上，由周恩来执笔写成的。不用说，它凝聚着集体的思想和意志。《觉悟的宣言》，秉觉悟社“革心”、“革新”折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凡是不合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并申明其目标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

这篇《〈以觉悟〉的宣言》，表达了中国先进青年在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启迪下，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体现了“五四”时期先进青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探求真理的进取精神。

《觉悟》，却从什么是“觉悟”？为什么“觉悟”？怎样“觉悟”三方面，层层递进，加以阐述，最后归结到“觉悟”的“影响”。结论是：

“因自己的‘觉悟’，得寻着真‘人’的生活。由已及人，渐渐可以达到人人‘觉悟’的境界。

“从‘觉悟’中生出来的效果，必定是不满意现状，去另辟一条新道，持续不断地往前走，去求无穷的进化。纵横起来说：横性的‘觉悟’，是利己利人，水无边境；纵性的‘觉悟’，是解放改造，破坏建设，永无止境。”

读这篇文章，我们仿佛看到一批披荆斩棘、义无反顾、朝着解放的路奔跑的“真人”——先进青年的身影。他们是旧世界的破坏者，又是新世界的缔造者，最终，他们将冲破黑暗，迎来黎明。

周恩来办过《敬业》、《校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深知要办好一份报刊是不容易的，即以内容编排而言，不仅要有“扛鼎之作”的社论、时评，还要有活泼生动、引人入胜的文艺和翻译等等。于是，他又写成《死人的享福》这首白话诗，连同旅日时写的四首一并发表。

人力车，俗称洋车、黄包车，是普遍、廉价的交通工具，有钱都可乘坐，但感受却大相径庭，有的趾高气扬，有的骄横跋扈，有的偏狭吝啬，有的麻木不仁，车夫在一些乘客眼里，不过是“会说话的牲畜”、“拉车的工具”而已，遭受种种欺凌乃司空见惯，纵然有心存怜悯者也属寥寥。而先进的知识分子却另是别样。

且看这首诗：

西北风呼呼响，

冬天到了。

出门雇辆人力车，

车夫身上穿件棉袍，

我身上也穿件棉袍。

我穿着嫌冷，

他穿着却嫌累赘：
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
我感谢他爱我，
他谢谢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
活人的劳动！
死人的享福！

诗中的“我”，是个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寒风凛冽的严冬，车夫脱下自己的棉袍，蒙在“我”的脚上，“我”不但不嫌弃，反倒觉得有股暖流涌上心头，不禁感谢起车夫的关心和爱护。谁知，车夫竟也感谢起“我”给他以方便和帮助，表现了车夫的质朴、敦厚，及车夫和“我”之间真挚的人际关系，这与达官贵人、地痞恶少的骄横无理适成鲜明对照。

不唯如此，作者又进而联想到整个社会和国家，感叹人世间的不平与黑暗，劳动者流血流汗、创造财富，却让那些权贵豪门据为己有，任意挥霍，醉生梦死，这难道不正是所谓“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吗？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生，这种局面焉能维持长久？“共同生活？”周恩来打了一个问号，他是否定的，他相信一场变革的风暴终将到来，整个中国都会因此发生巨大变化，连同车夫的命运。无独有偶，半年多后，鲁迅写了篇小说《一件小事》，里面也是两个人：人力车夫和乘车的“我”——行进中，一位老妇人横穿马路，却因破棉背心没有上扣而兜着车把，摔倒在地，车夫赶忙停车去扶。“我”怪车夫“多事”，且误了自己的路。而车夫对“我”的唠叨“竟不理睬”，搀着老妇人到巡警分驻所去了。小说接着写道：“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来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小说中，作者以“我”的渺小，衬托了车夫的崇高，歌颂了劳动者不避责任、见义勇为的品质，这样严于解剖自己，也正是“思想改造”的内蕴。

因此，不妨说，无论是周恩来的《死人的享福》，对车夫的热爱，或是鲁迅的《一件小事》，对车夫的赞颂，都反映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看到了劳动阶级的力量，并且相信劳动者与统治者誓不两立，这就必然要发生社会变革，社会也因此将“无穷的进化”……

同期《觉悟》还刊登了“三六”（张若茗）的《急先锋的女子》，提出了一些“女子解放”的具体问题。文章写道：“女子解放从女子做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女子必须具有有一种革命精神去实行解放。”作者认为应当推翻迷信形式道德的观念、男女心理身体不同的观念、男女职业不平等观念，指出“革命二字，我们中国人最忌讳，以为提倡革命的人是大逆不道。据我看是极平常啊，因为争真理才有这种精神，人人应当具有的”，显示了作者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狂飚突进的胆识。

逸豪（邓颖超）也在这期《觉悟》发表了一篇《为什么》，提出了“为什么看不起人？”“为什么不实行？”“为什么要染恶习惯？”“为什么嫉妒别人？”等一系列问题，对那些不良的行为习惯作了批评，提倡谦虚态度、民主作风和力行精神。

此外，该刊还登载了《学生根本的觉悟》、《工读主义》、《我们的姊

妹》等文章，提出了学生除研究学术外，应该负起促进社会去谋人类幸福、社会进化的责任；应该排除学习的弱点，如意志薄弱、眼光短浅、虚荣自私、嫉妒孤僻、浮嚣盲从、骄傲武断、消极观望、不反省、没有真正的研究和批评态度等等，而应自觉、革新，创造学生的新生命，主张实行工读，劳心劳力互用……这些新鲜、大胆的意见，有着冲决思想罗网的意义。

《觉悟》只出了一期，由于接连发生北洋政府迫害学生的事件，觉悟社社员和社友都投身到紧迫的斗争中去了，特别是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张若茗等随后被捕入狱，第二期业已搜集的40多篇文章，未及付梓。然而，如同《新青年》、《湘江评论》、《少年中国》等民主革命的启蒙刊物一样，《觉悟》在“五四”时代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年初，曹锐着令天津各校提前放假，规定学生假期必须回家。事情源于两个月前的“福州惨案”，日军枪杀了焚烧日货的中国学生。这激起了举国义愤，天津爱国学生和民众开展了商号销售日货调查活动。接着，又在南开操场召开了全市规模的抵制日货国民大会，当场焚烧了在街市检查所得的十多卡车日货，这使直隶省公署感到不安，曹锐旋生提前放假之计，以扑灭这场爱国运动的热火。

在血与火中经受了洗礼的爱国学生是不会受骗上当的，采取了与之对应的举措。

觉悟社假法租界维斯礼堂地下室，开了三天秘密会议。

“‘提前放假’，是曹锐‘釜底抽薪’的惯用伎俩，我们要拆穿它，击破它。”昏暗的灯光下，谌志笃拭擦着眼镜片，愤愤他说。

“魁发成事件是导火索，”沉稳的郭隆真说，“烈火正在燃烧，曹锐想扑灭它，办不到。”

她所说的“魁发成事件”是这样的：

12月23日晚上，学生在魁发成洋货铺，查出未登记的日货灯罩17篓，按爱国团体的协议，这批日货应全部没收。但该店商人竟勾结日本浪人殴打了学生并抢走了他们的检查证件。

第二天，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推派代表去省公署请愿，提交抗议。曹锐非但不惩办好商，不与日人交涉，反派军警殴打并逮捕了请愿代表和散发传单、发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学生。

第三天，警厅又下令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会所，宣布解散一切爱国团体，并派出大批军警和便衣侦探，搜捕爱国运动领导人。

天津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两天前，马骏率各界代表去省署请愿被捕，周恩来等转入地下，继续开展斗争，而正在召开的秘密会议，则是至关重要的一次活动。

“救亡、爱国、牺牲、猛进！这是国民大会提出的口号，”谌志笃接着郭隆真的话说，“只要抱定这样的决心，胜利就属于我们。”

“要充分估计斗争的残酷，行动计划要比‘双十’庆祝游行更为严密、周到，这就要细致分工、各负其责，认真检查各项准备工作。”16岁的邓颖超说。

“对。”周恩来赞赏地凝视着觉悟社里这位最小的社员。去年夏天在南

浪人：日本封建幕藩体制瓦解后，大批武士失去禄位，到处流浪，没有固定职业，故称为浪人。日本向外侵略时，常以浪人作急先锋寻衅闹事，制造藉口，酿成事端。

开礼堂，他就听过这个女孩的讲演，那时，她叫邓文淑，记得她身穿白衫黑裙，头上梳着S警，那双乌黑的明眸灼灼闪光，有一副与她年龄不相称的雄辩口才。后来，他还应邀帮她排练过新剧《木兰辞》和《安重根》。到觉悟社成立后，两人的接触也渐渐多了起来，周恩来把她看成一个小妹妹，刚才，听了邓颖超的发言，给他留下了少年老成的感觉，时代真锻炼人呀，他想。

“往下说啊！”周恩来正思绪纷然，关锡斌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啊，”周恩来回过神来，笑了笑，说：“分工的事，可否由隆真、砚庄（若茗）、兰渚（方舟）和我负责请愿，文淑（颖超）留守接应，清扬南下宣传，志笃则负责学联地下工作……”

“可惜马骏不在……”有人说。

“是啊，”周恩来叹道，“否则，这次请愿的总指挥非他莫属。”转瞬，他一扬眉说，“不过，正因为如此，我们肩上挑起了双重担子，我们不仅要营救马骏等出狱，还要争取达到更大的目的。”

他的想法得到了众人赞同。接着又讨论通过了游行编队、行进路线方案和传单口号内容……

昼夜相接，废寝忘食，严寒把他们冻得几乎成了冰棍，唯有心是热的。远处，火车短促的叫唤越发衬托了夜的宁静，困倦折磨着每一个人，有的在屋里活动着手脚，有的硬撑着在小声嘀咕，有的则醉酒似的倚墙而坐打起呼噜，周恩来也难以自持，趴在桌上睡着了……

“天亮啦！”不知谁喊道。

周恩来被惊醒了。他睡眼惺松，愣了一下，转身走到隔壁盥洗间，拧开水龙头，用彻骨的冷水浸润着自己沉重的、昏昏糊糊的额头，倏又使劲地搓了搓面颊。少顷，走出地下室，直往东马路而去……

太阳稍稍偏西，寒风瑟瑟，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商业学校、省立一中、南开中学、直隶甲种水产学校等，几乎全市所有中等以上的学校各路学生队伍，约五六千人，齐集东马路讲演并散发传单。

两点整，在周恩来等引导下，打着各校校旗的队伍，秩序井然地由东马路、经金钢桥大胡同，过金华桥到省公署，从东辕门进去，齐立在头道门大院内。这时，两座辕门前面均无卫兵把守，亦无人阻止，但头道门紧闭。请愿学生开始喊口号：

“驳回日本通牒！”

“拒绝青岛直接交涉，催办福州交涉，取消中日军事协约！”

“恢复天津学联原状！”

“释放被拘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门依然关着，不见省署有任何动静，请愿学生一面要求曹锐接见，一面在东西辕门附近向围观的市民发表演说。

“同胞们，同学们，”邓颖超边喊边跨上了东辕门一侧的石狮底座，“山东问题岌岌可危，福州交涉亦将谈判，际此风云，日益危急，吾国民理应一致力争，以取得最后胜利。”朔风吹着她神情激动的红扑扑面孔，“今天，吾等来此请见省长，要求两大端，即誓争外交和恢复天津原状，现吾等抱极大牺牲精神，省长不见，至死不去……”

这时，已有一批学生拥进西辕门，突然，从里面冲出一队荷枪的卫兵，

在军官指挥下，阻止并驱赶进去的学生。接着，又有一队卫兵，跑出西辕门，冲进齐集在那里的请愿队伍。旋而，正中头门也冲出一支卫兵，实行夹击，不分男女，刀刺枪打，拳殴足踢，刹那间，卧地难以起立者数十人，头破血流腰折腿断者十余人，腿部刺伤、头顶裂口、胳膊手腕遭击脱者又十余人。围观之商、民各界，因躲避不及，受无妄之灾者亦有不少，景象惨不忍睹。

西辕门院内，仍聚有大批学生，只是，辕门已紧闭，无法进去。

隔了一会几，省署刘稽查长、邢副官长来到请愿学生面前。

“省长近日患病，”刘稽查长抹着上翘的八字胡，面带忧虑他说，“尽管如此，省长仍决定抱病与诸位见面，但求诸位推选三四名代表，余者悉退出辕门。”

大家推选周恩来、于兰诸、郭隆真和张若茗四人为代表。

“省长果准接见，我辈负责维持秩序，”周恩来对邢副官长说，“但是，只准四人进去，请愿队伍暂难退出门外。”

“不退出就不见。”邢副官长说。

“省长不见，至死不去！”郭隆真回答。

双方在激烈争执。

“请再予10分钟限，我去请示……”刘稽查长话未说完就离开了。

“此为圈套！”

“冲吧，顶多一死！”

“缴卫兵的枪！”

人群骚动起来，乱哄哄的。周恩来转动着身子，打着手势：“安静，安静，”他大声说，“今日请愿，我辈抱极大牺牲，然亦须听从指挥和命令，请各校维持秩序，等候省署答复。”

骚动渐渐平息了，10分钟、20分钟、半个钟头、1个钟头过去了，仍不见刘稽查长的影子，人群难安，有些学生愤而呼喊砸门。周恩来想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见辕门下面的门槛未上，有个近尺宽的空隙，便对邢副官长说：“你们既怕开门，我们只好钻进去了。”

邢副官长未置可否，周恩来旋即匍匐钻了过去，另三人也紧随其后。刚进去，杨以德之子、副官杨福培即向郭隆真脸上打了几拳，旋又猛推张若茗，张若茗险些栽倒。等她们欲与之论理，杨福培已溜了。

此时，周恩来已攀上辕门背后的横栏，探首对聚在辕门外大院里的请愿学生说：“诸君请听着，我等四人已进来，诸君幸勿浮躁，静候回复。如无完满结果，代表至死不归。”他见人群中挥动着旗帜和拳头，又说，“如一个钟头后不见我等回来，即告失败，诸君要预作准备，继续奋斗……”

四名代表走后约10分钟，从西辕门外闯入一连武装卫队，由连长持刀指挥，逼迫学生退出辕门，但请愿学生在等待周恩来等的回来，不论卫兵怎样殴击，始终不动。

忽儿，从东辕门又出来一连卫队，与西辕门的卫队呼应，驱赶学生。学生组成人墙，步步进逼，将后到的卫队挤出东辕门。卫队并不甘休，反复冲入数次，以枪柄乱击，学生多半被迫出了辕门，惟有一部分抱牺牲者，任凭殴击，决不退缩，一心等待代表与省署交涉结果。可他们手无寸铁，受伤者颇多，随请愿者一道行动的红十字医护人员，只好将其中伤重者架出抬走。因医护人员不足，地下仍躺着众多的受伤者，而卫兵并未停止行动，殴击声和哭喊声连成一片……

辕门内，周恩来等屡屡求见，却无回音，四人焦急万分，移时，忽有保安警察多人拥来，两个架一人，将他们押解出门。途中早已实行戒严，南北交通断绝，时街道两边仍有观者，即便同情，却难以表示。蓦地，郭隆真高呼起口号：“收回青岛主权！抵制日货！同胞万岁！学生万岁！”观众中有胆大者尾随其后，立即招致警察痛殴。

周恩来、于兰渚、郭隆真和张若茗，由西河沿被架至警厅门前，倏又趑入磨盘街，出东马路乐善好施胡同，送往营务处。随后，将郭隆真、张若茗押进一间破旧的空屋，周恩来、于兰渚则被押入正房一旁的兵棚内，由捕盗营的士兵看管。

周恩来身陷囹圄，却心系省署外的大批请愿学生，纵然他能想象出他们的遭遇，可他已不在他们中间，他担心警方对这些同学的追究，很快写了一张字条：

“今日之事，无论如何，一切行动，概由代表负责。”

四人具名后，周恩来将它递交营务处长。

这一天，是1920年（民国9年）1月29日。

3 与杨以德初次交锋——传讯——除夕

——“四二奋斗”——移转检厅

监狱生涯开始了。

营务处原是监押死刑犯的地方，环境之恶劣且不去说，人格蒙受侮辱却忍无可忍，周恩来等多次抗议，各界人士又在外面交涉，直到九天后，才搭乘马车，被押解移转至警厅花园内的监房拘禁，途中被告知司法科长要传他们谈话。可是，一到警厅，司法科长却不照面，反将周恩来和于兰渚分别关入单独房间。两人拒不进去，提出非见司法科长不可，并与警察拉扯了一阵。之后，一名瘦高个、蓄有袁世凯式八字胡的警官走了过来。

“你就是司法科长？”于兰渚问。

“不，我是警务处长，”来者气势不凡，但口气温和，“你们有嘛想法？写出来给我。”

警务处长？想必就是杨以德了？周恩来迅速作出判断。杨以德仙笑着盯着他，忽又把目光移向于兰渚。想起此人对待爱国运动的所作所为，周恩来心中愤恨难平，轻蔑地投以一瞥说：“警厅凭什么理由拘禁我们？！”

杨以德未予回答，转身走开。警察将周恩来带到花园后面的四队三棚，于兰渚则关入头队头棚。

大约半个钟头后，杨以德背着手踱到监禁周恩来的棚子门口，像是自言自语：“爱国嘛错？谁不爱国？可是，学生爱国的法子太不对了，学生是被人利用了……”

“学生被谁利用？”周恩来被杨以德的阴阳怪气激怒了。

“那还有谁，冯国璋 呗！”

“他不是死了……”

“死了阴魂不散。”

“处长先生，”周恩来忽然旧事重提，“你也曾是冯国璋的

冯国璋（1857—1919）：字华甫，直隶河间人，曾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袁死后，北洋军阀混战，冯为直系首领，与皖系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对抗。1916年当选副总统，1917年代理总统，1918年被段祺瑞胁迫下台，1919年在京病死。

人吧？”

“不错、”杨以德竟不以为耻，挥了下手，“那已成为过去。别忘了，现在，我是替段总理做事。”

杨以德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品行，使周恩来为之齿冷，他不再与其磨蹭，说：“准也别想利用我们，我们纯粹出诸爱国，你别糊弄人。”

“好，好，”杨以德说，“过几天，你见着马骏就知道，他已明白过来了。再说，学生请愿如何处置，完全是上边的意见，我绝没有一点主张。身为警务处长，我只管执行公务，是不会报私仇的，日久见人心……”

周恩来想，马骏是不会反悔的，杨以德不只是离间，而且在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谈了此番请愿的大致经过，而后说：“我们学生做事纯本天良，丝毫没有恩怨在里面，可警务处却这样对我们，是何道理？”

杨以德听罢未作反应，只让警察将新缝的被褥取来分发给周恩来和于兰渚。离开时，他对周恩来说：“你有话尽管写出来拿给我看。”说完即走出花园。

周恩来有了写字的自由，下午便写了一份责问书送交杨以德。这之后，他了解到，马千里、时子周两位先生也都关在这里，还有商会秘书长夏琴西、《泰晤士报》经理孟震侯以及一些学生，他 15 岁的表弟陶尚钊也被监禁于此。在不断交涉下，膳食有了改进，还争得了家人探视、学生会慰问的权利。

这时，周恩来渴望知道监押者的具体情况，特别想跟马骏取得联系。无巧不巧，这天，他上厕所碰到陶尚钊，得知尚钊可以见到马骏。于是，他给杨以德写了一个字条，说尚钊是他的表弟，要求准予见面。

杨以德让王视察员传话：“处长说，你要明白是被人利用，只要明白这点，不但可以见陶尚钊，而且可以见马骏。”

“是不是有人要利用学生，我不知道，”周恩来回答，“学生本身问心无愧。不过，社会上有人随便诬蔑的话，我倒听见一些。”

“那你就把听到的写下来给我拿去让处长看，”王视察员说，“这样，免得我传话不清。”

“可以。”周恩来应道，旋即就写。

他洋洋洒洒写了几张纸，大意是，学生做事纯本天良，没有什么成见在心，有人传说学生演讲有人给钱，完全是谣言。至于国庆风潮，则因警方妨碍学生游行，摧残学生集会，所以学生才持反对态度。至于别人有什么作用，譬如什么某巨公运动的事，学生完全不知。等到省公署一役，“九·一·九”运动，学生更问心无它，哪知因为地位问题，盘根错节，学生等遂为瓮中物矣……

字条自然转交杨以德了，可这位警务处长的许愿却杳如黄鹤，一去不返。杨以德的出尔反尔已在周恩来意料之中。一次，他遇于兰渚，于告诉他，曾开列书目，欲买《新青年》、《解放与改造》、《觉悟》等刊物，结果只让买了一本《新教育》。这使周恩来感到，监狱的自由实在少得可怜，争取自由和权利的斗争还仅仅开了个头。

十天后，司法科相继传郭隆真、于兰渚、张若茗到违警裁判所讯问。次

日，又把周恩来叫到司法科某科员住处讯问。

先是某科员发问，所问内容无非是省公署请愿、调查日货、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等事项，周恩来也斜着科员不作声。

“问你话呐，”一旁的司法科长高登甲耐不住了，“你们到省公署何事？”

“外交失败，国运阽危，请愿是让省署报告北京政府民心所向。”

“南开评议员出席学生联合会的是谁？”

“不知道。”

“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是何人指使组织的？”

“不知道。”

“怎么总不知道，”高登甲紧皱眉头，“那魁发成事件之内情，你不会不知道吧？”

“警方难道至今未调查清楚？”周恩来反诘。

“是学生殴打店员。”高登甲嚷道。

“事实恰恰相反，”周恩来说，“只要看看《益世报》的报道便明白了。”

接着又问起“双十事件”和某些学生南下广东由谁指使，周恩来的回答是一概不知。

“我再问你，《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何人主笔？”高登甲颇为得意，逼视着周恩来，“这个，你总不能回避吧？”

“联合会报没有主笔，有三四个审查员，是合议制，不过警厅来立案的时候，是我出名，所以，要问联合会报的事，我可完全负责。”周恩来既不隐瞒也不推诿，“这个可指旧日刊说，现今出的周刊，是学生联合会改组后由新学生会出版委员会周刊股出版的，我是周刊股股长，却不是审查员。”

“学生联合会款项从何而来？”高登甲又问。

“是各界赞助者亲往会中赞助的，也有学生演剧募捐的。”

“现在款项归何人保管？”

“归经济委员会管。”

“该委员会何人负责？”讯问是连珠炮式的。

“这个我不能说，说了你们又要麻烦他们了。若问学生联合会经费状况，我同马骏就可回答你。”

短暂的沉默中，高登甲尖锐地也斜了一眼，周恩来则依然如故，沉静以对。

“捐款的是哪些人？捐大宗款的是谁？听说林长民也捐过你们的款吧？”高登甲矜笑着问。

“你们现在无权调查我们学联会的经济内情，”周恩来冷凝着面孔，“但我可以告诉你，林氏并没有给我们捐过款，你提他是什么意思？”

高登甲眨眨眼，没答也没再问，命警察将周恩来带回棚子。

单独羁押，日子过得单调、寂寞。但时间却不因人间有种种磨难而停滞不前，转瞬，旧历年除夕届临。

这天，杨以德令警厅外面一家回教馆预备了五桌饭菜，让被拘的26人同到花园会议厅会餐。被拘者彼此消息隔绝了20多天，现在得以相聚，不免一番畅谈，十分快慰。

杨以德脱了警服，戴顶瓜皮小帽，身穿黑缎长袍，故作豁达、随和的样

林长民（1876—1925）：字宗孟，福建闽侯人。曾任进步党政务部长、北洋政府司法部总长。

子，于席间发表了长篇演说，在替自己评功摆好之后，他说：“……诸位先生将来出去，不要再一百八十个不含糊，要再进来，再住几年，诸位都要老了。人家念书毕业，从外国回来了，办实业，做大官，到那时诸位后悔可晚了。诸位先生们，将来出去好好念书，学科学，升官发财，尽是你的份儿哩……”

说着，说着，他的目光转向周恩来，脸上堆笑说：“周先生的家里人，不是在黑龙江做事吗？那里荒地有多少，学好了去开垦，那种事多么发财呀！”

杨以德的诱惑和愚蠢，令周恩来可笑，但他不想反驳，能有这样一次聚会，有了点自由，也实在难得，他不想冒出啥碴儿，被杨以德利用，坏了晚餐的气氛。

翌日春节，又有一次聚会，周恩来乘机将自己刚写好的两篇文章《独身主义》和《我的忏悔》交给郭隆真，请她设法转出去。

此后，警厅对待关押的师生等渐渐宽松了许多，各人的家属、朋友也可前来探视，没有多少阻碍了。

一天，郭隆真的妹妹来探视，郭隆真将周恩来的两篇文章交给妹妹。不料，让一旁监视的副官焦某见到，坚持要将文章交司法科长检查方可携出。郭隆真争辩未果，只好让妹妹拿了文章跟焦某去了司法科。高登甲翻了翻页码，目光一挑，对郭隆真的妹妹说：“稿子太长，总约有4万余字吧，等我看完再来取。”

郭隆真的妹妹无奈，快快走开。

隔了些日子，郭隆真的妹妹又来探视，并告知周恩来两篇稿子被扣的事，郭隆真大惊失色，同号的张若茗也十分不安，两人急得在监舍团团转。旋即，两人一起到司法科索要。

“稿子现时不能拿出去，因为要是登在报上，恐怕外边人批评，说人还拘禁着，为什么稿子可以传出去呢？那样，敝科长担待不起。”高登甲说，“所以，现在暂留在司法科，等到大家出去后再给你们。”

“不行！”郭隆真说，“你得给我们。”

“可我只能按规定办啊！”高登甲说完索性走开了。

接着，郭隆真、张若茗又找了高登甲几次，仍旧未成。

不久，周恩来为此事跟王视察员交涉，回答的口径一样，总是“等出去时发还”。但等到后来被拘的人移送检察厅时，周恩来、郭隆真去要，也未获得，而且，永远消失了。

4月的天津，依然春寒料峭。

2日一早，司法科传出杨以德的命令，要求各队警察严密看管被拘的人，不许相互往来。

杨以德无从知道，被拘的人有一个“预定计划”，正好用来对付他。“预定计划”限警厅于三天内速开公审，否则三天后全体绝食自毙，以申不受非法拘捕、不屈人格之志。

监狱形势即刻紧张起来，偏在这时，竟有警察放出闲话：“厅长还怕你们？都有玩儿票的啦！”

这话激起海货同业公会代表尚墨卿的愤慨，随即写了几张字条缝在自己

玩儿票：天津土话，意思是杀了你们，都有人预备偿命了。

穿的衣服上，众人一瞧，竟是：

杨梆子玩儿票啦！

杨梆子快来吧！

我们绝食啦！

尚墨卿站在自己监舍门口晃动着，以引起众人注意。一时间，哄笑声、议论声不断。

接着，于兰渚等欲往门外散步、上厕所，警察却不允，使得矛盾更加激化，被拘的人遂将绝食限制改为当日实行。马千里、马骏、夏琴西、尚墨卿等都开始绝食，并将通告散发各个兵棚。但不知何故，时子周、孟震侯、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等却没得着这一通告，仍旧实行三日后绝食的预定计划。

第二天，马骏、周恩来等在厕所相遇，周恩来才知道昨已开始绝食，而且还听说尚墨卿已被关进拘留所。他们商量决定，尽快通知各兵棚被拘的人，一致行动，投入关押尚墨卿的拘留所，誓与警方较量一番。

“笃笃笃……”周恩来经过大堂，敲着马千里住室的窗户，没有回音，他使劲地敲并高喊道：“尚墨卿关进拘留所了，大家都去拘留所吧！马先生，赶快行动。”

回到花园，见三队和四队的副官都在一旁守望，他啥也不顾了，仍嚷着要大家去拘留所。旋而，他又急匆匆跑到郭隆真和张若茗那儿，通知她们。随后，他率先到了拘留所门口，推开阻拦的警察，跨进了门。紧随他的于兰渚、陶尚钊见状也闯了进去。时子周、李燕豪等跟警察推揉了一阵才闯进去，其余的人，却让增援的警察堵在拘留所外。

双方剑拔弩张地对峙着。

不一会儿，杨以德迈着八字步走来了。他板着面孔，靠近拘留所，朝里望了望，抻了下黑色制服，大声说：“我待你们不薄啊！”言外之意无非是你们怎么可以以怨报德呢？

“那是私人的感情，”不等杨以德往下说，周恩来顶了一句，“我们这是为大家的事。”

“这回是你们自己闯进来的，你们既然不知好歹，什么私人感情我也不讲了，好，你们进去吧，”杨以德转向身后的警察说：“把门打开，让他们都进去。”

于是，被堵在外面的学生迅速跑了进去，杨以德则在一帮巡长、队长和副官簇拥下，也进了拘留所。

杨以德让一名副官拿来纸笔，要周恩来、于兰渚、陶尚钊和李燕豪分别写下自己的名字，而后面向时子周，说：“子周，你也写上名字，这件事是你主使的了。”

“不是，大家的事，谁主使谁？”时子周回答。

周恩来跟着说道：“我们先进来，时先生是随我们来的，这怎么是他主使的？”

杨以德狡黠地觑了周恩来一眼，洋洋自得地笑了笑，说：“方才，你不是同着别人在厕所商量过吗？因你们在厕所聚会，我连保安队的营号都不叫他们吹了，怕的是你们有了聚集的时候……”

周恩来心中一咯噔，杨以德果然厉害。不过，他是想追究时子周的责任，焉能让他得逞？于是，争辩道：“时先生今天连厕所都没去。”

杨以德盯着周恩来，正欲说什么，突然，尚墨卿和一名叫陈宝骢的学生同时大嚷起来，杨以德凑过去说了一通，这才又回到周恩来等面前，说：“你们知道尚车子是为嘛事进来的？我好好的能够请他到这里来吗？他骂我，他写条子挂在身上骂我。从前，学生在外边演说骂我，我装作不知道。后来到我面前来骂，我也装聋不听。现在，他在里边骂起我来，我还能容忍吗？我要是忍下去，这班跟我的人看见，我的威信何在啊？”他显得很委屈，喋喋不休地，“诸位，街上骂人打架的事，警察还可以带到局子里惩办。难道他在我官厅里污辱官长，我就不告他吗？他的事不关系你们大家，我单个同他打官司。陈宝骢是他自己情愿闯入的，我绝没请他来。”他目光阴沉地巡睃着众人，“诸位总是不含糊，啥‘我们得一致’，诸位，你们坏就坏在那‘一致’上头。你们的事不是一事，你们总想一起出去，这是做不到的，这里头很复杂啦……”

“我们不是希望出去，我们是要求依法审判。”最好是归法庭处理。”……众人七嘴八舌地说。

“归法庭的事，我总不赞成，在我这里我总好替大家想法子，”杨以德忽又变得和颜悦色，“我对大家没有成见，我要是对大家有个人成见，叫我‘男盗女娼’……”

这话引起一阵哄笑。周恩来回道：“我们也没有个人成见啦！”

杨以德啰嗦了半天，自己也觉得无趣了，领着一帮人走了。

下午，他把时子周（回教团体代表）和孟震侯（各界联合会代表）请到前楼的办公室谈话，一番折冲樽俎，杨以德同意将尚墨卿从拘留所放出来，并准大家在院内散步和到别人屋里研究功课。而时、孟所提按法律解决，杨则推脱，让时、孟去找司法科长商议。但这是一件大事，司法科长岂敢答复，只说需报省长定夺。这场斗争遂暂告结束，被众人谓之“四二奋斗”。

4月6日，警厅蓦地闹腾开了。

谌志笃、赵光宸、郑季清、邓颖超、吴瑞燕等24人，背着铺盖来到警厅面见杨以德，杨见这等气势，忙让警察把时子周、孟震侯找来。

“我们的代表在此押了70余日，我们心里实在不安。”谌志笃看着杨以德说，“现在，我们来要求替代他们，请厅长把我们24人留下，把他们24人放出去。”

“我没有这个权力，”杨以德晃着脑袋，“请诸位暂且回去等一等，我一定请示省长。省长要是准了，我必请你们去。你们可以把姓名住址写下来，可得写真的，不要叫我们没地方找去。”

“我是谌志笃，找我一人，我们全来。我们要是害怕，今天何必来呢？”

“你就是谌志笃！”杨以德打量着，“好，好，大名鼎鼎，我一定禀明省长，我要不禀明我是禽兽……”

“听说代表们已绝食，还听说商界代表尚墨卿因要探望生病难友，卫兵竟将他锁进木笼，如此惨无人道，我们实在放心不下。”邓颖超说，“如不允许我们代替坐牢，至少要面见我们被拘的代表。”

她刚说完，同来的黄辉、郑光、赵光宸又陆续发言，杨以德一副爱听不听的樣子。

稍停，杨以德说：“绝食的事已取消了，不信你们可以问时、孟二位……”

时子周见各说各词，争执不下，考虑总得有个了结，遂对谌志笃等说：“诸位请回去吧，不必说啦，别说诸位进不来，就是能进来，警厅内不过添

了24个人，有什么用处呢？我想警厅绝不能因为你们进来，就让我们出去，我们亦没有出去的道理，我们在里面无论受什么罪是为国，就是牺牲了生命亦值得。你们进来是为我们，太不值得了。诸位何不把为我们的心移到为国上头呢？再说，又何必全进来呢……”邓颖超等几名女生听了眼里扑闪着泪花。停了停，时子周转向杨以德，“让他们诸位进去看看，这要求也不为过。看看，也就放心啦！”

杨以德接受了这个要求，让他们分批到兵棚里去，谌志笃、邓颖超等终于见到了形容憔悴的周恩来，胡子拉碴的马骏和脸色苍白的郭隆真、张若茗等。借此机会，周恩来和谌志笃、邓颖超商定，聘请北京大律师刘崇佑为这批被拘者辩护。

次日，事情出现了转机，在拘禁了75天之后，警厅将陶尚钊等三名未成年和患病者释放。随后，在夜色遮掩下，又将马千里、时子周、孟震侯、马骏、周恩来、于兰渚、郭隆真、张若茗、尚墨卿等21名代表，移送河北地方检察厅待审。

4 锁门风波——外面的世界——

普罗米修斯——《别李愚如并示述弟》

夜幕遮天，星光暗淡，8点多钟，21名被拘代表被押至检厅，登记，预审，检查物品，折腾了整整3个钟头，19名男代表才被关进民事看守所，两名女代表，另在检查室旁划出一房安置。

随着“咔嚓”一声，房门被牢牢锁上了。

霎时，几个房间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不要锁门”的吼声，并伴有“咚咚”的砸门声。

眼前，仅过道顶上悬着一盏昏黄的电灯，号房里漆黑一片，每个房间的角落都放着一只粪桶，散发着恶臭，湿气和霉味也一阵阵袭来，境况比警厅还差，抗议声喧嚷不止。

“锁门是这里的规矩，不叫锁门，我管不了……”一名狱卒惊慌地说。

“我们要见厅长！”

“快让厅长来！”

“不许虐待请愿代表！”

代表们边喊边砸门，持续有一刻钟，检察厅长徐步善来了，代表们的激愤有增无减，徐步善让狱卒把各个房间的锁打开，招呼大家到过道来。

“诸位的案情大概，我都知道，”徐步善说，“但是，锁门是监狱的制度，并非对诸位特殊，希望能遵守。”

周恩来挤到徐步善面前申辩道：“我们是为抗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爱国而被捕的，生死早置之度外，曾绝食要求移送法院审理，既到这里来，绝无逃跑的意思。”他的语气倏又忿慨起来，“可是，检厅把对付盗匪的办法加在我们头上，坚决不能接受。”

“锁门的做法甚于警厅，”马骏接着说，“反对限制我们的自由。”

“锁门，绝对不能接受。”过道里一片喊声。

徐步善有些尴尬，狱规不能破，可请愿代表也不能惹，拖了一会儿，最终他还是答应了代表们的要求，不再锁门。锁门风波已告平息，徐步善却未

刘崇佑（1877—1941）：字崧生，福建闽侯人。曾任福建省咨议局副议长、福建省民政司次长、国会众议员、北京执业律师。

离开，利用这一机会，代表们又纷纷提出各种要求，周恩来、时子周和马骏一旁商议、归纳。

“我们的要求只三条，”时子周对徐步善说：“（一）在关押代表的五个房间内，准许大家彼此来往、自由活动；（二）准许购买书报杂志阅读，家属同学送来书报，准予递入；（三）立即开始侦查，依次解决，不再拖延时日，浪费光阴。倘若检厅不纳，后果概由检厅负责。”

“这……”徐步善掀起帽盖，搔着头皮，犹豫半晌，才支支吾吾地说，“门既不关，也就表示诸位可以自由活动。报章杂志应可阅读，但需经厅里检查，至于侦查，应当抓紧，应当……”

这样，内外沟通和读书报的障碍，几乎全部排除了，这种扩大了的自由度，是足资可用的，在周恩来、马千里、马骏、时子周、孟震侯等推动下，代表们进一步组织起来，对各项活动作了周密安排，制定了起居时间和学习课程表。每日晨间做柔软体操（周恩来带操）；上午，预备接受检厅讯问；下午读书，课程有中文、英文、日文、数学、历史、地理、经济学、心理学等；晚间，8时例会，除有特殊事故外，全体必须到会，议事时不得无故退席；会后，研究社会问题和举办娱乐活动，12时就寝。此外，各室每天设轮流值日一人，代表所在各室会商全体事宜，分头执行。又推选交涉员、公共卫生秩序视察员、会计庶务正副主任、娱乐委办等等，负责处理有关事务。

周恩来和马千里、于兰渚一道被推选为永久研究社会问题委办，他还被推选为新剧编剧员、职业讨论会暨商业讨论会筹备员，并负责办理读书团，审查公共读书法，记《检厅目录》等等，这一切，锻炼了周恩来统筹全局、领袖群伦的才干。

与周恩来一道坐牢的难友、天津商会秘书长夏琴西，数十年后回忆道：“……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倡导、组织、筹划，以周恩来出力最多。尤其在这二十几个年龄悬殊、水平不一、信仰、出身各不相同但都具有爱国热情的代表中间，能做到相互了解，友爱团结，周恩来确是起着领导和表率的作用。”

5月初的一天，各界联合会的回教代表张绍山来会见。因检厅放松了监管，这些日子，来会见的人渐渐多起来。他们带来外面各种各样的消息，被拘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期待着见到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张绍山也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们围拢他，请他坐下，一道道热切的目光汇聚在他身上。

不料，张绍山未开口就连连叹气，瞅了瞅马千里、时子周、马骏、夏琴西、周恩来等，说：“吾在外边听说你们几位的案子，因要顾全曹锐和杨以德的面子，大小得定个罪，判决的时候要宣布缓刑。”

“这怎么能接受？凭什么定罪？”时子周说。

“你别嚷，听我说下去。”张绍山取出香烟散发给在场会吸的，自己也点着一支，悠长地吸了一口，“你们几位如果到了判决缓刑的时候，就不必申请上诉了，出来就完事啦。”

“这不行！”马骏强烈反对。

“哎呀，你们被拘禁不知道情况，外面社会上，一班人的心都死了。”张绍山望着几副惊愕的面孔，“告诉你们，传闻商界有人提议，要给魁发成店铺挂匾，因为若不是魁发成叫来日本人打了学生，卖日本货的生意全都要

见《“五四”运动在天津·夏琴西〈狱中生活片断〉》（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关门收市。魁发成这么一闹，学生可就被镇压下去了，咱们可以照旧营业，这不应当念魁发成的好处吗？这些就是现在商界的一般心理。”

“事情怎么会这样……”夏琴西满面忧色。

“还不止此。”张绍山摇摇头，“再说教育界，张伯苓不是大教育家吗？不比我们明白吗？在座的有的和他共过事，有的是他的学生。你们知道他现在是甚么心气？他是忽此忽彼的专跑上风。他是明白人，都反对爱国运动，全力以赴压迫学生，我们又何必呢？”说到此，他见马骏和周恩来在交递着恼怒的眼色，想将话打住，想了想，还是说了，“中华民国亦不是我们这几个人的，亡国后亦不专是我们受罪，亦不专是我们当亡国奴。”

“那你甘愿当亡国奴了？”马骏怒而发问。

“话不能这样讲，”张绍山辩解道，“我是想，白费力量，不但没人知情，还倒受人埋怨，我们这是何必呢？今天会见，限于检厅章程，不能与全体见面，我的意思请诸位转告吧！”

周恩来一言不发，送走了张绍山，他才对在场的人说：“张绍山的话，太让人灰心了。”

“他像是在招安……”马骏气得说不下去。

“情况或许如此，”马千里说，“可我们不能听之任之，不能当亡国奴。”

“无论如何，我们在里面的人不能动摇。”马骏攥紧拳头，晃动着直嚷。

“不应受影响。”时子周说。

“对，要想办法……”周恩来沉吟有晌，说。

接连几天，周恩来浓眉难展，商界的摇摆，他并不感到奇怪，过去就有过，凡事，他们总脱不了生意人赚钱发财的本性。可是，张伯苓为何又那样呢？莫非是他的儿子张锡禄在“九·一念九”中挨打惊吓了他？也许是也许不是，早在去年8月学生进京请愿期间，他受北洋政府电召曾赴京劝说过学生。再往前，从差点接受曹汝霖捐款，亦可看出，他跟北洋政府、安福派一直纠缠不清。固然他没有公开阻止过爱国运动，可是，以他的名望、地位却专跑上风，这不说是沆瀣一气，起码也是不光彩的行为……想到这些，周恩来对这位赏识过他、帮助过他的校长，心中萌发的不只是怨尤，而且有气愤。可是，现在面临的是跟检厅、跟曹锐的斗争，他不能把矛头转向张伯苓。

那么，究竟怎么办？

一天下午，谌志笃来会见，给他捎来一封东京的信，一看笔迹便知是王朴山的。归国已有一年，他没有忘记这位挚友，再忙，他也有信东渡，告知朴山自己在国内的种种，朴山也有回信。不过，在狱中收到朴山的信却是头一回。他忙拆开，随信竟有一首《寄翔宇》的七绝，当着志笃的面，他兴奋地念道：

一年不见思情苦，万里遥瞻心绪焦。

敢问何时伸夙志，不堪国本日飘摇。

念着，念着，他的神情暗淡下来了，他的思绪飞向东京，良久无言，沉浸在对友人的思念之中。他的被捕，朴山是知道的，这消息通过报纸早已传到东京，朴山也一直为他担心。可是，为了国家，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是的，他也曾希望朴山回国，与他并肩投身爱国运动。但朴山有朴山的情况，又何必勉为其难，让他继续在那边求学吧……

“恩来，你想什么呢？”谌志笃见他发愣，旋问。

“啊，我只是有些想朴山，多好的人呐。”周恩来向谌志笃大致讲了些

王朴山的情况，忽又话头一转谈起那天张绍山来的事，问道，“志笃，情况是不是如他说的那样？”

“商界动摇是事实，张伯苓也有那个意思，”谌志笃说，“只是，想当亡国奴的毕竟是少数。真的，现在，参加爱国运动的人，都把眼睛盯在你们这儿，不知近日情况怎样？”

“与前没有什么变化，张绍山说的那些，也只少数人知道，不过，也有可能传开来。我在想，当务之急是稳定情绪、武装头脑，自然，这不仅仅是应急，也基于长远的考虑……”

“对啊，”谌志笃说，“应当这样做。”

谌志笃的赞同，使周恩来受到鼓舞。接着，他又把这些想法跟马千里、时子周、马骏等商量了一番，他们也都有同感。

5月16、17两天，他们连续召开了“特别讨论会”，以稳定情绪，统一认识。明确了“今后的目的，注重在社会的根本改造”，主张“分成小组去实现，以期不因应酬，妨碍根本的改造事业”。并决议，出狱后要办小报“灌输平民知识”；组织讲演团，轮流向城市乡间出发讲演合乎市民的、有系统的知识；组织小学校，推行贫民教育，等等。

在周恩来看来，要不受任何社会风浪之影响，坚持做到这些，灌输进步和革命的学术，是非常必要的。其实，两天前，也即张绍山来后第四天，全体会议即议决由他介绍马克思学说。他读过《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尤其是比较系统地读过河上肇博士的著述，强闻博记，成竹在胸，他是能够介绍的。

马克思学说，对狱友中的大多数来说，是闻所未闻的，都有一种新鲜感。而周恩来在狱中传播这“异端邪说”，委实像普罗米修斯偷取火种到人间，无疑是件危险的事。可他想到的是复杂的斗争，是狱友，是未来……20个人聚在一起，外面，虫声唧唧；屋里，闷热蚊扰。但大伙儿的神情都很专注，静静地听周恩来在说：

“……70年前，也就是1849年，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逐出巴黎，移居英国伦敦。从那时起，花了整整十年时间，他精心研究了大英博物馆中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藏书，终于在1865年，完成了他的《资本论》初稿。随后，又经过一年多的修改、加工和誊清，于1867年秋天，《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问世，他该是何等激动啊！”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财富是从哪儿来的？利润的泉源是什么？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揭示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在这一卷中，包含了他的关于价值、工资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全部基本思想。”

“马克思完全是自愿地担负起数十年如一日，为人类解放事业奠定理论基础的。他放弃了尘世间一切娱乐和享受，拒绝一切妥协和诱惑。他说过：‘今后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朝着我的目标前进，而不让资产阶级把我变成一架赚钱机器。’……他的意志像钢铁一样，对他来说，不知道什么是动摇，什么是退缩，什么是屈节，他总是百折不回，勇往直前……”

周恩来吐词清晰，语带情感，听者都觉得饶有兴趣，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了，他暂告一段落。

“往下讲啊！”有人提议。

“时候不早了，还有事要商量，”周恩来笑道，“诸位既然想听，改日

我再说。”

事实上，周恩来就这个题目，在狱中作了多次讲演，《检厅目录》这样记载：

“5月14日。晚上会议……内容是：

（一）决议讲演会世界工业革命史讲完后，由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

（二）……

（三）……

“5月28日。晚间全体会，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晚上全体会……演讲会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6月2日。晚上聚会。演讲会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6月4日。晚间聚会。先开演讲会，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6月7日。晚上会议……先开演讲会，周续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今天，马氏学说已讲完了。”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一年，又在监狱这个特殊环境中，如此热忱、系统地宣讲马克思主义，这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周恩来是第一人。

监狱可以是修养品德的熔炉，也可能是消磨斗志的场所，被捕的代表多数是青年学生，未经受多少考验，出现情绪低落、急躁、失望，甚至幻灭等等，都在所难免。演讲马克思主义，在于宣扬革命的理想和节操，但这不是监狱生活的全部内容。好在，这里既有马千里、时子周、孟震侯、夏琴西这样阅历丰富的师长，又有马骏、郭隆真、张若茗、于兰渚等斗志弥坚的同学，周恩来跟他们一道，在狱中组织了一系列丰富、有趣的活动，譬如开纪念会、庆祝会以及举办经常性的文娱晚会，使大家生活得愉快并有意义。尤其是文娱晚会，形式活泼多样，曲艺、相声、京剧、话剧、唱歌、棋赛、笑话、灯谜、智力测验、幻术（魔术），等等，周恩来擅长清唱，曾多次登台表演。所有这一切，使监狱始终充溢着集体主义、乐观精神和团结战斗的气氛。

周恩来从不放过每一个契机，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心系天下。

4月28日，是巴黎和会正式表决山东权利同青岛归日的日子。这天，周恩来在《检厅目录》中写道：“这种可耻的纪念日，很能让我们在狱里的人生出许多感想。”在当晚的全体人员会上，他详述了山东问题的始末：

“（一）德国占据青岛的情形；（二）青岛被日占据；（三）日人处置山东的横蛮；（四）中国参战的波折；（五）中国失去山东的自认；（六）和会处置山东的经过；（七）拒签的情形。”

他的翔实介绍，使大家对山东问题的来龙去脉，有了明确印象。会后，他还撰写了新闻稿交探监的人带出在报上登载。

几天后，欣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周恩来同马千里、时子周、马骏等商量，举办了庆祝晚会。他们以三扇门板搭成一个简易舞台，缝合几条被褥悬作幕布，组织了一支三四人的“小乐队”，但“演奏者”并无乐器，而是用口舌发出类似锣鼓、胡琴等的声音进行伴奏，真是无奈中别出心裁的幽默。

接着是“五四”运动一周年，周恩来在当天的《检厅目录》里写道：“回

想去年今天学潮突起，引得这一年来的学潮起伏，有无穷的感触，当然是各人脑中所能免的。”下午和晚上，他

们举办了庆祝会，周恩来担任主席，由马骏报告“五四”一年来各方面之经过。

5月7日，是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日子，这天的《检厅日录》，周恩来写道：“今日‘五七’国耻纪念，大家都存在一种极深刻的悼伤同奋斗的观念。传单由大家抄好，下午分送给民事羁押所。”

是的，他们不仅“存在一种极深刻的悼伤”，而且更有“奋斗的观念”，他们将纪念通知单抄送民事羁押所各号，使更多的人毋忘国耻，继续奋斗。

在狱中，周恩来尽其可能，对难友予以多方关照，总看成是自己应当做的。

4月11日，即他们移至检厅兵棚的第四天，正好是郭隆真的生日，可她与张若茗另处关押着，不能与大家见面。周恩来却想起了这事，于是众人推他和另一位同学，给郭隆真送去镶国旗的镜子一只，这出乎意外的礼物，使郭隆真感动莫名，很快回了一封热情的信：“蒙你们诸位祝我的生日，我实在感谢，一鞠躬；劳你们诸位的精神，作个纪念品，二鞠躬；叫我的精神愉快百倍，三鞠躬。”

类似的生日庆祝，还有陶尚钊、时子周等，此外，对生病的陈宝骢、张若茗等，周恩来也都关怀备至。

他还和马千里、时子周一道，将新剧的舞台搬到狱中，先后演过几出新剧，其中有揭露封建土豪劣绅残害人民的《新村正》；有表现弱小民族反抗强敌的《救国镜》；有反映旧道德、旧思想对人之毒害，宣扬社会改良的《一元钱》等。这样的演出，对难友是个鼓舞，而狱卒则感到新奇，并从中受到教育。有的狱卒观看时，不只为生动曲折的情节吸引，而且，有感于“善恶照影”，不禁潸然落泪，表示再不做压迫爱国之士的伤天害理之事。

周恩来身在狱中，来会见的人虽不说天天有，却也很少断过。6月8日上午，觉悟社社友李愚如来了。李愚如和郭隆真、邓颖超、张若茗同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同学，而她的恋人潘世纶又是周恩来读南开时的同班同学。去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办时，潘世纶中断了金陵大学的学业，返津协助周恩来办报。后虽进了刚开办的南开大学，但只挂个名，主要时间仍化在办报上。等到《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停刊，潘世纶又去了金陵大学。今天，李愚如实际上是来告别的，她打算赴法留学。周恩来对她这样做甚表赞成，交谈中多有慰勉。李愚如离开后，他系念难抑，当即成诗一首——《别李愚如并示述弟》：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的这般快了。
前些日子念强来说，
你要往英，
我以为不过说说。
过几天丹文又来说，

述弟：潘世纶，字述庵。此诗和后引之信，原件存天津历史博物馆。

念强：即陶尚钊，周恩来之表弟，南开学生，觉悟社社友。

丹文：即赵光宸，南开学生，觉悟社社员。

你要往法，
我也以为不过说说。
哪知不几天，
你来别我；
当面告诉我，
你能去了，
你竟去了。

述弟来信告诉我，
说你给他去的信道：
“……况且我是个人，
可以做工自给的；
无论如何，
总不至饿死他乡！
你要知道！
幸福是要自己去找，
株守相等，
是没有得到一日的……”

你别时也同我说：
“……买四等票，
坐三等舱……
勤工俭学去
念一年书后，
工读自助。
……研究实用理论；
本我的志趣，
辟我们女子的生计独立、
精神独立的自由径路；
保我们女子的人权天赋……”

念你的精神，
你的决心，
你的勇敢，
兴勃勃的向上，
全凭你的奋斗壮胆。
出国去，
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涌，
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练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凭你这心头一念。

过南京！
见着述弟；
想象中下关车站，
黄浦江畔，
一刹那的别离难。
同在地上，
说什么分散。
何况情意绵绵，
“藕断丝不断。”
两月后，
新大陆 又见述弟的足迹。
大西洋的波澜，
流不断你们的书翰；
两个无线电杆，
矗立在东西两岸，
气通霄汉。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行行珍重！
你竟去了。
你能去了。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的这般快了。
——九、六、八下午恩来作于
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

新大陆：指美国。1920年9月，潘述庵去美国留学。

九：指民国9年，即1920年。

诗写罢，他看了一遍，觉得意犹未尽，旋又写下一封短札：

愚如：

你走了，不能送你，我做首诗送你吧！今天我从下午4点钟做起，做到6点半钟，居然成功了。这首诗的成绩，在我的诗集里要算是“上中”了。

你看看怎样？到南京请给述厂看看。海船无到，你能本着“天籁”和我一首吗？

别了！三个月后，或者能见着，希望了。天安也有一首诗送你。

恩来

九、六、八

周恩来在这首不事雕琢、得自然之趣的长诗中，热情赞扬了朋友的进步，对李愚如克服经济困难，冲破家庭阻力，为获取知识、寻求真理、磨练才干这种“兴勃勃的向上”的进取精神，给予很高评价。

诗中还勉励李愚如他日学成归国，能“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为“争女权，求平等”、“推翻旧伦理”而斗争。并殷殷叮嘱和提醒她，勿因暂时的别离和爱情所困扰，而动摇赴法留学的信念，影响未来的前途。

自然，其含义不仅如此。

5 法庭上 陶然亭聚会 抉择 法馨的海河之夜

不久，谯志笃探监时告诉马骏和周恩来，刘崇佑大律师已欣然允聘，此外，还聘请了钱俊、蓝兴周两位律师，组成律师团，作庭审辩护。目前，三位律师已得审判厅通知准许入厅阅卷，可于7月1、2日开庭。

7月1日这天，由周恩来起草，并与于兰渚、郭隆真、张若茗联名给刘崇佑大律师写了一封信，提供了1月29日省署请愿有关情况，辩驳了检厅强加给他们的“罪名”，信中写道：

“省署请愿一案，检厅起诉案由，系注意在‘强暴胁迫，不服解散’。从此点上，我们愿意与先生声明者数事：

1.我们请愿省长的目的，检厅既认为合法，当然无所谓‘强暴胁迫’的意思了。

2. 我们要求往见省长，邢副官长屡次传达，均言省长可以接见.....大家的秩序很好，我们不能让他们退出去。

3. 我们四人钻进去的时候，确得邢副官长许可，因为我们本是见省长的代表。

4. 四人进去后.....邢副官长没有向我们四人说解散大家的事，并且我们在门里边，又在兵棚里坐着，有许多兵守着，更无对外边负解散责任的道理。

.....”

7月6日，一场暴雨跑马似地从空中掠过，原指望暑热稍有减弱，结果，人依然像罩在蒸笼里似的。

审判厅正式开始审理“省署请愿”一案，上午9时30分开庭。周恩来、马千里、郭隆真等请愿代表，被陆续带入法庭，旁听席上的各界人士向他们投以安慰和鼓励的目光。

周恩来这首诗并信，存天津历史博物馆，见《周恩来青年时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版）。

述厂：即潘世纶，字述庵，又名述厂。

天籁：自然界音响。后亦称诗歌不事雕琢，得自然之趣者为“天籁”。

天安：即马骏。“五四”运动中，因指挥京、津数千学生向总统府请愿，大闹天安门而得名“马天安”。

原件存天津历史博物馆。

刑庭庭长俞钟主审，陪审推事二人分坐俞钟左右，检察官、书记官坐在推事一旁，刘崇佑、钱俊、蓝兴周三位律师也在律师座上入坐。

开庭后，俞钟逐一讯问了21个人之姓名、年岁、籍贯、住址和职业，问毕，即令退出。随后，17家经售日货的洋货庄代表进入法庭，分别加以讯问，最后讯问了魁发成的店员裴唐仙等，不过是例行的法庭调查而已。

第二天，上午9时15分开庭。

马骏生病未到庭，周恩来等在候审室或坐或站，此刻，一个个从容镇定。早在审判之前，他们已仔细研究了检厅起诉书的副本，准备据实回答庭讯。但讯问是过场式的，拖拖拉拉进行了4个钟头才退庭。

8日，是公开审理的第三天。这天，前来旁听者异常拥挤，审判厅前已无插足之地，入庭旁听者达百余人，在庭外候立者亦有百余人，都密切关注着此案的审判。

周恩来、于兰渚、郭隆真、张若茗四人，被控有“妨碍安全及骚扰罪”。

检察官陈述起诉状后，蓄着长髯、鬓角霜白的刘崇佑大律师站了起来，沉静的目光，由审判官倏地移向检察官，稍停，开始发言：

“本案事件，由于力争外交、抵制日货而起。此项心理，此项举动，实吾全国人民所同情，而为民族自卫之天职也。”旁听席上腾起一片兴奋的议论声，有的甚至击掌叫好。

“肃静！”俞钟敲着木槌在喊，“请律师继续发言。”“……国势危殆，由于内争，遂召外侮，今日幸而有一致蓬勃对外之民气，一伸于其间，行政当局不能善为调护，使之顺轨而趋，以收后盾之效；乃一激再激，枝节横生，继酿大狱。始则以军警强压制之威，继则以因辱吐意气之愤，义烈急公之士相继被捕。按起诉状所列事实之总纲，首称交涉日亟，学生抵制日货，以为后援。全国风靡，津府亦然。是则抵货风潮，为吾国人对外感愤之公意，并非触犯刑章，固检厅所明认也……”

刘崇佑声音豁朗，顿挫有力，在对起诉状逐项批驳之后，旋又转向替周恩来等四人辩护，他说：

“当日省长公署之请愿人集至数千，各团体皆有，足见公意之所在，决非周恩来等区区男女学生之所为。集聚目的在于请愿，在于求见省长，以述舆情，并无他意，非可厚诬。省长已许进见，且已遵命举出代表，始终无被拒之事，更无所谓解散，是条件之无一合也。”检察官和审判官不安地交换着眼神，却不能阻止大律师的侃侃而谈：

“周恩来等系省长许见时举出之代表，无论如何进门，皆不能影响于许见之事实。若谓大门关闭，由门槛钻入，即为不许见之证凭，然不唯邢副官长自称实曾许见，且周恩来等入门之后，卫队不予驱逐，反加招待，邢副官长又以门外拥挤，使周恩来登梯劝止之。则周等四人之入内，不得谓非经代表省长之邢副官长之同意也。”

旁听席上忽又出现短暂的兴奋骚动，瞬间复归平静，听刘崇佑继续辩护：

“省署门槛，日间向不安设，尽人知之。惟无门槛，故周等可从此钻入。否则欲破槛，不如破门之为易，岂有门则无恙，而门槛独被取去之理。故门槛损坏，决不得谓由于周等四人所为。检厅似未可以此浅而易见之事实，轻以诬人。且所损坏之门槛，是否年久失修之自然损坏，抑因人为之损坏，且为何时损坏，检厅虽经调查，而全无以证明之，又何见今日损坏，即为前日钻入者之所为。至若门外之人为骚动之事，则其时周恩来等已属槛内人，不能负槛外之责任。”

说到这里，大律师环顾法庭上下，目光最后停在检察官脸上，语气变得越发凝重：

“辩护人以为因省长许见，而始进见；被告人等即服从命令，非不服从命令；省长既已许见，后又不见，且因门外骚动，乃捕遵命进见之被告人，则其过实在省长。即令门外

之人有过度之举动，被告人且徇邢副官长之请，登梯而劝谕之，何以反以被告人为门外骚动者之替人。检厅此项起诉，尤属滑稽无庸讳矣。”

刘崇佑的辩护义正辞严，丝丝入扣，对起诉理由和量刑依据逐项反驳，对案情予以分析阐明，将检察官的悬揣臆断击得粉碎。审判席上面面相觑，旁听席上喜形于色，周恩来等则将感奋的目光一齐投向刘崇佑。

接着，钱俊、蓝兴周两位律师也作了相关的辩护。

“周恩来，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俞钟问道。

“三位律师所说的，也正是我等四人要说的。”周恩来沉着应对：“一念九，因感外交失败，请愿省长，拒绝直接交涉，并请释放代表，恢复天津原状。到省署辕门时，有邢副官长接洽，据云见省长是可以的，惟需举出代表来。我们举了四人出来，彼时大门已闭，叫我们绕走便门。我们因外交事迫，故要求由门坎下进内，亦得邢副官长之许可。进署后，邢副官长叫我登梯报告大家静候回信，又将我们让到卫队棚中，给以茶水，极为和平，约有一时许，突有保安队来叫我们走，两人架一人，送到营务处，此是始末情形，望审判长明察。”

于兰渚接着说：“检察厅以强暴胁迫，不服解散之骚扰罪起诉，试问省长是中国行政长官，学生是中国学生，以中国学生请愿于中国行政长官，何以谓之‘触犯刑律’？倘省长为日本省长，学生为中国学生，加以骚扰罪名，或可有之。”

“放肆！”检察官猛然跳了起来。

“让他把话说完。”俞钟望了一眼检察官。

“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于兰渚晒然一笑。

“郭隆真、张若茗，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俞钟又问。

“周、于二位说的就是我们的意思，”郭隆真说，“在警厅时，我们即要求司法裁判，相信以神圣司法机关，或放一线光明，虽在权威之下，必有司法独立之精神也。”

起诉，辩护，陈述，不知不觉已逾规定时间，俞钟宣布休庭。

翌日再审。

刘崇佑等律师，作了与昨相似的辩护后，周恩来被允陈述。

“检察官以学生请愿为合法，而又依据刑律第 164 条起诉，是检察官自相矛盾。”周恩来瞅着眼前这位臃肿的官僚说，“去岁各省代表赴京请愿总统数次，亦未闻有加以刑事处分者，以总统之尊严尚且如此，况一行政官吏乎？”

“说得有理！”旁听席上有人在喊。

“肃静！”俞钟又敲响了木槌。

“若是省署门外有骚扰行为，即宜捕获治罪。”周恩来继续申辩，“我等彼时已在省署之内，焉知署外情形？如此起诉，已无法律可言，且是对法律的嘲弄。”

“周恩来，别忘了你是被告！”俞钟气急败坏地喊道。

“孰为‘被告’？”周恩来盯着俞钟，“这要靠民意裁决，让历史证明。”

“嗨，简直……”俞钟一挥手宣布，“休庭！”

此“辩护状”见《检厅目录》。

7月17日，是开庭宣判的一天。

午前，各界前来旁听的人已聚集在请愿代表拘禁的院内，谌志笃、邓颖超、关锡斌、陶尚钊等也都早早来了。门禁已不像以前严了，相互交谈时再没有“录事”一旁笔记，气氛显得较为轻松，人们似有一种被拘者有可能从轻发落的预感。

午后两点开庭，面对挤满法庭和拥立在门窗处的无数人群，俞钟以刻板的声音逐项宣读判决书：

“……马千里、马骏、孟震侯、时作新（子周）……共犯私擅监禁罪，各处五等有期徒刑二月。

“周恩来、于兰渚，共犯骚扰罪，各处五等有期徒刑二月。

“张砚庄（若茗）、郭隆真，共犯骚扰罪，各课罚金60元。

“尚墨卿犯违警罪，处拘留十日。

“被告人等未决期内，羁押日数，均准折抵。以上被告，在押二日抵一日，在押二日折罚金一元，均足执行刑罚终了之期。”

最后，俞钟宣布：

“所有被告，即日起予以开释。”

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各界人士纷纷拥到代表身前，把他们团团围住。

“隆真姐、若茗姐，你们受苦啦！”邓颖超拉着两位大姐的手，一个劲地说。郭隆真、张若茗激动得泪花扑闪，竟顾不上回话。

“武陵，逸豪，”一旁的周恩来叫着觉悟社给谌志笃、邓颖超起的代号，说，“若不是你们背铺盖来要替我们坐牢，若不是各界声援，我们怕不会这么快出来哩！谢谢你们，谢谢天津各界代表。”

“马骏呢？”邓颖超尖着嗓子问，“马骏在哪儿？”

满脸胡子的马骏闻声从另一处人丛中钻了出来，突然出现在邓颖超面前，抚着胡子风趣地说：“马天安在这儿哩！”

少顷，代表们在审判厅前摄影留念。随后乘上各界备好的汽车，沿途，人群簇拥，鼓乐奏鸣，他们被迎往总商会，出席各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会，每人胸前都佩戴着各团体赠送的大

红绸花和“为国牺牲”之银质纪念章。

会上，马千里演说，介绍被拘人出狱后的志愿，时子周致谢词，周恩来报告在狱中情形，张若茗报告入营务处情况，各界人士也都有欢迎演说。散会后，售品所、公教耶稣教慰劳会给每人送了一面镜子，喻“心如明镜”。颇有兴味的是老绅士冯骏甫送每人一把扇子，并在上面题诗一首：

囹圄羸縻半岁余，群公何事擲居诸。

多因爱国遭兵警，翻被抛家厄史胥。

志士同心光历史，谏员无法定爱书。

愿得民意回天意，瀛海澄清捕鳄鱼。

诗予请愿代表以高度评价，他们是受之无愧的。

监狱生活至此结束。

旧的一页翻过去了，而新的一页又会记载些什么呢？

出狱前，周恩来和马骏已被张伯苓开除了南开大学学籍。这一做法，引起了校内外普遍义愤。与周恩来、马骏同狱的马千里，时任南开大学庶务主

任，尽管是张伯苓的妹夫，对此亦深感遗憾和不平，遂毅然辞职。张伯苓竭力挽留，并两次派人送月薪上门，马千里坚拒不纳。

去年9月，周恩来注册入南开大学，弥补了旅日未能考上大学的遗憾。但事实上，他几乎没去南开大学上过课，而是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对于南开大学的除名，他倒也平静。在狱中，他即萌发了出国的念头，南开不能读，赴欧留学岂不更好。何况，目前，无论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或是觉悟社，仍有许多事需要他去做，觉悟社则是重点。

入狱期间，周恩来一直没有中断与觉悟社的联系，他跟狱中的社员马骏、于兰渚、郭隆真、张若茗时有晤面且不说，还通过探监的谌志笃、邓颖超等社员，及时作出部署，将觉悟社的工作重心转入反对非法逮捕，要求转送法院，争取公开审判，以取得社会舆论的支持，营救被捕代表。

8月初，在法租界天祥里一间小楼上，周恩来发起召开了觉悟社年会。

与会者不齐，有两名社员已出国，一名在南京报考高等师范，一名回家省亲患病未归，还有两人因家庭之故已退出各项活动。剩下的14人，从四处秘密地汇聚一起。重逢，无疑是令人欢欣的，而对于已出现的分化，也并非没有遗憾，但剩下的谁也不想退缩。觉悟社“革心”、“革新”的宗旨，因一年来的斗争，丰富和更新了内容。这难得的聚会，彼此除交流了监狱内外的种种，更多的是谈论一年来各人的思想变化和感受。

周恩来的表现不用他谈，马骏、郭隆真、张若茗在发言中，都穿插着替他说，他的发言系统总结一年来，天津青年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

他说：“……我们都处在青年时代，最大的谌志笃也只25岁，最小的邓颖超才16岁，我们还缺乏知识和经验，今后应该求学，以充实自己。此一。

“第二，只有把‘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的中国。”

“恩来的意思，概括一下即学习、团结。”谌志笃说，“我考虑，大家是不是去趟北京，看望李大钊先生并聆听他的教诲？”

“这主张好！”邓颖超竭力赞成。

“先要联系一下。”郭隆真掠着短发说。

“对，”周恩来寻思道，“凭李大钊先生一贯的热忱和对青年的关怀，他会接见我们的，然而，他很忙，先联系一下也很必要。”

会后，即派人去了北京，李大钊听了之后，对于觉悟社“学习、团结”的主张甚表赞同，建议以觉悟社的名义，邀请北京各进步团体一道开个座谈会，共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救国大计。

8月16日上午，天气炎热，代表京、津各进步团体的23名男女青年，如约聚集于陶然亭。

陶然亭在北京郊外，穿过八角琉璃井胡同，再往南，远远望去，视线内出现一座并不很高的山冈，上面有几株枝叶繁茂的大树，树之空隙中闪露出一角屋脊和数椽敞轩的粉墙。等到了面前，抬头可见康熙年间工部郎中江藻题的“陶然”二字匾额悬挂亭翼。此处又因秋色绝佳，一名“锦秋墩”；再因是江藻于大悲庄一侧扩建而成的，为纪念此事，一名“江亭”。在这僻静之处，蝉鸣声时断时续，偶尔传来驼铃的叮当声，越发衬托出它的幽旷。

出席这天座谈会的，除觉悟社部分社员，还有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团体的代表。其中“少年

中国学会”是李大钊创建的，1917年7月正式成立前，即印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在全国乃至海外中国留学生中广为散发，介绍科学和民主，宣传新思潮，在青年读者中有一定影响。该会成立后，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在南京、成都以至法国巴黎都有分会，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等皆为其成员。

9点整，与会代表环亭而坐，品茗畅叙。大家推举从南洋宣传救国回来不久的刘清扬主持座谈会。

开始，即由邓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使与会者颇感兴趣。

接着，周恩来阐述了觉悟社最近提出的“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的建议，他说：“我们青年不只要联合起来，而且要到群众中去，开展工农运动，这对青年运动的最终成败，起着关键作用。”这话很新鲜，有人不禁额手称善。

继之，邓中夏介绍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情况。

最后，在众人瞩目下，李大钊作了发言。只见他轻轻煽着一柄白折扇，蔼然而笑，像谈家常似地，显得平易近人，他说：“……青年们要确立共同的、明确的‘主义’，此为联合之基础。须知‘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态；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他未道出“主义”之内涵，但从刚才邓中夏有关少年中国学会的介绍中，大家已明白，李大钊先生所谓之“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主义。望着面前一张张生气勃勃的面孔，李大钊也有些激动，他收起折扇，双手在胸前缓缓地挥动着说：“我希望你们带动更多的青年学生同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因为20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

不久，这几个进步团体的代表，又聚会于沙滩红楼李大钊办公处，订立了《改造联合宣言》，制定了《改造联合约章》，规定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联合起来“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切切实实做点事”。

诚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上述口号和步骤之确定，尚有不够明确、完善之处，但在20世纪初叶，他们能认识到，要搞革命必须有正确的革命理论（“主义”）作指导，知识分子必须到工农中去，把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方可取得胜利。就这，无疑是有历史意义的。此后，李大钊创建了中国北方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邓中夏则深入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间去了。未到会的毛泽东，在长沙联合“湖南改造促进会”人士，与谭延闿、赵恒惕等军阀展开斗争。周恩来准备去欧洲考察西方社会真相，了解诸种改造社会之学说主张，以便日后应用于中国……

陶然亭聚会及其制定的《宣言》、《约章》已在孕育着果实。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33年10月在南京遇害。

恽代英（1895—1931）：江苏武进人。中国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国青年》主编、上海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31年在南京遇害。

见《少年中国》第二卷五期。

谭延闿（1876—1930）：字祖庵，湖南茶陵人。光绪进士。曾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

赵恒惕（1880—1971）：字夷午，湖南衡山人。曾任湖南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

自维新变法以来，中国社会盛行着一种出洋留学的主张，当时，留日、留法勤工俭学和到俄国去，在青年中风靡一时。李大钊建议周恩来去欧洲，为此，他曾安排一位在北大执教的俄国教授与周恩来见面，意图是清楚的，但周恩来未去俄国，而是决定去法国。李大钊对周恩来的这一抉择，表示理解。

斯时，由蔡元培任会长的留法华法教育会，正在物色一部分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南开大学校董严范孙遂推荐了周恩来和比周恩来低两届的李福景赴法留学，这一建议获校长张伯苓的赞同，并为周恩来、李福景争得了名额。严范孙还特地给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写了信，这件事却使周恩来有些疑惑，他捏着信竟无什么表示。

“你要知道，顾氏签署凡尔赛和约，是不得已而为之。”严范孙说，“可他并未去凡尔赛，签字后即取消了凡尔赛之行回国。决定签字的不是他，他只是执行。身为外交官，他不能不听命于国内的指令。”稍停，又说，“我这信，是请他对你们予以照应……”

周恩来没作声，将信放进口袋。接着，严范孙又资助了他们500元出国费用，以外汇支票让本人携带。

于是，周恩来和李福景到了北京，10月8日，从设在东单大方家胡同的北京华法教育会，得到留学证明书。在京期间，大律师刘崇佑也资助了周恩来500元，使他喜出望外。回到天津，他抓紧料理出国前应做的一些事。

10月12日晚，夜色迷蒙，周恩来走进南市东兴大街转角的一幢小楼，9月15日刚创刊的《新民意报》社即设在这里。他见到了马千里、时子周、孟震侯等狱友，还有各界联合会的刘铁庵（刘清扬三哥）和张寺晨（马千里的朋友），他们都是该报的集资人。周恩来即将出国，不能参加办报，但在该报筹备期间，对它出版后的立场、主张、内容设置和经营方式，曾提出不少见解和意见。而且，他还为《新民意报》社写过牌子，油漆后已挂在门口。他心中一直惦记着这份报纸。

今晚，他是来辞行的。马千里要他对已出刊的报纸谈谈看法，他并不推辞，仿佛他就是报社的一员。

“从已发表的《拙笨的日本当局》、《天津双十节第九次经过》、《唐山矿工惨毙》等文章看，《新民意报》的确是代表民意的。”周恩来说，“报纸造就舆论，而舆论是为利器，它能打开我们所要走的道路，诸君任重道远啦！”

随后，他将自己在狱中写的《警厅拘留记》手稿交给马千里。

“未得誉清，务请先生予以修正。”周恩来说。

“放心吧，”马千里握着他的手叮嘱道：“万里迢迢，要多珍重。”

时子周、孟震侯等也对他勉励了一番。

离开天津的日子愈来愈近，周恩来紧张有序地做着一些必要的交代。

蔡元培（1868—1940）：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字子民，浙江绍兴人。光绪进士。曾组建中国光复会，任会长。民国成立后，历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1940年3月5日病逝香港。

顾维钧（1838—1985）：民国外交家，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驻英公使。后长期在驻外机构服务。1985年在纽约病逝。

一天，他来到常策欧家，将自己看过的一张《湘江评论》和四五本《敬业》杂志，另有一只四楞凹凸的紫铜笔架，拜托常府代为保管。

稍后，他去《益世报》社辞行，并受聘任该报驻欧特约通讯员。

临走前的事情，千头万绪，可是，周恩来没有忘记跟邓颖超的约会，也许，这是他跟一个女性的第一次约会。

周恩来的魅力是特殊的，这种魅力蕴含着他的才干、见识、气质以至他的外貌，一直吸引着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他的身边不乏女性，即以觉悟社来说，口若悬河、冲锋陷阵的刘清扬，沉稳老练、坚韧不拔的郭隆真，热情似火、清秀机灵的张若茗，还有李毅韬、吴瑞燕、郑漱六等跟他都很亲近，自然还有年龄最小却聪敏过人的邓颖超。其中，张若茗似乎特别喜欢和他在一块，能与他一道赴法留学，亦使张若茗感到说不出的兴奋。只是，她们和周恩来之间也仅仅是亲近，这种亲近是爱国运动的风风雨雨陶冶而成的。

倘若以花卉作比，这些年轻的女性，似梅似兰似竹似菊……都是颇具节操的，在她们中间，邓颖超跟周恩来接触也是比较多的。

从交谈中周恩来知道，邓颖超的父亲邓庭忠曾是广西南宁镇台，而母亲杨振德乃续弦。邓颖超出身时因为是个女孩，父亲欲将她送人，母亲以死抗争，才挽救了这条小生命。三岁时，父亲因“欺君”之罪，被朝廷发配新疆充军，三年期满，邓庭忠正欲归家，孰料竟暴病而卒。从此，母女颠沛流离，相依为命……

自然，邓颖超也了解到周恩来自幼丧失过继父母和生母，家道中衰，窘困连年……

不过，接触中，彼此谈的更多的是爱国运动，“革心”、“革新”的共同信条，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秋夜，月光是那般皎洁，海河上吹来凉爽的风。河畔，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悠缓漫步，两人似乎有说不尽的话，谈朋友的星散，谈觉悟社的未来，谈各自的打算，却没有涉及一个爱字。一贯抱独身主义的周恩来，近年虽很少谈论这个主张，可他也从没向一个女性表白过自己的爱，这方面，他是很执着的。早先，出狱后，刘崇佑大律师也曾有意将女儿许配给他，他像当年对待严范孙的提亲一样婉谢了，两位长辈对他的“冒犯”非但未予责备，反在出国之际慷慨解囊资助，这使他内心感激不已。是的，他不急于别人的介绍，也不急于自由恋爱，即使对邓颖超，也不例外。只是，他心中深埋着难舍的留恋，也许，这是兄长对妹妹那样的感情。邓颖超呢，尽管她的思想已站在时代前列，可是，要谈论爱情，似乎还不到时候，她才16岁，何况，这种事无论何时也得听听母亲的意见。对于周恩来的远行，她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她不想说，怕说不清楚，她有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这不，她脚步停了下来，从拎包里取出一件东西塞给周恩来。

“什么？”周恩来茫然中笑问。

“自己看。”邓颖超也报之以笑。

“啊，毛衣！”周恩来惊喜地说。

“据说西欧的冬天很冷，助你御寒。”

《湘江评论》：“五四”时期（1919年7月14日）创办之周报，毛泽东主编，共出五期，8月被军阀政府查封。

“谢谢。”周恩来似有所悟，却没好多问。

夜，渐深渐凉，周恩来伴着邓颖超，将她送到家门口，两人握手依依道别。

很快，周恩来回到法租界泰隆栈住处。灯光下，他急切地打开包裹，翻看着，见毛衣领子内侧绣了一行娟秀的字：

给你温暖——小超

顿时，周恩来心潮涌动，在这寂寥的寒夜，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嘴里喃喃念叨着：“啊，小超……”

这最后的日子，周恩来一方面自己作着准备，一方面还要跟同时出国的郭隆真、张若茗、谢树英等不断联系，提醒他们该做的事。

一天，父亲贻能找到他，带来一个叫徐天骊的青年学生，说是自己一位朋友的弟弟，也去法国留学，嘱他关照。虽说出发已是个把星期的事，周恩来还是把徐天骊送进天津华法学校去补习法文，并帮他办理了赴法手续。

月底的一个晚上，周恩来要徐天骊陪他去一位赴英的同学家洽谈些事，徐天骊见这家陈设考究，便瞧这问那，暗生羡慕，这让周恩来有所觉察。归途，他边走边说：“天骊，如今，国难当头，我们年轻人要胸怀大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应当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不要羡慕那些豪华的排场。这次，我们去法国勤工俭学，顾名思义，就是要准备吃苦的，你说是不是？”

徐天骊被一语点破，愧疚地说：“是这个理……”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一定要下决心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练，去寻求真理。”

“我明白了。”徐天骊说着忽又迟疑起来，“只是，我是云南‘老土’，从未出过远门，这回要飘洋过海，远离祖国，怕会碰到许多困难。”

“嗨，要追求真理，非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不可。”周恩来鼓励道，“你看过《西游记》吗，这次赴法求学，就要有唐僧取经的精神，不要怕，我们同行的人很多，团结就有力量，大家会相互帮助的。”

“嗯，”徐天骊应道，“我相信。”

离开天津的前一天，周恩来又见了陈学荣、王文田、王静生等觉悟社的小社友。他在狱中时，这几个小社友都去探望过，出狱后，他还抽空教过他们“白话文”。今天，他是来向他们辞行的，并将自己的照片每人送一张，这是张大半身像，穿着深色长衫，目光沉毅亲切。他题了上下款，并在像片右下角注明了时间：Oct . 20。

10月底，周恩来离开天津，途中在南京停留，住城南绣花巷一号，与堂叔婶弟妹，享受了几日天伦之乐。旋赴沪，盘桓之际，于霞飞路法国工部局大议事厅，出席了寰球中国学生会、华法教育会、上海留法俭学会等团体召开的欢送会。举办者向留学生们分赠了国旗徽章，以志不忘祖国。

11月7日清晨，第15届赴法学生团，周恩来、李福景、郭隆真、张若茗等197名中国青年学生，从汉口路码头，乘黄浦(Whangpo)小轮到杨树浦，登上法国邮船“波尔多斯”(Por-tous)号，10时整，邮船缓缓离岸，驶向茫茫大海。

三年前，东渡日本，是那样一番经历，周恩来不禁感慨系之……

三年后，西去欧土，目标已比较明确，壮丽的憧憬激荡在他的心胸，凝

望着渐渐隐去的海岸，他默然自白：再见了，祖国！我，会回来的……

第六章 欧行萍踪

1 在海上——初到巴黎——英伦考察——心系同侪命运

“波尔多斯”号邮轮由东海向南海驶去，周恩来一行乘坐的是特设舱位——统舱，在船头下层，系货舱所改。这里光线昏暗，空气污浊，堆放着各种货物，上下铺位的简易床，像沙丁鱼罐头似地塞满了这群赴欧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

船上伙食是西式的，也很简单，主食是面包。菜肴或荤或素，牛肉、豆羹、洋芋头、白菜什么的。集体会餐，餐毕，轮流洗涮碗筷、擦桌子、扫地，不乏劳动的乐趣。

船抵香港停泊一日，对这块屈辱的土地，周恩来想看个究竟。原来这是一个华洋杂处的社会，尽管树木荫翳，商旅云集，可高楼大厦与贫民窟却形成鲜明对照，持枪的廓尔喀雇佣兵四处游荡，大公司屋檐下，蜷缩着贫病交加的黎民……

几天后，船经鸿基抵西贡，港口泊着许多华人船只，奇怪的是竟一律不挂中国旗，一打听才知道，中国国际地位太低，遭西方列强蔑视，倘若挂中国国旗，非但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反而会招致种种意想不到的麻烦。

“一出国门，中国人就受欺侮！”李福景感慨地说。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日益加剧，这固然令人愤慨，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也是国势濒危的重要原因。”周恩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封建帝制，诚然是一个伟业。可是，接着又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外寇家贼，生灵涂炭，人民忍无可忍，这才爆发了‘五四’运动。唉，积贫积弱的中国，已到了沦丧的严重关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等莘莘学子，焉能坐视不问？”说着，他转向李福景，“新慧，你今后想做什么？”

“去英国学土木工程。”

“你呢？”他问一旁的谢树英。

“到德国学采矿。”

“好，学有专长就好。”周恩来说。

“恩来，你有啥打算？”谢树英笑着问。

“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周恩来应道，“本此目标，选择课目。”

间忽，他凭栏远眺，但见水天相连，舟楫往还，巨浪层层相叠，海鸥翔集散离……几乎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画面。

夜晚，月挂天际，十分遥远，大海已由深蓝变成黝黑，狂风掀起的一道道巨浪，像闪电不停地在眼前划过，闹腾了一阵又复归平静，周恩来邀郭隆真和张若茗去甲板散步、聊天。

“真不知到了法国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张若茗说。

“是不是后悔了？”周恩来问。

“怎么会呢？一想到跟你，跟隆真姐在一块儿，我高兴还来不及哩。”张若茗说，“不过，我这次出来也真不易，隆真姐，你是最清楚的……”

“是啊，”郭隆真转向周恩来，“若茗出狱后回到保定老家，父母为防她在外边继续‘胡闹’、‘惹是生非’，想方设法给她找婆家……”

“噢，”周恩来有点惊诧，忽又问，“找到没有？”

“去去去，难道你不了解，我跟你一样抱‘独身主义’。”张若茗冲周

周恩来嫣然一笑，“三年前，隆真姐坐‘亮轿’到‘男家’向宾客发表抗婚演说的事，一直在激励我。我决心抵制包办婚姻，在隆真姐的帮助下，我到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报了名。谁知消息走漏，父亲派人找到我，谎称母亲病重，要接我回去。我不糊涂，第三天一早，给家里留了封断绝关系的信，就不辞而别，去了北京……”

“若茗找到我，于是，我跟她都住在我妹妹家。”郭隆真说，“真要感谢刘崇佑大律师，他知道我们要去法国留学，赠款300元。”

“接下去，恩来，就多亏你了。”张若茗说。

“真没想到若茗还有这段经历，”周恩来心中不禁佩服，“其实，多亏我什么呢，你到天津，我能不推荐？”

“是你教我怎么做的啊！”

是啊，当时，周恩来出主意，让张若茗去找刘清扬的父亲担保，向天津学联“借支”了代为保管的、抵制日货时“万德成”店家罚款中的1000元，作为出国费用，这才成行。

“我不会辜负这笔款项，学成之后回来替国家服务。”张若茗说。

这种无拘无束的交谈，多少化解了旅途的枯燥和劳顿。

一周后，“波尔多斯”号抵达新加坡，这里也是英国殖民地。

周恩来想离船改乘下一班轮，以便和蔡元培先生同船赴法。蔡先生，他是认识的，早在1917年5月，应张伯苓之邀，蔡先生曾去南开，就“思想自由”发表过演说。当时，即由他担任记录，旋又将这篇演说整理先后发表在《敬业》和《校风》杂志上，并给蔡先生寄了两本。他知道蔡先生学贯中西，倡导科学与民主，威重海内。如今，又是华法教育会会长，尚能与他同行，自可从他那里了解到法国和欧洲的一些情况，并能从新加坡弄清下一班轮抵法日期，以电告已先期到达法国的盛成，约定几人在里昂会面的日子。

周恩来和郭隆真、张若茗等暂别后留下。在新加坡，他参观了博物馆，了解到华人开拓这个商埠的历史。此外，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整理《检厅目录》。这份资料，出狱时尚未脱稿，出狱后无暇顾及，他索性带在身边，在船上断断续续地整理，现在，他利用等待蔡元培的时机，做了增补……

5天后他才得知，蔡元培乘坐的“高尔地塔号”邮轮11月24日离开上海，于是，他有了较为充裕的时间，把《检厅目录》作了仔细的修定。当看到厚厚一叠手稿终于整理完毕，他如释重负，旋又提笔写下《检厅目录例言》，说明《目录》是从男代表“每天日记中采取重要的转录”，而女代表因无日记，又单独生活，故“无从采录”。而“书内的公审问答辩护详情，同稿件上的修正，全由马千里先生成的，特志于此，谢马先生的厚意热忱”。

就在蔡元培离开上海的同一天，周恩来将《检厅目录》邮寄天津马千里。倏又拍了封电报给盛成，请他于12月28日到里昂与大家会合。

12月3日，“高尔地塔号”抵新加坡，早就来到码头的周恩来，顺利地接到了蔡元培先生，还有张申府、刘清扬和陶尚钊。

盛成（1899—）：江苏仪征人。早年留学法国。曾任中华书局编辑、中央大学教授、台湾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语言学院法语教授。

张申府（1893—1986）：又名崧年，河北献县人。参与创办《每周评论》并任《新青年》编委。1925年退出中共，投身于民主运动。曾任北大、清华等校教授、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农工民主党中央顾问，1986

张申府在北京时，已加入了李大钊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他跟刘清扬正在恋爱。15岁的陶尚钊，竟也加入了勤工俭学的行列，见到他们，使他有说不出的高兴。

他向蔡元培追述了当年在南开听其演说时的激动，并提到寄出《敬业》、《校风》的事。

“收到，收到，记叙详尽，甚合吾意，”蔡元培笑道，“原来‘飞飞’、周恩来乃一人耳。”

接着，蔡元培询及周恩来等的经历，对他们赴法勤工俭学多有鼓励，说：“不俭之学者，易驰心于外务，以耗其学力；律之以俭而学益专。”望着身边求知若渴的学子，他的心情也不平静，“诸君赴法，无非欲求法国之文化而改良中国，但外国社会并非事事皆可效法，故望君等至法后，务需细心选择而仿效之，以补吾国之不足，庶几将来有造于中国也。”

“高尔地塔号”穿过马六甲海峡，在浪山波谷中大幅度地摇晃着，折腾了三昼夜，到达锡兰的哥伦布港，旋继续前进，经亚丁湾，驶近红海入海口。这时，船上旅客被告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块水域曾埋设了大批水雷，尽管这场战争结束快两年，水雷却没全部排除，为防不测，按惯例，凡过境旅客一律要带上救生圈进行练习。周恩来按照水手的提示，很快套上救生圈，并帮蔡元培先生和陶尚钊套上，入列练习。预报使众人担惊，所幸什么也没发生。船，不停地行驶，渐渐靠近法属殖民地吉布提，入红海海域。他们尽情观赏了红海的日出日落，不知不觉，船出了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入夜，运河两岸灯火灼灼，船边水声哗哗，舟楫穿梭，煞是繁华，旅客都不约而同地登上甲板或置身船舷观看。

苏伊士运河尽处，长堤一道，直伸地中海。堤上有铜像一座，面东而立，左手携一图册，右手斜伸指着运河，乃开凿运河之Ferdinand Delesseps(迪莱塞普斯)。很快，邮船驶入地中海，与波涛汹涌的印度洋相比，地中海显得风平浪静。“高尔地塔号”开足马力，直驶法国马赛。最让周恩来激动的是看到了火山的喷发，那烈焰腾空的“屏幕”，染红了半边天，是何等壮观、何等惊心动魄！

法兰西愈来愈近了，不久，视野里出现了高高耸立的炮台和众多的樯帆。啊，马赛到了！

这一天，是1920年12月27日，周恩来不曾停留，乘夜车赶赴里昂。

里昂火车站对面的一家旅店，是预定的会面地点。在这里，盛成迎接了蔡元培、周恩来、张申府一行。见面后蔡先生即离开，其余的人在一块畅叙了两天。随后，周恩来来到巴黎，李愚如在车站迎接他，天气很冷，周恩来穿着一件青哔叽大衣，手插在衣兜里，显得异常兴奋。他和陶尚钊，由李愚如引到附近一个小馆子，吃了通心粉和洋白菜汤。

“恩来，你在给我的诗中说：‘三个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那是6月的事。”李愚如说，“我是10月来巴黎的，也才几个月，我们就见面了，莫非是上帝在保佑我们？”

“上帝保佑？”周恩来爽快笑道，“没那回事。不过，我真向往法国，向往便产生动力，加上意志，事情也就成了。”

“你那首诗，我一直保存着呐！”李愚如又拍了下陶尚钊的肩膀，“诗

能到我手里，得谢谢尚钊啊！”

“他呀，”周恩来看看着表弟，“开始不同意一人单独先期出狱，后来是让族中长辈陶蕴苍老先生硬拉出去的。”

“若不是表哥你让我带诗和信给愚如姐，硬拉我也不走哩！”陶尚钊调皮地一摆头，“不过，我也不能薄了老先生的面子，算是半推半就出来的吧！”

这话把周恩来和李愚如都逗笑了。

495

陶尚钊是周恩来的表弟，李愚如则是陶之大嫂李锡嘏的堂妹，三人沾着亲，谈起来颇为融洽。

在巴黎，周恩来和陶尚钊租赁了西郊枫丹白露一间旅舍住下。此地距巴黎百余里，林木繁茂，峰峦隐露，系巴黎人之避暑胜地，路易十三、拿破仑一世曾设“离宫”优游。意外的是，这里居然有一座中国博物馆，陈列着庚子年间法军所掳清宫文物，水晶玉器，目为之炫。周恩来观后，感慨莫名。但不管怎么说，初来乍到，枫丹白露迷人的景色，委实是大自然赐予的一种享受。

李福景决定报考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已于一周前去了英国。周恩来初抵巴黎感到身体不适，何去何从，他一时尚未拿定主张。曾想留下勤工俭学，可眼下已临近寒假，如想入学那是新学期开学之后的事，他不想等，决走去伦敦会会窗友，并实地考察英伦社会状况。

1月5日，他乘船穿过英吉利海峡，直抵伦敦，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伯纳德街35号一座寄宿公寓住下，他填报了爱丁堡大学。

留英的一些南开窗友得知周恩来已到，都十分开心，常策欧、严季冲等都见了面。他们请他吃烤牛肉，这是一家百年老店，依然沿袭着传统做法，冒着热气的烤牛肉是用小车推到顾客面前来切的。严季冲要了一份，竟是一块肥膘，而车内分明有瘦嫩的腿肉，周恩来疑惑不解。这时，车转了个方向，只见一位珠光宝气的贵妇人递上一便士小费，遂得到一盘瘦肉。严季冲旋又招呼侍者过来，同伴递上一便士，侍者随即将肥膘换成瘦肉，这瞬间发生的事，引得周恩来不免哂笑。几个人边吃边聊，彼此畅叙往事，展望未来，言辞间充满年轻人的豪情壮志。

周恩来一面等待爱丁堡大学的通知，一面阅读大量报刊，研究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局势。一战刚刚结束，欧洲各国经济受到战争的影响甚巨，英国也不例外。战争创伤未及医治，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置身其间，引发了周恩来的深入思考和诸多感触。

出国前，他受聘于《益世报》。这期间，他不顾伦敦的严寒和浓雾，频繁深入工矿和码头，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为《益世报》撰写长篇通讯。在这些通讯中，他详述了一战后英国的失业状况，评论英国的机构和议会民主，并对工党感到兴趣。他的观察和感受，在发往国内的一些信函与文章中均有所表述。

他在给堂伯父周贻鼎的一封信中写道：

“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惟此地是赖……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

而在给天津《益世报》的第一篇通讯中，他又写道：

“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之巨大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

考察中，周恩来看到战争的破坏是全局性的，“四年影响所及，欲其求免于穷困也难矣”！他相信“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烈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①是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但究竟哪一种学说能正确指明人类社会和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采用什么方法来改造中国最适宜？周恩来在观察、思考、比较……

旅英旬余，他给表哥陈式周写信。式周即他嗣母陈氏的内侄，周恩来童年时代，式周曾给他以教益，这些年也未中断联系。他敬重这位表哥，在信中坦露了自己的种种想法，他写道：

“……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虚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

接下去，他的笔触及了对社会革命的分析：

“……稳之极，为保守；躁之极，为暴动。然此亦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动成功者，如今日之苏维埃俄罗斯也。”

他比较两者之区别：

“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伐，不改常态，而求渐近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

可是，这两种方式哪一种适用于中国呢？周恩来尚捉摸不定：

“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

在这里，周恩来倾向于“取俄取英”、“得其中和”，吸收适用于中国的，实行之。当然，他仍在思考之中，并未形成坚定而明确的观念和主张。

这段时间，他还一直在关心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的处境。这两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已达 1700 人，几乎分布于法国全境，比较集中的据点有巴黎、克鲁邹、圣德田、圣西门、勒哈佛尔、里昂，此外，在赖华沙、卢瓦尔以至大西洋的沙滩、天蓝岸花园、乐么田庄、蒙白里农场，都有中国学生。他们当铸工、钳工、翻砂工、搬运工、建筑工、煤矿工、园艺工、农场工……最脏最苦的活儿都摊在他们身上。可是，欧战结束之后，法国生活程度极高，工厂原料缺乏，产品滞销，各地工厂多数倒闭，连法国工人都纷纷遭到辞退，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命运便可想而知，绝大多数无工无钱，不蔽风雨，在饥饿冻馁中挣扎……这一切，时常在周恩来的脑际萦绕。他给严范孙写信，告诉这位学界名流：“留法界最大问题即勤工生不易找到工作，饥饿之人日围绕于华法教育会办事处，而办事之人亦苦无办法。”何以如此呢？他认为：

见 1921 年 3 月 22 日天津《益世报》。

见《周恩来书信选集》P23—24（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1 月版）。

见《周恩来书信选集》P17—18（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1 月版）。

“缘勤工学生来法时，国内方面并未经严格的审查，法语未谙，技能未具，而身体复不强壮，徒恃一时热狂勇气，贸然来法，偶遇折磨，豪气全消，即使心有余而力亦不足供其用。且上三项困难能尽免矣，而工作之寻找亦不颇易，因法国工人固不甚欢迎中国人之以贱资夺其地位也。”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此也，勤工同学来法之最终目的，固为聚钱念书，但按现状论之，凡勤工者即无复有相当之读书机会。每日工作八小时，身体疲劳的恢复即需要长时间休息，更何有读书自修之可言？加以每日工资并不甚多，使稍多开销便无积蓄希望。刻苦甚者或能于长期工作五年后，得储有三年之读书费。然中间经五年之荒废，时间、年龄、脑力之损失，不知凡几。欲其复如昔日之安心念书，固非易事。”

这时，正好海外大学里昂部行将开学，吴稚晖、李石曾等主张以低费用吸收国内贫寒学子来法受欧化教育，但对于已来法国之勤工学生，则殊有置之不理之嫌。周恩来觉得不妥，“以为勤工生之救济，舍里昂大学外实无再善之所”。他将这一切函告严范孙，希望通过严范孙的周旋，使国内诸贤达教育家和有力之士设法救济困厄中的勤工俭学学生。

至于他本人，拟入大学读书三四年，然后再往美国读书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陆游览，以考察欧洲之社会实况、民族心理……

不久，爱丁堡大学通知到了，准备接受他，且无需通过入学考试，只要进行英语测验。

“太好了，爱丁堡甚是优待你啊！”同居一室的李福景闻之向他祝贺，“英语测验不成问题吧？”

“我想不会有问题。”

“预祝你成功！”

“可是，”周恩来从激动中冷静下来，“新学期要到10月开学，现在才2月，在秋季到来之前，如何生活呢？”

“我们一道想想办法。”

“不，不行，”周恩来说，“英国生活程度之高，英镑价格之长，为各国之冠。我算了一下，英伦费用年需英金200镑，合今日中币已逾千元以上，爱丁堡虽省，亦不能下千元，其他费用尚不论……”

“申请官费，论你的条件是可以的。”

“倘官费不成呢？”周恩来脸上泛出苦涩的笑。

只是，他并没有立即离开。在此期间，他就考察所得，替《益世报》撰写了长篇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指出“危机”集中反映在“商务之停滞，生货之缺乏，资财之不足，税则之重敛，物价之腾贵，工厂之倒闭。凡此种种，均互为因果，以至于产业不能振兴，而工人失业也”。那么，解决之路安在？他认为“其大旨均不外农业之开拓，求所以自给之道；商业之恢复，求收回战前地位；并谋所以扩充各工业之赞助，以图外输货物之增加。凡此数事，固各国全国一致所主张者”。

又称里昂中法大学，1920年3月由留法华法教育会筹建，同年9月正式招生。

吴稚晖（1863—1953）：字敬恒，江苏武进人。时任筹建中之里昂中法大学校长。

李石曾（1881—1973）：河北高阳人，李鸿章之子。时为留法华法教育会主要负责人，参与里昂中法大学筹建。

见1921年3月22—23日《益世报》。

周恩来在这篇通讯的结尾，特别谈到了这场危机与中国之关系。指出：“然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烈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使赔款而终有济也，则德人取偿之术，又岂能处于奖励产业，辟新商场于欧土以外，而同时协约国得其偿款，其奖励产业与辟新商场，其法亦正相同，吾中国必为其消化之所，固无用置疑。”

周恩来一方面预言“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另一方面指出西方列强对中国倾销产品，乃是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之新招。他“记其近况，以为国人告”，其动机在警策国人。

高昂的生活费用难以为继，他的心情相当矛盾。他并不喜欢伦敦这座多雾的城市，这里的房子总那么狭小、丑陋，建筑格局千篇一律。可是，据说北方的爱丁堡天空是明净的，何况，爱丁堡大学已来通知，只考一门英语，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机会。还有，他对英国社会已有了浓厚兴趣，尤其是这里的工人阶级的劳动、罢工以及工党的发展，也一直在吸引他。他跟伦敦东区的一些工人已成为朋友，而考察才开了个头。但他还得走，况且，大批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他一直惦念着，总放心不下。对法国也还一无所知，他需要深入地去了解和考察。再者，那边的生活费用每月合中币仅40元，较英伦省得多。这样，他可以边读书边继续他的社会调查……

2月中旬，周恩来结束了在伦敦五个多星期的逗留，回到巴黎。

2 蒙达尼、蔡和森——“二·二八” 事件——再赴英伦——拒款风潮

科隆，巴黎郊外一个美丽的小镇。

周恩来以“约翰·奈特”的化名，寄宿于这里的一户人家，房东和邻居都亲切地叫他“骑士先生”。他的彬彬有礼赢得房东老太太的喜欢，像对子女似地关心他，不时地夸他。他白天补习法文，进行社会考察，夜晚则翻译小册子，给《益世报》写通讯。因时常熬夜而显得睡眠严重不足，精神疲惫，只是，他似乎在强制自己适应这种生活。

两三个星期后，他又搬到巴黎以南卢瓦雷省的蒙达尼镇。张申府和刘清扬注在那儿，邀请他住过去，盛情难却，似没有理由拒绝；而且，蒙达尼有所阿利昂法语补习学校，那里集中了许多中国学生，他们并已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

周恩来欣然前往。一到那里，便见到了蔡和森、蔡畅及其母亲葛健豪，还有向警予等人。在天津时，他就知道蔡和森和毛泽东，都是湖南学界的领袖人物。他们是去年年初抵法的。和森西装革履，一头浓发，谦和而不失庄重。警予、蔡畅皆着青布棉袍，头发剪得很短，额前蓄有刘海，与国内一般青年女子装束无二。只是，警予嘴角总闪着笑意，温和而朴实。蔡畅却显得较为活跃，一双眼睛特别明亮。葛健豪老人年逾五旬，竟和子女一道万里迢迢越洋留学，这使周恩来特别感动，看上去，老人平易，和善，此刻，正坐

英文“奈特”（Knight）意思是“骑士”。

蔡和森（1895—1931）：湖南湘乡人。早年同毛泽东一起建立新民学会并创办《湘江评论》，曾主编《向导》周报；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被害于广州。

蔡畅（1900—1990）：湖南湘乡人。蔡和森胞妹，国妇女运动领袖。1949年后任中国妇联主席等职。

向警予（1895—1928）：湖南溆浦人。曾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主编。1928年被害于汉口。

在窗口刺绣。

“资本主义发达之法国，比起落后的中国，表面上千差万别，本质一样黑暗腐败，”寒暄过后，蔡和森便激昂地说起来，“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对立，工人农民无权，备受压迫剥削

“一见面尽宣传你的‘主义’，急啥呢？”向警予嗔道。

“我正想听听哩。”周恩来说。

“日子长得很，慢慢说……”葛健豪老人抬头道。

“好吧，那我们谈些别的。”蔡和森顺应了母亲，遂与周恩来谈起各自了解的勤工俭学情况。

交谈中，周恩来的目光不由得移至壁上的一个玻璃镜框，里面镶着蔡和森、向警予的结婚照片。只见两人并肩而坐，共同捧着一本翻开的《资本论》，实在耐人寻味。

“啊，‘向蔡同盟’！”蔡和森自得地作了介绍。

“我们是自由恋爱……”向警予补充道。

显然，这是共同信仰基础上的结合，话，不言而喻。

“老人家一定很高兴。”周恩来转向葛健豪，笑道。

“我是赞成的，”老人说，“是凡他们两人觉着对的，我都赞成。”

“要不，母亲焉能来法国，当个‘老学生’……”蔡畅说着，伏在老人肩上咯咯地笑个不停。

初次见面，恁般无拘无束，畅所欲言，真可谓一见如故。

蔡和森到法国，比周恩来早了近一年。在最初几个月，他“猛看猛译”，阅读了几十种小册子，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世界大势和俄国革命的情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这时，他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主张走俄国人的路，尤其对阶级与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早在去年8月13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此外……我对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他所说的方法即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

毛泽东很快于12月1日给蔡和森和在法诸新民学会会员复了一封长信，对蔡和森等立即组织共产党，走俄国的道路，通过彻底的革命改造中国社会，特别是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色彩”，“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即国际主义）“表示深切的赞同”。

蔡和森在前信中对世界革命大势作了透彻精辟分析，再三强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认为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在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造社会经济制度。”

稍后，9月16日，他在另一封信中，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即唯心主义）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和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坠入迷阵”。信中还写道：“我以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国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与消费？”

毛泽东于年底才见到这封信，蔡和森的卓越见解，令他兴奋不已，即刻作复，热情地写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同样看到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的重要，强调“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而且明确地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基础”。

蔡和森是这样，而周恩来早在1918年旅日期间，即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时，在狱中，他又系统地传播过马克思主义，而且，跟李大钊的交往，更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抵欧之后，无论在英国或法国，他阅读了大量书报，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

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在国内即读过）。不久前，他从李福景处得到一本英文版《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竟爱不释手，一读再读。

这本书，记录了马克思1852年阐明自己对“阶级斗争”的三点新贡献：

“（一）阶级的存在，仅仅是跟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

“（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

“（三）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行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在这段文字下面，周恩来用铅笔划了着重线，标明其重要。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周恩来已掌握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要点，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可见，周恩来、蔡和森“一见如故”乃是基于共同的见解和信仰，两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上可谓不谋而合。因蔡和森的关系，周恩来参加了“工学互助社”并出席每周一次的“时事讨论会”，它是由法国左翼作家亨利·巴比塞组织起来的。与这同时，周恩来成了医学院路巴士卡咖啡店和先贤祠附近另一家咖啡店的常客，他借用这个场合跟蔡和森畅谈，往往一谈便是几个钟头，甚至通宵。

“……看吧，甚至在法国也充斥着强权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剥削以及工人阶级反对剥削的正义斗争，”蔡和森拨弄着杯里剩下的咖啡，似有所思地说，“在这里，虽然事情不像在我们中国那样可怕，但阶级冲突和剥削到处都是。如果我们要在自己的国家创造革命，我想我们首先应在法国组织一个革命小组，并同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共同战斗。”

这些看法，周恩来深以为是。他们相约作些准备，以促成这个革命组织的早日建立。

跟蔡和森推心置腹的交谈，常使周恩来感慨不已，自来法国以后，他觉得最大的收获之一便是同蔡和森的友谊。

巴黎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市之一。

塞纳河流经巴黎市区，处处透出迷人的风韵，秀美而宁静。河心那座巍峨的哥特式建筑“城岛”便是巴黎圣母院；河之西侧为卢浮宫，里面有米洛斯的维纳斯雕像和胜利女神雕像，以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河畔另一建筑是正义宫；沿河西望，可以瞥见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沿河两岸，遍布各具特色的公园，如画的园林景色、人体雕塑、喷泉和花圃随处可见，其中的“卢森堡公园”尤令人流连忘返。

此外，还有日新月异的时装、清淳甜美的佳酿、漂亮炫目的女郎……

一天傍晚，周恩来去游巴黎圣母院。他爬了几百级台阶直至房顶，见上面用作建筑装饰的千奇百怪的禽兽，犹如传说中的妖魔鬼怪，俯伏着身子窥探着人间。他眺望着雾蔼中渐入睡境的巴黎，如梦如幻；塞纳河水轻波荡漾，飘带似地从城市中心缓缓流过；晚霞辉映着远处苍绿的一片大森林，是那样光彩夺目，他情不自禁地用法语喊道：“太好了，太美了……”

欣赏了好一阵，他才下来，在临街的小吃店买了一只夹馅面包，在暮色中，边嚼边走向蒙达尼……

巴黎弦歌不辍，一片歌舞升平景象，人们对刚刚结束的那场大战留下的残壁断垣已习以为常，修复工程在缓慢地进行，城市的脉搏依然在强劲地跳动。

每天，周恩来穿梭于巴黎的一些社区，一个个时髦女郎与他擦肩而过。巴黎的女郎，大多金发碧眼，身段苗条，容貌秀美，她们目不斜视，步履匆匆。落雨了，习惯于夜生活的巴黎男女撑着伞，挽着手臂，行走如仪，情话绵绵，丝丝的雨，迷蒙的夜，别有一番情致……

有次，他和蔡和森在蒙达尼旁的乡野散步，谈到了自己的一些感受。

“你啊，”蔡和森斜他一眼，冷峻地说，“你不应陶醉于美色，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目光必须始终盯着劳动者的苦难和受到的剥削。”

“是么？”周恩来滑稽地一笑。其实，单就他在伦敦东区的经历而言，可是看够了工人那穷困、饥饿的遭遇。在英国，他还曾深入到几百米的矿井深处，看煤矿工人的采掘、运输，那暗无天日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他已把自己考察的印象、观感和思考写成长篇通讯寄往《益世报》发表。这一些，蔡和森并不了解，他也不想辩白。

不错，周恩来赞赏巴黎的美、女郎的美、夜色的美，可他并未“陶醉”，他从未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每当有人问起他的恋爱、婚姻时，他的回答总是：“我太忙了，还是让我独身一人好……”当然，这并不妨碍他跟女性的接触。这个时候，郭隆真和张若茗，曾从她们住的法国中部的布卢瓦来巴黎看过他，而且，张若茗单独来的次数要多些。出国前，她受聘担任北京《晨报》驻欧特约通讯员，因此，时常与周恩来交流写作旅欧通讯的事。此外，他们之间的话题还很多，但没有恋爱的成分，周恩来筑起了一道坚固的“独身主义”的城垣，将所有的女性，都拒之于外。

美色诱惑不了他，他知道自己该怎样去做。就在他与蔡和森相识没多久，1921年3月，在蒙达尼，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他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周恩来的人生道路，从此开始了根本的转折。

巴黎郊外哥伦布巴杭脱路39号，是一幢花园洋房，华法教育会会址即设在这里。旅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因经济拮据，难租住房，这里的底层地下室和楼后的活动房，则免费供一部分学生居住。

生活困难，入学不得，工作难找，严重困扰着抱有奢望来到法国的大批青年学生，与物质匮乏相比，精神的压抑更使他们忧伤和痛苦。

华法教育会的吴稚晖、李石曾非但不履行给学生找工作、安排食宿的职责，反藉口“经济困难，殊难救济”，忽于1月12日和16日连发通告，声明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而予学生生活费只能维持到2月底。

工读生闻之，莫不惊恐骇异。当此之时，异国他乡，举目无亲，饥寒冻

馁，谁给衣食？于是，学生转而向中国驻法使馆申诉，几经交涉，使馆才电呈北洋政府，复电称：国务会议议决，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并责成使馆办理。

这无异判处死刑。事情到了燃眉之急，华法教育会内骚动起来，学生们纷纷提出“直接行动”展开抗争，蒙达尼的蔡和森、王若飞、李维汉、陈毅、向警予、蔡畅等商量决定，于2月28日集会请愿。

这天，从北欧刮来的阵阵寒风，侵袭着数百名情绪激昂的青年。9时许，他们进城来到巴黎第七区中国驻法公使馆附近的塞弗方公园集合，准备列队向使馆进发，向公使陈箬请愿。陈箬清楚，勤工俭学学生聚众围公使馆，非国内学生向当局请愿可比，随即会在外交界产生影响，于国体友邦皆有妨碍。这次行动，使馆因有预闻不能无所防备，尽管陈箬刚刚到任，但在国内他经历过北京请愿的事，自然应付有方。

巴黎警方得到中国使馆通知，迅速派武装警察，在巴比伦街57号使馆外警戒，不准学生入内，这样，请愿队伍不得不在使馆外狭窄的街巷停下。经交涉，蔡和森、王若飞、向警予等作为请愿代表入内面见陈箬。可陈箬却在楼上，而让秘书出来敷衍，请愿代表不允，经激烈争辩，陈箬才在警察护卫下来到一楼会见代表。

“……由使馆向政府请求每人每月给400法郎，以四年为限。”蔡和森对陈箬说，“再有，法华教育会办的里昂大学和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无条件开放，任学生自由入校。”

“使馆职司外交，非生财之地，只能执行国内政府的指示。”陈箬不停地移动眼镜架，想笑又笑不出来，“诸位也都知道，我到任不久，情况不明，不过，我可以电告国内，设法救济……”

陈箬的推脱，激起蔡和森等的不满，继续与之辩论。陈箬坚持代表遣散使馆外面的队伍方可再谈，蔡和森则要陈箬出见众人，陈箬拒绝。

“先生，你难道不觉得自己身为公使，不顾侨民生活，有辱国体吗？”蔡和森大声责问。

“你！”陈箬恼怒，拂袖入内。

秘书再劝离开，代表则坚持陈箬出见众人，否则纵死不散。

陈箬无奈，带领几名使馆人员，由警察护卫，来到请愿学生面前，等稍静下来，他说：“……敝人的意见是，现时在校同学，使馆担任暂时维持，候工同学亦允暂时入校与现时在校同学一律。”

此即所谓“暂时维持办法”，虽能维持一时，但治标不治本，高校和断绝维持之恐慌仍威胁着大批学生。陈箬话音刚落，请愿者旋发出一片嘘声。

“政府令吾设法遣送诸君回国，实则筹此一笔川资，亦需巨款，使吾从

王若飞（1896—1946）：贵州安顺人。曾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殉难。

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曾任政务院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陈毅（1901—1972）：字仲弘，四川乐至人。曾任新四军军长兼政委，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陈箬（1877—1939）：福州人。民国时期曾任外交部政务司长、驻墨西哥公使、外交部次长、驻法公使等职。1939年初出任南京汪伪政府外交部长，为国民党军统人员暗杀。511

何筹起？公使馆费用，政府已两月未汇来矣，使馆挪借俱穷，更何能为诸君筹长久之后济？今为诸君向学校交涉延长一月，一方设法‘觅工’，一方速行组织，总有渐渐就绪之望。”

“不行，”人群中一片喊声，“陈公使要向国内电请。”

“国内的态度已很明确，”陈策说着一挥手，“我没有责任管这种事，你们去找华法教育会……”话说了一半转身就走。

众人紧紧尾随，意欲冲进使馆，有葛健豪老人在内的6名女生走在前面，向警予情急泪下，呼喊：“生存权！求学权！”眼看离使馆大门只有几步，警察立即跑到队伍前强行阻拦，遂发生冲突，学生中有数人受伤，一人在混乱中被电车轧死，四人被捕，请愿队伍随驱随散。见此惨状，蔡和森等几位代表在使馆久坐不去，至晚，方由警察挟出押至警署。蔡和森厉声抗议，指责警察之不公。

“此贵国公使指令也，无我等事。”警察头目说，“现在，君等可归寓矣。”遂将代表释放。

这次请愿，谓之“二·二八”事件，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毕竟迫使公使馆发给学生6个月生活维持费，并允继续替无工可做者找工作。

对这个事件，留法学生是有分歧的，蔡和森、向警予、王若飞、陈毅等来自蒙达尼的学生是请愿集会的“直接行动”派，而在克鲁邹等地工厂的赵世炎、李立三等学生则主张不靠国内施舍，是“勤工神圣”派。周恩来不属任何一派，这时，他已在英国，听说发生了这件严重的事，他立即赶往巴黎郊区哥伦布华法教育会。只见地下室、活动房和院子的布棚里挤满了众多的勤工俭学学生，有的沮丧，有的气忿，有的脸色苦不堪言。布棚里的条件尤为恶劣，床铺乱七八糟，有用高桌子的，有用矮凳的，有用一块块旧板架起来的，高高低低，极不整齐。各人的被褥都是国内带来的，有些似已几年未洗，白被单成了黑被单，有些外面已破碎，只留灰黑色被絮盖着，有些自己没被子，拾法人弃之破被来盖。各人床头都放着一盏酒精灯或煤气灯，天已漆黑，这才一齐烧饭，煤烟布满全棚，无异一个窑洞。湖南、四川学生喜辣，每将辣椒入锅炒起来，呛得全棚打喷嚏、淌眼泪。而吃的都是市场上最便宜的马铃薯、白菜、面条，令人忧虑的是，即使这般窘困的生活，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以后怎么办？

蔡和森去了巴黎，周恩来在地下室见到王若飞。他们在蒙达尼见过面，王若飞热忱豪放，善于言辞，详尽地向周恩来介绍了“二·二八”事件的全过程。

“当初进工厂勤工，原想养成劳动习惯，把性磨定，把身炼劲，以此作为达到求学之一种方法，并实际考察法国劳动真相，未料，现在吃饭都成了问题。”王若飞从鼻腔里挤出一声冷峻的“哼——”，倏又泛出一丝苦涩的笑，“在日本时还未遇到过这种惨状哩……”

“你到过日本？什么时候？”周恩来浓眉一展，问道。

“1915年，我曾随舅父东渡日本考察教育，1917年，贵州第一次派遣私

赵世炎（1901—1927）：四川酉阳人。参加领导上海三次工人起义，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等职，1927年7月在上海遇害。

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长等职。513

费留学生，翌年3月，作为自修生，我进了明治大学，‘五四’运动后的第四天，即‘五七国耻日’，愤而归国。”

“啊呀，1918年，我也在东京，我们怎么无缘相见呢？”周恩来说。

“噢，这么巧！”王若飞笑道，“那时，我尽力搜读社会主义刊物，还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和无政府主义的著作，思想可谓庞杂。”

“我也是。”周恩来欣然说道，“若飞，你我之经历，怎么挺相似呢？”

“是啊，是啊，”王若飞也显得很快活，“日本留学纵然未果，但至今，我仍感谢母校达德学堂对我的教育，那时，严范孙先生任贵州学政，对达德学堂尤为关照……”

“你见过严范孙先生？”周恩来猝然打断了王若飞的话。

“见过多次，是一位道德文章令人崇仰的蔼然长者啊！”王若飞盯着周恩来，“莫非你也认识他？”

“不瞒你说，我是天津南开学校毕业的，严范孙先生即为南开的首席校董，”周恩来说道，“而且，先生对我一直关怀甚殷，我能至法，亦与先生的资助有关。”

“啊，恩来，想不到与我俩相关的事竟这么多。”王若飞往周恩来肩上拍了一下，“往后，我们得多交谈。”

“对，能结识你这位朋友，太让我高兴了。”

“如今，社会是罪恶的，人民是悲苦的，我们要能耐劳，不畏难，战胜罪恶，战胜悲苦，创造一个理想世界。”王若飞脸上的忧郁渐渐隐去，“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不是某一个英雄人物能完成的，要组织群众。”

“说得好，”周恩来赞道，“不仅要组织旅法的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还要组织国内各阶层的民众。关于这次‘二·二八’事件，我想再作些调查，尽快向国内通报。”

稍后，周恩来写成长达2.5万字的通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大波澜》，翔实报道了“二·二八”事件之来龙去脉，揭露

515

了中、法当政者对勤工俭学学生的迫害，对请愿学生的遭遇深表同情，而谈到他们提出的具体要求和做法时，也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

这篇通讯，署名“周恩来”，连续发表在同年5月9日至18日的天津《益世报》上。

“二·二八”事件后，无论是蒙达尼或克鲁邹等地的勤工俭学学生都感到有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必要。赵世炎、李立三等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填表的有七八十人，王若飞等也参加了。接着，赵世炎给蔡和森、李维汉等去信，并在返克鲁邹钢铁厂途中，绕道蒙达尼，同他们面谈了两三天。双方一致表示：争论已经过去，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一致行动。不久，赵世炎再次致信蔡和森，主张成立一个包括留法学生和华工中先进分子的共产主义组织。蔡和森欣然赞同，复信提议采用“少年共产党”的名称。此为成立旅法“少年共产党”的最初酝酿，时间约在1921年四五月间。

周恩来此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他一方面执行党的决议，努力完成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一方面仍注视着激烈动荡与变化中的欧洲。3月至5月，先后撰写了《德国赔款问题之决裂》、《一周间西欧政象之撮要》、《欧战后赔偿问题之近讯》、《伦敦会议再开幕之经过》以及《致德哀的美敦书之内容》等通讯，陆续发往国内，在《益世报》上刊载。让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读者，

了解到协约国与德国谈判赔款问题破裂之经过，以及战胜国与战败国，还有战胜国相互间的矛盾，使国人及时和详尽地获悉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之真相。

4月1日，英国爆发了百万煤矿工人总罢工，周恩来此时又离开巴黎到了伦敦。

在伦敦和别的一些工矿区，他仔细调查了这次罢工的全过程，了解了劳资谈判的情况，写成《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等7篇连续性通讯，寄回《益世报》。

他在文章中写道：欧战是“资本家特殊之时机，普通人民丧其力，破其家，毁其财，资本家且因之获无限厚利”。他热情赞扬矿工“其精神、其魄力、其勇敢，可属难能可贵”，倾向性十分鲜明。

周恩来深入研究了英国煤矿劳资纠纷的原因、过程；政府、资方分化工人、破坏罢工之手段以及罢工失败原因；同时又把英国煤矿工人与我国英商经营的唐山矿工作进行了比较，对我国工人的悲惨处境寄予深刻的同情。事情很明显，英国矿工虽苦，可每月工资多者10元，少者六七元。而唐山矿工，多者得铜元30枚，少者20枚，童工仅10枚，中英矿工工资悬殊竟达40倍。英国资本家在本国尚“有所忌惮”，而在中国，他们对矿工则“施虐待，役牛马”，为所欲为，何也？关键在“劳动者有组织无组织之分也”。因而，他主张“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接近”。对劳动界应进行“组织之引导，知识之诱进”……这一切，都写进了通讯。

当前，欧洲“各国政治黑暗如故”、“强弱相欺，大小相吓”、“欧事乱如麻，调解大不易”、“国际联盟虚设一会，内幕指使，仍不出诸强之手，报复侵略，仍为国际中重要条件，肆行无忌”……在周恩来的文章中多次出现这些语句，他对资本主义本质认识愈透，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便愈加强，对中国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也愈加明确。尽管他生活清苦，种种感触也令他不快，可他此时还不想回国，这里，仍有许多事情要做。

6月，巴黎进入炎夏，许多人去了海滨浴场和乡间别墅度假，但法兰西国家机器仍正常运转，中、法间一桩秘密外交正在进行之中。

北洋政府派出的专使朱启钤、随员吴鼎昌已抵达巴黎，名为代表总统徐世昌接受巴黎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实际上是和陈篆组成代表团，与法国政府谈判借款事宜。借款额为三亿法郎，其中一亿由北洋政府与经手人瓜分（即“回扣”）。中国借款担保的条件是，拍卖国家主权与经济资源，即出卖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及滇渝铁路、两粤铁路之建筑权。

这笔交易，直到谈判结束也无人知晓，稍后，提交法国国务会议讨论时，因各派权势集团分赃不匀，出现内讧，才由法国报纸透露出来。报载：“本月15日，法国国务会议将中国借款事列入议程。财政总长因反对此事而未列席。此人系一银行家，因此次借款之分摊，彼所主持之银行无份，故愤而离席。”

周恩来获此消息，觉得这是一起严重的卖国勾当，便与蔡和森、赵世炎、

朱启钤（1872—1962）：贵州开阳人。历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安福系国会参议院副议长，晚年任中央文史馆员。

吴鼎昌（1884—1950）：浙江吴兴人。1918年起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后历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文官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1950年病死香港。

陈毅等一道，联合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华工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旅法新闻记者团等五团体，数度聚会，商量对策。决定组成“拒款委员会”，于6月30日在巴黎哲人厅召开成立大会，展开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斗争。

拒款，关系到国家之利益与存亡，并非与个人生活利害有直接冲突，其性质不同于“二·二八”事件，故旅法工、学、商各界均人同此心，一致行动。

拒款委员会委托周恩来起草《通告》，内云：“……借款总额，闻为3万万法郎，以全国交通实业购料作抵……”谴责朱、吴之辈“下贱成性，卖欢军阀，献媚外人，国家存亡，在所不计”。表示“同人等义愤填膺，难与两立，业已为种种之积极运动，以与抗争，尚祈同胞一致进行，以挽狂澜……”

这份《通告》，除在巴黎散发，还向在法各地学校、工场、商店之侨胞投递，并致国内各爱国团体以及美洲、南洋侨界、留英留德学生会，呼吁其一致力争。

同时，五团体又投函吴鼎昌，内有“公如不自取消动议，则上天入地，必有与公相见者”之语，予以警告。此外，又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出，送法国国会议员、国务委员、各报馆和各界人士达千余份，以致巴黎各报均予刊登，国会内对借款持异议的议员，亦派人与中国旅法五团体接洽，听取意见，与主政者抗争。

拒款大会召开在即，主事者聚而商议准备事项。

“陈篆先说所传借款系‘出于误会’，又说‘兹事已不成事实’。我看，他是在耍花招。”赵世炎说。

“二·二八，我与陈篆交涉过，”蔡和森接着说，“此人圆滑世故，不能让他躲开。”

“一定要陈篆与会，借款分赃，他焉能没份？要他当众说明真相。”周恩来表示。30日，骄阳似火，哲人厅外面的菩提树纹丝不动，白色、灰色、灰白相间的鸽子，也不再悠闲地漫步，都躲在树荫处或屋檐下。来自巴黎各区和外地的华人，冒着酷热，涌入大厅，开会前一个钟头，300余人已将大厅挤满，一个个神情都非常激动。

2时整，大会主席赵世炎走上讲坛，宣布宗旨，盖在磋商全体与会者反对之办法、预防将来借款之阴谋，表明对法国之态度。

“……拒款，非反对法国国民，而是反对其少数资本家借款于中国，长中国之内乱者，”赵世炎清亮的四川口音在大厅回荡，“此次行动并不孤立，我们已得到法国舆论界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连国会内亦有人予以声援……”

他的话，被一阵掌声打断。少顷，他请五团体代表发言，报告朱、吴借款经过和五团体与之斗争的情形。

接下去，赵世炎请公使宣布借款内容及其经过。可是，陈篆没来，而是指派了中国驻巴黎总领事廖世功与副总领事李某出席。赵世炎转请他们发言，两人相互推脱，最后由廖世功取出书面草稿照读。廖言不由衷，闪烁其辞，对借款这一实质性问题，只说：“吾敢断言此事当系事实，但现在真相如何，则不得而知……”

“请问，陈公使有否参与其事？”台下的喊声打断了廖的宣读。

“这个……这个我不了解，”廖支支吾吾，面显尴尬，愣怔了片刻，续

读：“借款的事，无任复杂，恐将无日无之。今后之监督，正赖国民，国民宜有一时政监督委员会，以审查政府一切支出收入。”他朝人群觑了一眼，清了下嗓门，又读：“兹事甚重要，在法国人，宜先有一促成会，以促国内同胞之醒悟，而从事于斯，此事不无可商。惜群众咸注意于拒款之最近办法，未遑议及是项提议也……”

“滚下去！”廖的言不及义，引起人群的怒斥。

接着，会上宣读了各地华人团体来函来电百余封，并通过了几项相关决议。这次大会，显示了爱国华侨和勤工俭学学生的意志，巴黎的报纸也广为报道，迫于舆论的压力和国会一些议员的反对，法国政府只得暂时中止了对借款的讨论。

几天后，在塞纳河畔的一家小咖啡店里，蔡和森、周恩来等边喝咖啡边交谈。

“暂时中止，不等于取消。”蔡和森说，“暗中交易恐仍在进行，只要看看吴鼎昌之为为人，就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是啊，”周恩来说，“吴鼎昌在官场一贯长袖善舞。民国初元，他依附孙中山，为中国银行总裁。孙退归袁，他又当上天津造币厂厂长。袁死归段，他得为财政部次长，曹汝霖掌财政部时，中国借款多出吴手。安福派倒，吴获朱启钤赏识，遂得偕朱西行，膺此重任，此即朱、吴从事此次借款之因缘也。”他望了望窗外浓重的夜色，旋又转过头来继续说，“如今，秘密借款事已被揭破，旅法工商学界群起反对，吴氏惧为曹、章之续，暂离巴黎，一切未了事宜，概委法人巴道全权处理，可见，图谋依旧未改……”

“巴道何许人？”王若飞问。

“巴道为中国审计院与法律编纂馆顾问，此次亦随吴来巴黎，助吴料理借款事宜。”周恩来说，“巴道与中法实业银行之法方办事人米诺特关系颇深，巴道的女婿，即为米诺特之秘书，故巴道与米诺特皆为借款成功而奔走。”

“北京内阁已于5月中旬改组，新交通系皆登台掌握财权，日本为其后台，中法借款非其愿也，取消或有可能。”李立三说。

“未必，”周恩来摇摇头，“吴氏原为新交通系人物，又安知其不以此回扣大利，诱今日北洋财政当局，以促此借款之必成。国内又有王克敏其人相助，故取消一事，在今日仍不能便认为是事实。即使是事实矣，亦不能谓为无复活之余地。中国之官僚常具神出鬼没手段者，尤以洋行买办借款员为最。”

塞纳河上游艇的汽笛声零零落落，忽儿，归于沉寂，“红磨坊剧场”的夜戏怕也落幕了，小咖啡馆的夜话仍在继续。

“恩来说得对，”赵世炎说，“从双方实利出发，北洋政府与法方这笔交易难以断绝，且拭目以待吧！”

……

事情果然不出周恩来等所料。

朱启钤、吴鼎昌、陈篆等皆政坛老手，当群情激奋时，乃匿迹者匿迹，解释者解释，使借款事，表面上告一停顿，骗众人一时耳目。但当群情稍趋冷静，他们遂于暗中大肆活动，秘密洽谈，悄无声息地于8月25日跟法方签

王克敏（1873—1945）：浙江杭县人。时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兼中国银行总裁及盐务署督办。后曾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订了借款合同。

翌日，巴黎各报均刊出这一消息，且借款总额已由3万万法郎增至5万万，借款担保为全国印花税、验契税收入，并由法国监理收税50年。不唯如此，签字者除吴鼎昌外，更有几次通函声称未曾与闻之陈箬。

“霹雳一声，惊醒旅法华人之痴梦矣！”赵世炎大呼不止。

“所谓‘取消’，所谓‘不成事实’及停顿之表面现象，均为欺人之谈。”周恩来气忿地说，“前此的运动，奔走呼号，开会警告，悉付流水以去。所谓反对自反对，借款自借款，已成为官僚卖国者之惯伎。昔日行之于国内无所惧者，今则于海外行之，更视此6000侨胞于无睹也。”

“不行，我们要继续斗争。”赵世炎捏紧拳头说。

“对，我们不能就此罢休，”蔡和森附议，“恩来，我们再发《通告》，以示我们之意志与决心。”

“还是我来起草。”周恩来责无旁贷地说道。

26日，《通告》面世，内中备述借款签字情形，结尾，周恩来写道：

“……同人等现正暗中竭力，侦探一切，并用各种方法各样手段以为对付，总之一息尚存，决不愿见此次卖国借款有成立之日。事急矣！时迫矣！我同胞其速醒，其速起，分途并进，无论用何手段，以诛除此辈奸人，均吾爱国之真同志也。”

真乃壮怀激烈，掷地有声！形势紧迫，29日，周恩来、蔡和森等又来到先贤祠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商议部署新的行动，都深感要继续作舆论动员，就着这儿火车座一角，周恩来援笔作书：

“……此项借款，确与中国存亡有关。应知借款成功之日，即国内战祸再起之时，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者此借款也。印花、验契等税为最近国家财政上重要收入，且此项税更迭增减，最与吾人痛痒休戚有关。一旦受人监理，举措不克自主，财政生机，于焉以尽，是使中国国民永无自行更草税则（印花、验契）之余地，国家永无自行整理财政之机会者，亦此借款也。”

他写完一页，遂递给蔡和森、赵世炎等传看，依然埋着头，笔尖簌簌：

“吾人在此曾经向法政府及议会并各国一再宣言，誓不承认此类非民意之借款。乃彼等竟充耳不闻，吾人至此，亦惟有实行吾人坚确之决心，并请全国国民与吾人取一致主张。此外尚望各地诸君本此主张分途进行，务期造成舆论，克收实效为要。”

蔡和森、赵世炎阅罢，稍作补充，遂在五团体代表会上获一致通过，发往国内、法国各地和美、日、南洋等处。

第二天，周恩来把自己关在蒙达尼的居室，撰写了《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详述旅法华人开展拒款斗争的情况，揭露了北洋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于9月末刊于《益世报》上。

8月13日，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

会前，华人各团体曾致函陈箬邀其出席并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箬心怀鬼胎，托辞拒绝，派使馆秘书王曾思、沈覲宸到会。

台上的王曾思衣着簇新法兰绒西服，蓄两撇威廉式的胡子，将手杖倚在一边，手斜插着，板着面孔，一副居高临下的傲慢劲儿，出言吐语，责怪旅法同胞开会拒款为“多事”，说话时并伴有拳击桌面声，对旅法同胞拒款的

见1921年9月29、30日天津《益世报》。

见1921年9月29、30日天津《益世报》。

见1921年9月29、30日天津《益世报》。

爱国行为甚表不满。

王曾思的言行，激起与会者的义愤，当即有人大声喊道：“这卖国贼，不打如何肯招？！”遂有数人跳上讲台，对王氏一顿痛殴。王氏原本是个色厉内荏的角色，见众怒难犯，连呼“怨我，怨我……”不得不代表陈篆并使馆人员签字声明，反对此项借款，略谓“尊重留法中国全体公民公意”，“即向法外交部声明反对此项五万万法郎大借款”，“并即时向法国各报要求更正签字于草约之借款”。最后表示，如此项借款成立或今后再举行类似借款，公使和全体职员立即辞职，以谢国人。

拒款斗争如汛期的塞纳河，浪涛奔涌，层层推进，法国政府唯恐事态扩大，决走暂缓借款。至此，旅法华人开展的这场斗争暂告一段落。

三天后，周恩来又写了《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报道了斗争近况，文末写道：

“是役也，旅法华人在政治上可谓已获胜利。惟公使馆员一时屈于群众势力之下，其所声明，不能认其为其良心上之主张。”官僚狡猾，难保事后不思反悔也。”

周恩来不存幻想，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似乎情愿藏在后面，却又无可置疑地处在这场拒款运动的中心，像头雁带领着雁群，在暴风雨中翱翔。

3 米勒的画——“占领里大”始末——亡友之一：

陶尚钊——移居柏林——亡友之二：黄爱——《伍的誓词》

初秋的巴黎，天空是明净的，不像伦敦那样阴晦，但街市的喧嚣却远远超过伦敦，街头巷尾有数以千计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们当中有失业者、酒鬼、盲目流入都市的农民、欧战中的伤残者……

巴黎的旅游景点比比皆是，而卢浮宫依然魅力无穷，周恩来和赵世炎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进这座宏伟、朴拙的深灰色建筑，今天有难得的宽余，两人打算尽情观赏一番。这里陈列着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乔尔乔内的《田园合奏》、卡拉瓦乔的《圣母升天》、哈尔斯的《吉普赛女郎》、华多的《发舟西苔岛》、大卫特的《马拉之死》、安格尔的《泉》等让人目不暇接的油画、肖像画和风景画，还有美不胜收的雕塑。周恩来、赵世炎一个画室又一个画室地观赏着，议论着，对这些艺术杰作，不时发出赞叹。

在第八画室，两人被一幅题为《拾稻》的油画所吸引，周恩来凑近看了画家的署名，不禁脱口而出：“让·弗朗索瓦·米勒。”

“怎么，你知道他？”赵世炎见周恩来兴奋的样子，遂问道。

“我在《少年中国》上读过一篇李君的文章，称19世纪绘画界的明星，米勒便该首屈一指，他注重农民生活，可称为田园画家。”周恩来说，“他的画独辟蹊径，一反从前贵族艺术思想，专从自然的、人道的思想，去实写农牧的天真、田园的清纯……”

“好吧，我们来仔细欣赏一番。”赵世炎也不由地受到了感染。

眼前是一幅极普通的农村田野画面：

秋收季节，三个上了年岁的妇人，拖着沉重的身体，躬着腰在捡拾撒落在地里的稻穗，其中一位妇人像是坚持不住，微微直起腰松一下筋骨，可眼

见1921年10月8、9日天津《益世报》。

原文系“拾稻”，此画现译为《拾穗者》。

李君：即李思纯，其作《平民画家米勒传》刊载《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期。

睛仍盯着地面，搜寻着失落的稻穗。她们终年劳碌，但土地不属于她们。一望无边的田野上，稻垛堆得高高的，旁边停着马拉的大车与忙碌的雇农，远处立着一个骑马人，乃是地主或地主的管家，他才是土地的主人，不劳动者拥有一切，劳动者却不得食，靠从稻茬中拾落下的稻穗糊口……

两人聚精会神地凝望着，似乎不愿放过每一处细节。

米勒对三个农妇的安排疏密有致，富有变化的节奏韵律感，使有限的画面变得无限丰富。色调所造成的天高气爽、风和日暖的气氛，使画面呈现表面的和平宁静，却没有掩盖贫富悬殊的矛盾。农妇的动作隐约显示出急促、紧张。平静的气氛下，含有不平静的情绪，委实意味无穷。

“啊，我想起来了，曾有批评家说这幅画是‘反对贫困的起诉书’……”赵世炎说。

“是啊，”周恩来应道，“它画出了农民悲惨的命运和处境。”

两人流连忘返，直到夕阳西下，才走出展厅，当他们在门口的卖品部稍作停留时，竟意外地看到了《拾稻》的画片。

“这可是不能不买。”周恩来掏钱买了两幅，一幅给了赵世炎。

“寄回国。”周恩来说。

“我也这样想。”

于是，两人来到附近的邮局。

周恩来是寄给释孙（即谌志笃）的，他在画片背面的左侧，用英文写着：“法国派。《拾稻》。米勒”。右侧中文则为：

“释孙：

‘拾稻’——米勒氏作。米勒（1815—1875）是写实派中的巨子，国内久知其名，毋庸我再介绍，此张亦为他名作之一。《少年中国》中李君曾批评过此画，甚当。

恩来 1921.09.10 于法国。”

赵世炎则在寄给友人的画片上写道：

“这是法国派的画，用三个拾稻女人，描写农家之苦，画中三人姿态，描出年迈农妇田作之状……大地之后在乡间这种情况尤多了，一因老农妇的丈夫或未婚的儿子多死于战争，无人赡养，又无助手，今日之状还要苦些。米勒这画也大有喻意……”

两人将信丢进邮筒，这才沿着大街道踏上归途。

“怎么样，去逛逛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周恩来提议。

“算啦，时候不早了，回去吧。”赵世炎埋着头只管走路，忽然，他说：“恩来，上个周末，在卢森堡公园，我见到你跟一位漂亮姑娘在一块，是谁啊？”

“啊，她叫张若茗，”周恩来答道，“我们一道坐过牢，一道发起建立‘觉悟社’，又一道来法国勤工俭学。”

“是不是在恋爱呀？”

“没那回事，”周恩来笑道，“不过，我们很接近。恋爱的事，我真还没去想，否则，和森又要说我‘陶醉于美色’了。”他朗朗地笑出声来。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饮食男女，人之常情，”赵世炎说，“和森是不是太绝对了？”

“他是担心我们中间有人受到感情的诱惑，但我可以说，情欲与我无

见《周恩来青年时代》第七期（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

见《周恩来青年时代》第七期（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

缘。”

“恋爱也无妨嘛！”赵世炎很通达，“你看，和森、警予正是因恋爱而结合的。”

“和森能有警予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也实在是种幸福。”

“这样说，你又何必束缚自己呢？”

“我们不谈这个，”周恩来甩开大步，“快走吧，天就要黑了。”

两人不再笑谈，匆匆地赶路……

拒款风潮平静了一个月，勤工俭学之前途，已趋困难，无工同学占全数十分之八，专靠维持，无日不生活在恐慌之中。突然，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宣告，自9月15日，停发勤工俭学学生的维持费，且有遣返回国之说。已做工者亦受经济恐慌之影响，大有朝不保夕之势。在这同时，围绕里昂中法大学的入学问题，勤工俭学学生也陷入困境。

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利用法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筹办的。学校筹办之初衷，原为解决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之困难，但主事者却背离了初衷。一月间，周恩来致严范孙的信中曾写道：“……恩来居法约半月余，以事外之身来看，以为勤工生之救济，舍里昂大学外实无再善之所。”而校方却以“校款不甚充裕，勤工生程度太低”为托辞，不愿接受勤工俭学学生入校就读。

夏秋之交，吴稚晖从国内招收了一批官僚富家子弟，且决定于9月25日开学。此举引起了勤工俭学学生的公愤。为解决读书之困，他们曾数度与华法教育会交涉，均告失败，退而要求以里昂大学校内多余房屋暂作栖身之所，也遭拒绝。巴黎郊外的哥伦布镇充塞着少年漂泊者，他们面临着生活无助、读书无着的威胁，怎么办？

在克鲁邹的赵世炎、李立三等商议，发动一场“入学运动”。他们一面通知设在巴黎的“勤工俭学会”，一面与蒙达尼的蔡和森等联系，紧急会商，在国内学生抵达法国之前组织一支“先发队”赶往里昂，先把这所大学占领。

这个想法，周恩来自然是知道的，但这是一次重大行动，如何组织则需要认真研究。在哥伦布的一次会商中，对派遣“先发队”，他并无异议，问题在于“先发队”去了之后怎么办？勤工俭学学生数千人散布在巴黎、圣日尔曼、枫丹白露、克鲁邹、沙多居里、墨兰、蒙达尼等地，倘全都拥向里昂大学，似也值得考虑。而且，他也不主张与校方正面对抗。他说：“斗争是复杂的，吴稚晖、陈策等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势在必行，但斗争要讲究策略，要作两手准备。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建议各团体留下一部分骨干，以负责后方工作和准备以后的斗争。”

“争回里大，为无可奈何的最后手段，”蔡和森说，“但是，恩来的建议也很重要，我们务必要组织好。”

“后方工作就由恩来负责，如何？”赵世炎征询道。

众人没有异议，会上作出“以开放里大为唯一目标”的决议。

9月20日晚，巴黎车站一角，集聚着百余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一个个神情肃然，沉默寡言，跟前来送行的周恩来等告别之后，由赵世炎、蔡和森率领着登上火车，连夜赶往法国东南部的里昂。次日凌晨，他们登上了设在山上的昔日里昂炮垒，里昂大学系此炮垒改建而成。因校方早有准备，教室、

宿舍皆上了锁，无奈，“先发队”队员只好在操场上坐下。赵世炎找

到学校主持人褚民谊 交涉，孰料校方非但竭力排拒，且以“匪类”诬陷，要求里昂市长出面干预。

第二天，里昂市长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为由，出动 200 多名武装警察，以铁甲开路，突破铁栅栏大门直逼操场，将百余名“先发队”队员强行押上数辆大汽车，关入附近一座兵营；接着又以“查验”为名，没收了全部人员的“居留证”，不准行动自由，视若囚犯。

这是勤工俭学学生没有料到的，形势急转直下。

留在巴黎的周恩来、王若飞、聂荣臻 等闻讯后，四处奔走营救。

稍后，吴稚晖来到里昂，邀同学推派代表晤谈。他表示，由他负责设法，每年补助勤工俭学学生 10 万元，以 6 年为限，并要同学自行安排，一批做工，一批读书，轮流动用经费。

作为总代表的赵世炎回到兵营据实报告，同学们拒绝此项安排，一致要求开放里昂大学。

于是，问题又回到吴稚晖那里，结果遭致拒绝，谈判遂告破裂。

留在巴黎的大批勤工俭学学生听说谈判破裂，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去里昂声援。周恩来多方疏导，动情地说：“‘先发队’遭了挫折，若是接着出发，必致人人都入陷阱中，去领受俘虏的滋味。诚然，甘苦本应共尝，但也不能让对方一网打尽。需知行动一失去自由，指挥生死的权便在人家掌握中了。”他说服了一些同学，又往见陈篆，要求他以使馆名义向法国政府交涉，尽快解除监禁，恢复各人自由。谁知陈篆不仅没有一点同情心，反而态度顽梗，于是，双方展开一番舌战。

“此番百余人造成四罪：不得主权者许可，擅入人室；侮辱市长；散发传单；并与法共新闻记者接近。”陈篆口气颇硬，“罪名既已成立，被拘禁，我也无能为力，我不能干涉法国的主权和法律。”

“不对，”周恩来驳道，“同学此举，纯为求学，且进行极守秩序，法人所谓‘罪状’，充其量也不过违警。况且，法兰西共和国，又非戒严时期，何能凭一面诉词，强加人罪？若说是按法办理，凡被捕的人，如有人请求，当于 24 小时内出庭，何以日久不见明文？”

“违反法国法律，只能由人家处置……”

“可是，公使身为中国政府代表，理应为中国学生说项，怎么反倒替法国说话？”与周恩来同去的徐特立 责问道：“先生的言辞令人怀疑与法方有所干系，不然，法国现时军警之气势无论如何大，总不能驾于法律之上。区区一个‘违警’罪状，何至于拘入军营？何至于拘禁不开审讯？更何至于演了一出同中国学潮中拘留学生一样的怪剧？”徐特立言辞激烈，八字胡直颤，“若不是惯经此事的公使先生暗示他们，默许他们，法人又何能目无中国至

褚民谊（1884—1946）：浙江吴兴人。时任里昂中法大学副校长。后曾任中山大学校长、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汪伪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兼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曾任八路军 115 师政委、北京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徐特立（1877—1968）：原名懋询，湖南长沙人。曾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兼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此？”

“你，你……”陈篆语塞，脸涨得通红。

“至于说到散发传单，同新闻记者接近，更难自圆其说。”王若飞接着说，“举眼看一看巴黎、里昂城里，哪一天没有成万的传单飞出？试问，这难道都是经警方许可的吗？而法共《人道报》遍布法兰西全国，更何能禁止人们同他们的记者接近？我们仍坚请公使向法国政府交涉，尽快恢复同学自由。”

“我已电请吴稚晖先生来巴黎，待他来了再说吧！”

周恩来知道陈篆在推脱，和徐特立、王若飞等离开使馆后，当晚组织了20多人的“请愿团”赶往里昂，求见市长，要求探望被囚同学，向其提供足够被褥以及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他担心同学在兵营时间较长，又携上一袋书籍供其阅读。

可是，百余人拘于兵营，对法国来说也是负担，惟恐酿成外交事件。里昂市府报告内政部，再由外交部咨文中国驻法公使馆，陈篆却以“不管教育”的托辞，把责任推给吴稚晖。法国政府见中国公使馆与里昂市府均无处置办法，遂决定将这批学生遣送回国。在关押了20多天后，法国政府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的莫须有罪名，于10月13日，在戒备森严中，将104人押往马赛登船回国。他们之中有蔡和森、李立三、陈毅、张昆弟、王京歧等，唯有赵世炎在别人掩护下逃脱。

周恩来在这个事件中“身临其境，目睹种种惨状”，深感“焉能使我对他们不表无限的同情，不致无限的愤慨，不替他们求社会上极大的援助”？他义愤难抑，撰写了3万余字的长篇通讯《勤工俭学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寄给《益世报》，于18天内连续刊出。文章回顾了一年来旅法勤工俭学学生波澜迭起的斗争，揭露了中法两国政府和官僚政客对勤工俭学学生的欺骗与迫害，充分肯定了占领里昂大学的这场斗争。文章写道：

“在他们运动初起时候，其主张原是很和平的，要不是周围的空气压迫他们过甚，又何至于便取直接手段，实行占据。他们希望援助，旁观者给他们的同情只是一个‘冷’字；他们期待谈判，里大当事人回复他们的只是给了一个拒绝的暗示。在另一方面，停发维持费的日期，又确定在9月15日，人们的心不是麻木的，血更是热的。援助失了，学费绝了，他们也只有向同境地的朋友，求团体的团结，试一试他们最后的胜负。受同样的待遇，处同样的悲境，他们终于会团结起来的，不牺牲终久也是牺牲，他们如此，他们岂是得已？”

他热情地欢呼：

“……第一朵开放出来的花儿，便是占据里昂大学的壮举。”

百余名勤工俭学学生被遣送回国，并不是事情的结束，留下的还将继续奋斗。挫折，使他越发坚韧，他的认识得到了升华，他以高昂的气势呐喊：

“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昂（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一个时期以来，周恩来行踪不定，凡有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城镇，他几

见1921年12月18日至1922年1月9日天津《益世报》。

见1921年12月18日至1922年1月9日天津《益世报》。

见1921年12月18日至1922年1月9日天津《益世报》。

乎都去过。当然，他也曾有过相对固定的住处布卢瓦，这是法国中部卢瓦尔河畔的一座小城，陶尚钊和他住在一块儿，他一直呵护着这位小表弟。三个月前，郭隆真、张若茗从蒙彼利埃搬到这里，只要周恩来不外出，他们经常见面，话题总离不开补习法文、国内近况、法国以至欧洲政局和社会革命等等。

繁忙之中，周恩来跟旅英的李福景、常策欧、严季冲，旅美的关锡斌、潘世纶等仍保持联系，旅日的吴瀚涛、王朴山跟他也一直鱼雁不断。他曾劝说吴瀚涛回国投身救国运动，可是，吴的反应令他惋惜、失望，两个少年时代的朋友，因思想分歧，自此分手……

占领里昂大学的挫折和一批勤工俭学学生被遣送回国，深深刺激着周恩来，只是，他没有气馁，从张申府那里得知，国内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已于7月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给他很大鼓舞。回顾“二·二八”拒款，直到占领里大的一次次斗争，固然也有各个团体的联合，但他总觉得缺少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不应类似天津爱国运动中的觉悟社，而是共产党。旅法的革命者需要这样一个组织，这件事，在占领里大失败后，他越发感到紧迫了。

其间，周恩来常在法国各地以及德国、英国、比利时穿梭奔波，食宿失序，即使这样，他仍通过亨利·巴布斯，与法国共产党人、《人道报》以及法国学生的左翼保持联系。

整个冬天，他和从里昂兵营中潜逃出来的赵世炎一道，致力于先进分子的联络和团结，筹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

第二年1月，周恩来来到伦敦看望好友，住在海贝律山11号常策欧的寓所。这次，他停留时间不长，但仍关注着英国局势的动向，再次撰写了《伦敦通讯》寄《益世报》发表。

天气渐趋暖和，春天来了。一天，陶尚钊赴里昂旅游，野餐时，因不会使用炊具，不慎酒精灯爆炸，火烧全身，伤重医治无效而亡，时年17岁。周恩来闻讯恸哭不止，一手料理了尚钊的丧事，择地埋葬后，又将坟墓拍成照片，连同抵法之初，他、刘清扬、张申府、李愚如等和尚钊的合影等生前遗物，托人带回国内送交尚钊之兄尚铭处。

周恩来的痛苦是深重的，这大概是他旅法期间最暗淡的时日，多少个夜晚，他被恶梦惊醒，他总忘不了尚钊那副可爱的、稚气的面孔。他想起，在南开时，尚钊与陆宗舆的女儿恋爱，“五四”运动爆发，尚钊得知陆系北洋政府签订巴黎和约的卖国贼之一，毅然与陆女断绝了往来；他又想起，他在狱中写给李愚如的诗函，便是尚钊带出去的；他还想起，每当外出，尚钊总要送他一程，总那么恋恋不舍……啊，他还想起许多往事。可是，尽管他追忆不已，这一切终究成了过去，而他不能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遂日以继夜地投入对欧洲社会的考察、撰写文章、联络友人等一系列活动中去，以此求得解脱……

3月，他移居德国柏林，住威廉村恺撒街54号A，同楼并有一位德国人教他德文，这儿离柏林市中心不远。张申府和刘清扬先他一步到柏林，自然，相互时有接触。但更多的时间，他则用在学习德文、阅读各种报刊、钻研经济学和其他著作上。他给伦敦的常策欧写信：

“……德国书价一月一长，我现在请求你将德文的经济学原理书，在五天内给我开点

亨利·巴布斯（1873—1935）：后译为亨利·巴比塞。法国左翼作家，名著《火线上》的作者。

书名字来，我好起首去买。还有一事，请给我定一个月的 Daily Herald，赶快！万勿耽搁，因为我现在一份英文报纸都看不见了。恩来。”

据此，不难看出他对报刊的需求和对新思潮的饥渴。

他以极大的热情，继续考察欧洲社会及其各种流派的劳动运动，其中包括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费边派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对它们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逐一进行分析，“推求比较”后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激动地宣称：“列宁真可爱！他是无孔不钻，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一切舆论全都不顾。”

同月，他给国内的觉悟社社员“小、山”写信，介绍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状况，和他决心为此奋斗的信念，此信以《西欧的“赤”况》为题发表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上，署名“伍一小·山”，即“周恩来——谏小岑、李毅韬”。

信中首先分析了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指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大无限制”，“容易流为空谈”，在欧洲“其势力渐渐等于零”；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近已见衰”；法国工团主义“不问政治”、“活动范围太狭”；坚信共产主义必将取得胜利。其次，他还坦诚地叙述了自己旅欧一年来的思想演变：“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经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 C. ism 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来去年秋天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于是，他郑重声明：

“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一天，周恩来到刘清扬那里去，见刘清扬满脸悲戚。

“发生了什么事？”周恩来惶惑地问。

“正品他……”刘清扬刚开口便哭出声来。

“正品怎么了？”

“他……他死啦……”刘清扬说着将李毅韬刚寄来的信递给他。

周恩来的手颤栗不止，从信中得知黄爱在长沙被军阀杀害，信未看完，他已泪流满面。

黄爱，字正品，湖南常德人。1919年在天津高等工业学校读书时，因投身“五四”运动，曾两次坐牢，后又成为觉悟社社友，与周恩来、马骏等交谊甚厚。1920年秋，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黄爱回到长沙，就读于湖南甲种工业学校。11月间毕业，与同学庞人铨一道经常深入工厂，并联络了一部分同学、工厂技师和工人，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劳工会”。一月后，会员已增至四五百人，其基本成员除学生外，大多为纱厂、造币厂、黑铅炼厂、水泥厂、木瓦、缝纫、理发业的工人。

DailyHerald：即《先驱者报》。

见《周恩来青年时代》第六期（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

见1923年4月15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二期。

C. ism：即共产主义。

见1923年4月15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二期。

见1923年4月15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二期。

“湖南劳工会”一度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张不要政府，不要法律，不要领袖，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平均财富，一切平等。在军阀残酷统治下，在封建把头 and 工厂老板重重剥削的处境中，工人实际工资日益下降，群众产生自发反抗情绪，自然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宣传。

但是，黄爱、庞人铨则是纯洁、正直、勇敢并具有一定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的青年。1921年4月，黄、庞动员2000工人到第一纱厂示威，将该厂股权承租者华实公司老板押过湘江游行，逼其写下“誓词”，保证不再承租第一纱厂。华实公司后台系湖南军阀赵恒惕。事发后，该公司贿赂赵5万元，要他加害黄、庞。1月16日深夜，凄风苦雨，赵密令将二人逮捕，因惧怕工人抗议，未经审问，于17日凌晨4时，将二人押赴长沙浏阳门外斩首。时风雪弥漫，鲜血染红了雪地……

黄、庞生前，毛泽东在长沙，曾对他们做过耐心、深入的帮助和教育。1921年底，两人均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遇害后，毛泽东悲愤难忍，先后于长沙、上海等地主持了黄、庞追悼会，动员国内名流、学者致电抗议赵恒惕的暴行。黄、庞的死，在国内震动很大，天津与长沙虽相隔千里，可李毅韬很快便从报上得到这个消息，旋又函告刘清扬。

“毅韬是很沉痛的。”刘清扬哽咽地说。

“她和正品很熟，了解正品的为人……”周恩来泪痕未干，半晌才说，“无论如何，我们要不负这个朋友，不管他信的是C，还是A……”

周恩来“一时百感交集，更念及当时的同志”，回到寓所，写下了《生离死别》一诗：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作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它，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甚么？

诗中，周恩来把黄爱“壮烈的死”与那种“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作了对比，认定“没有耕耘”、“没播革命的种子”却想“收获”、“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深信要“飞向光明”，哪怕“血儿滴在地上”、“便永别了，又算甚么？”

这是一首壮丽的诗篇，崇高的理想、磊落的胸怀、高洁的品格、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贯穿全篇。

周恩来将这首诗抄在给衫逸（李锡锦）、衫峙（郑季清）的信中。此信发表于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上，署名“伍——衫逸、衫峙”，即“周恩来——李锡锦、郑季清”，标题《伍的誓词》系编者所加。

在诗前的一段文字中，周恩来即宣称：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诗后，周恩来又一次谈到自己信仰确立的经过，即“对于C.P. 坚定的倾向”之演变，他这样写道：

“这个意念的决定，分开来可以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津会时受了不少施以等主张的暗示，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其中以衫峙、衫逸、石逸三人之力为最大。出国后得了施以一封谈主义的信，引起我探求的兴味，最后又同念吾奈因经了很多的讨

见《周恩来青年时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版）。

见1923年4月15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二期。

施以：即谌小岑。

石逸：即李震瀛。

念吾：即刘清扬。

论，直至10月后才正式决定了。到德后，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意念十分坚决。”

历史就是这样记载的。

任何人，甚至是伟大人物，其成长，尤其是思想的演变，都会受到周围环境和跟他关系相近者的影响，周恩来也不例外。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无需避讳。再有，周恩来在法国尤其是1921年二三月间，在蒙达尼与蔡和森的接触，以及张申府、刘清扬介绍他加入C.P.，蔡、张等对他有没有产生影响，或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周恩来未提到，或许这封信是写给觉悟社社员的，提到的都是彼此熟悉的人，而按照C.P.秘密工作原则，他亦不可能泄露自己的同志。可是，客观他说，这种影响，应当是有的，更不用说，信仰确立前后，欧洲社会的现实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了。

总之，重要的是，他认定的Communism是一定不变了，且坚决地付诸行动。

4 “少共”的成立——《共产主义与中国》 ——《少年》与《工余》的对垒——笔伐胡适 ——会见朱德——外国同志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旅欧华人（勤工俭学学生、华工）中的先进分子，热情拥抱了这个幽灵。

1921年的春天，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五人，组成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消息很快传到巴黎，《共产党》月刊也陆续寄达，张申府、赵世炎与国内党组织时常有联系（赵世炎赴法前，在上海曾与陈独秀有过多次接触；张申府出国时，陈独秀亦曾委派他在欧洲筹建共产主义组织）。旅法爱国运动的波折和发展，锻炼了一部分先进分子，到1922年5月，周恩来、赵世炎在旅欧的中国青年中已联络了30多人（其中旅法20余人，旅德六七人，旅比七八人），成立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的条件已渐趋成熟。不久，赵世炎与周恩来在巴黎会面，共商组织工作，再与蒙达尼的李维汉联系，彼此交换意见，旅欧少年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已是水到渠成。

6月，巴黎郊外，布洛涅森林的一角失去了平日的寂寥，一群中国青年怀着神秘而昂扬的心情在此集会。他们之中有来自克罗梭的赵世炎，来自蒙达尼的王若飞、李维汉，来自柏林的周恩来，来自沙洛瓦的刘伯坚，等等。一个经营露天咖啡茶座的法国老太太租给他们椅子。周恩来对选择这样的地点和环境颇为满意，说：“这样的布置倒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这话，引起赵世炎、王若飞等一阵开心的笑。

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了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组织章程草案。他最初提议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但多数人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的提议是切合实际的，可“共产党”这一称谓或

奈因：即赵光宸。

见1923年4月15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二期。

陈公培（1901—1968）：湖南长沙人。黄埔二期生，“八一”南昌起义参加者，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

刘伯坚（1895—1935）：四川平昌人，曾任中共旅欧总支部、旅莫斯科支部书记，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

许更具吸引力和感召力，周恩来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会议开了三天，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有争论，但最终一致通过了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决议，推选赵世炎、周恩来和李维汉为主要负责人，组成执委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会上并决定创办《少年》刊物。执委会地址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旅馆的楼上，赵世炎住在这里，主持日常工作。“少共”与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联系，由张申府幕后进行，而周恩来则奔波于法、德、英、比之间，做旅欧“少共”的组织联络工作。

8月1日，《少年》正式创刊。

周恩来写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可谓是扛鼎之作。

这篇文章，较为系统地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潮，指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万万无效”。

周恩来深入论证了共产主义，既“能够解决世界的乱象”，“也完全应该成为我们中国唯一的‘救时良药’”。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根本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经济上，不能“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中国实业”，因为那样只能使中

国变为外国资本主义“舶来品的销售场”，把中国的资源、设施“间接直接都归到外人手里”，造成中国“困苦颠连以致万劫难复”的恶果。

那么，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呢？他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眼下“国家最高的统治权”依然握在统治阶级手中，而“有产阶级不倒，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侵略政策”便不会消灭。自私的资本家更不会容许“一切产业收归国有”。因此，国家政权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不可能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周恩来认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搞共产主义，才能够担当起改革经济、改革政治的重任。中国“除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只此一途，才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革”。

这篇文章因其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在旅欧华人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扩大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吸引了许多青年向它靠拢，它在旅欧“少共”的理论建设上占有突出位置，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个重要文献。

几个月之前，周恩来在给国内觉悟社社员的信中，曾谈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容易流为空谈”，在欧洲“其势力渐渐等于零”。这种估计与事实不尽相符，因为无政府主义势力依然存在，其影响和危害也是明显的。

法国乃是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避难所。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人物，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旅法俭学和勤工俭学运动的提倡者李石曾、吴稚晖即曾在法研读过无政府主义学说，后来，当他们在法主持华法教育会和里昂大学时，在旅欧青年中积极推行无政府主义学说。他们还运用手中掌握的分发勤工俭学补助金等权力，在经济上对信奉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勤工俭学学生，实行不平等待遇，以此诱惑和胁迫青年。当然，也应看到，无政府主义者中如克鲁泡特金那样

道德高尚、富有正义感和勇于牺牲的人，以及他们所主张的“反对强权”、“排除一切恶制度”、“经济上政治上绝对自由”、财富“为社会公有”、由“劳动者自由取用之”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等思想，对一些痛恨社会现状、渴求人类美好境界的青年，确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中国旅法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工余》杂志竭力传播这些理论主张。

而无政府主义的实质，要求使用旧的生产工具和维护旧的所有制和生产关系，这使它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这样，《少年》和《工余》的对垒和斗争，则是不可避免了。

1922年8月，区声白、刘无为、刘抱蜀等人，通过《工余》社出版了一本名为《无所谓宗教》的小册子，并广为散发。里面的文章，名义上以“非宗教”相号召，实际上却“谓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把共产主义与宗教同列，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是“迷信”……这对刚刚组建并正在发展的旅欧“少共”组织，不能不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为此，周恩来、李维汉和已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陈延年一道商量，在《少年》第二期上，开辟了评论《无所谓宗教》这本小册子的专栏。就在这一期，刊载了周恩来的《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他首先就马克思及其学说，作了正面阐述：

“……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成为有产阶级中人的清谈，共产思想还存留在乌托邦中，自马克思出，一本科学的精神，寻出‘物质世界’的最大缺憾在现代经济组织，而生产力的变迁，更足以使此经济组织有必须崩溃之势。另一方面更从人类史中，找出阶级斗争的痕迹，知道现今的‘下层阶级’（凡加‘ ’符号的字句，都是用著者语）乃是依附现代经济组织之下的最后最困苦的无产阶级。欲‘铲除痛苦的根源’，消灭此阶级界限，顺着经济变迁可能的趋向，自不得不想出‘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生产产品，而公同分享之’。这便是共产主义所由来，也正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说给以明确证明的。至于革命，更是‘铲除痛苦的不可避免的方法。除非我们抱无抵抗主义，求上帝无形之安慰’，‘不去试验，不肯改革，便罢；否则，欲用一个研究出的办法去实验，没有不妨碍旧办法的，没有不与他冲突的。”

在周恩来看来，马克思给人类指明了实现真正解放的唯一正确途径，而宗教却是“引入空想未来之国”。马克思主义既是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体系，那么，一个共产主义者应坚定其信仰而不应动摇，因为“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如此，共产党人“视马克思的著作作为可贵可重”，“便甚言之‘为经’为‘典’也无可议”。这哪里是什么迷信？

然后，他阐述道：“迷信与信仰何别？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凡有所‘信’，都不应超越于理智范围之外，出此便为‘迷信’。”这与“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的态度毫无二致。

在这里，周恩来不仅理性地颇具说服力地批驳了无政府主义的荒谬，而且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在实际中“试验”（即实践中检验）其理论的见解，时在1922年，实属难能可贵。

此外，论战中，周恩来还为《少年》撰写了《告工友》、《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论工会运动》、《评胡适的“努力”》等大量文章，分析、

陈延年（1898—1927）：安徽怀宁人。陈独秀之子，乔年之兄。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

批判了流行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潮。

周恩来向工人群众呼吁：“劳工朋友必须急图团结组织，勿放松一切机会，勿远离可引为友的勤工同学，更须认清对象，好轰轰烈烈地做将起来。”

针对当时有人企图改变工会性质及其奋斗目标，周恩来写道：

“……我们乃敢大胆说，工会运动是要改良工人状况，引导工人为经济的奋斗，协助工人政党图谋工人阶级的解放，取消工银奴役，以达到最后共产主义的胜利的。这样目标，一定有些旧式工团主义者和产业主义者，以为这是出了工人应做的范围了。其实未来的世界，应是劳动者的世界，不应再存有私有产业的人，在他们（指工团主义者和产业主义者——引者注）原是承认的。欲实现这种理想，不从政治和经济革命中双方打出，难道听着资本政府永远逞着他的威权，使工人阶级受着无尽的剥夺么？”

这些文字，不啻是辩护状，是宣言书，读之，痛快淋漓。

当胡适提出“好人政府”的改良主义主张，周恩来以为大谬不然，著文反驳：

“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胡先生是以‘打图起屋’的人自居，而以‘烧房子’的人待人的，但是房子还没真烧，他却要告人先来做‘收拾颓椽剩瓦’的事，自己以为可以在那里打图好备起屋了。果然他所打的图是烧了房子后的新图，那还可听他在那里把图自玩，如是一张好图，尤可供大家的研究，只是他所打的图样是要在破漏将倾的房子上添补丁，添那不可能的补丁，这不但徒劳无功，且更阻止革命的发展。”

在调侃、幽默的表象下面，是有力的揭露。

胡适曾说可以“用手枪炮弹罢工罢市”，这同样不切实际。周恩来写道：“手枪炮弹罢工罢市，只能做革命的导火线，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以为在世界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在做梦么？”

周恩来进而指出：“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知此及知他在《努力》上所发表的妥协的统一会议主张、伪和平的联省自治办法和能说不能行的他的‘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实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

就这样，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以其一系列文章，廓清了一度游荡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的迷雾，使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的与之决裂，倒戈参加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列；有的则与之疏远，另辟蹊径。工余社迅速瓦解，其影响日趋衰落，《工余》仅出两期即停刊，曾喧嚣一时的工余社及其《工余》杂志，从此销声匿迹。而胡适“打图起屋”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在旅欧华人中，已不再有什么市场。

闲适和享乐与周恩来无缘，他一直肩负着救国拯民的重担，在人生道路上，不停地跋涉……

这段时期，周恩来大多数日子仍在德国，留德的勤工俭学学生每周周末举行例会，后来增至每周聚会三次，地址通常在张申府、刘清扬的寓所，总是由周恩来主持，与会者有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光宸、熊雄、熊锐等。会议内容重在学习，有时由周恩来报告国际形势、第三国际的活动、苏

见 1922 年 12 月 15 日出版的《少年》第六期。

见 1922 年 12 月 15 日出版的《少年》第六期。

俄的新经济政策以及国内动向；有时由张申府讲解黑格尔哲学（斯时，张正在柏林大学学习西方哲学）；有时则研讨《共产党宣言》和《向导》杂志……这批年轻的共产党人，身在异国他乡，为着救国，为着最终在中国实现共产革命，就这样紧张有序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着最初的酝酿和准备。

10月底的一天。

时近黄昏，周恩来搁下笔，活动了下身子，走到窗口眺望落叶纷纷的林荫大道。不意有人敲门，他转身把门打开，见有两张陌生面孔出现在眼前，其中一位年龄稍长的虽穿着西服，仍不脱中国农民敦厚、朴实的本色……

“我叫朱德，”不等周恩来继续打量，年长者先说，并指着身边的同行者介绍道，“他是孙炳文。”

朱德！周恩来的心怦然而动。他听说过这个名字，讨袁时，他是蔡锷麾下的一员虎将。周恩来大喜过望，愣怔了一下，赶忙握手让座，旋又招呼孙炳文一旁入座。

朱德，一个在暗夜里漫漫跋涉、寻找光明的人。他加入过秘密组织哥老会，抽过鸦片，当过滇军的高级将领，讨伐过袁世凯，“五四”运动惊醒了他，开始追寻救国之路。今年年初，孙中山令云南滇军出征讨伐北洋军阀，当时一心独霸滇省的云南都督唐继尧，乘省城昆明兵力空虚之机，武装进驻，争夺兵权。不久，滇军北伐失利，风云骤变，总司令顾品珍于小河口战败后忧愤自杀。唐继尧带领部卒抄了朱德的家，并四处通令重金悬赏追杀朱德。危难之中，3月间，朱德与200多名将士和20余匹军马，疾速离开昆明，准备沿金沙江的川滇商路入川，再由川赴沪，而后去广州与孙中山会合。

谁料路途环境险恶，且时有追兵出没。抢渡金沙江后，朱德一行多蒙乌拉山寨彝族首领鼎力相助，不仅予以款待，留宿多日，更以卫队护送至四川会理边界，旋经德昌、西昌、大小相岭、越西、雅安、成都，来到南溪，稍作停留，再出发，一路上千辛万苦，不堪细说，于6月抵达上海。朱德心怀仰慕，设法会见了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可陈独秀冷落了他，送了几本马克思的书便打发了他。在沮丧和失望支配下，他萌发了去西方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千里迢迢来到法国。在与川籍同乡的交谈中，他知道了周恩来其人其事，于是，和孙炳文再赴德国，在柏林按图索骥找到了瓦尔姆村区皇家林荫路54号。

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关于这件事，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曾听朱德谈过，史沫特莱在她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曾作了如下描述：

“朱德……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

“他娓娓而谈，周恩来就站在他的面前，习惯地侧着头，一直听到朱德把话说完，才提出问题。”

“周恩来举止优雅，待人体贴……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柏林支部的手续。”

自然，周恩来是很慎重的，经过多次交谈，直到把他希望了解的事都弄

孙炳文（1884—1927）：四川南溪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四·一二”事变中，在上海被害。

清楚之后，才与张申府一道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 C.P.，这是 11 月间的事。

在这之前，他曾去过巴黎参加“少共”会议，经总投票，旅欧“少共”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 5 人当选。

年底，中共旅欧支部建立，周恩来被选为负责人之一。党的支部和少共机关部设在巴黎 13 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旅馆内。党的支部与少共机关是重合的，党员均参加少共的活动，少共中具备党员条件者，则随时转为中共党员。

由于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绝大多数华工都在法国，周恩来经常来到巴黎。赵世炎住在戈德弗鲁瓦旅馆，周恩来也就下榻于此。有时，他穿过马路，到对面一家小旅馆去，《少年》编辑部设在那里。他或则帮陈延年刻钢板、油印刊物，或则约陈延年到隔壁的咖啡店小坐，交谈刊物的内容设置……他们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一天，他又来戈德弗鲁瓦旅馆，推开门，见赵世炎、王若飞正在跟一位细长个头、30 多岁的人交谈，他惊喜地一步上前，握住那人的手喊道：“阮爱国！”

“噢，周恩来，”阮爱国脸上泛着和蔼的笑，“不太容易见着你呀！”

“今天，我不就来了。”周恩来说，“走，我们去一家中国餐馆聚一聚。”

“让你破费，”倜傥不羁的王若飞凑趣道，“你有几个钱？”

“大前天，我收到《益世报》一笔稿酬，”周恩来拍了拍西服口袋，“喏，在这儿哩！”

“聚餐，这太令人高兴了。”阮爱国看了看手表，“可是，我有个约会，半个钟头之内必须赶去……”

“我这次从柏林来，原本就想跟你见面畅叙一番的。”周恩来不无遗憾，“竟不巧……”

“改日吧！”赵世炎说。

“欢迎你明天去《穷苦人报》社，我在那儿等你，”阮爱国说，“行不？”

“行。”说着，周恩来送他下了楼。

周恩来早就知道阮爱国，这是一位了不起的爱国者。据说三年前的凡尔赛会议上，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他曾当众疾呼给予越南民族自决权，这一壮举，使世界舆论为之震动。有一件事，周恩来印象颇深，经旅欧青年团推荐，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肖子璋，正是由阮爱国作介绍人，参加法共巴黎 13 区意大利广场支部活动的。6 月间，他来法国，从报上得知，法共提名阮爱国和法共领导人之一古久里，为法共参议员候选人，足见阮爱国在法共的影响。就在此后不久，他和阮爱国第一次相见于戈德弗鲁瓦附近的一个地铁入口处，交谈起来，是那么相互吸引。特别是阮爱国跟他详细谈了第三国际的历史和法共的一些情况，使他得益匪浅，只因他不常在法国，两人谋面不多，明天则是个机会。

次日，周恩来经地铁，找到 6 区耆老市场的《穷苦人报》社，这是份法

阮爱国：即胡志明（1890—1969），越南劳动党领袖。1920 年在法国加入共产党，1930 年建立越南劳动党，后任越南国家主席。

文报，由阮爱国主编。只见门上挂一信箱，信箱上贴着该报的小小报头，编辑部就设在楼下两个不大不小的房间里。有两个北非人正在拆信封，并在纸上涂改着什么。旁边有一张没有上漆的长桌，上面堆放着一探英、法、德等各种文字的报纸，另有几张椅子，墙上则挂着大幅世界地图……正当他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时，阮爱国闪着亮炯炯的大眼睛，笑容满面地从外面走了进来。接着，又来了几个亚洲人和法国人，熟稔地跟阮爱国握手或向他点头打招呼。

“看，总这么忙乱，”阮爱国笑着摊了摊手，又敏捷地处理了几件事，这才把手搭在周恩来的肩上，说，“走，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出了门，他悄声说道，“去我住处，你会见到一个人。”

“谁？”

“瓦扬·古久里。”

“啊！”周恩来差点蹦起来。

阮爱国住在巴黎13区戈比林街，离报社一公里，两人徒步穿街绕巷，边走边谈。阮爱国向周恩来介绍了“五一”节那天，发生在协和广场、马德来纳广场和波旁宫栅栏门前的游行示威，谈了法国统一总工会同改良主义的法国总工会的决裂和诞生，周恩来则谈了旅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些活动。

11月的巴黎已是寒风瑟瑟，两人裹着黑呢旧大衣不紧不慢地走着，浑然不觉中来到戈比林街6号楼，爬上二楼，敲门后，只见一位穿着工人短装的法国人笑着张臂迎了上来，不用说，这就是古久里了，周恩来跟他紧紧拥抱。

“周，见到你非常高兴，”古久里深邃的目光凝视着周恩来，“阮跟我说起过你，我的中国同志。”

古久里的热忱一下子消融了他们之间的陌生感，他们热烈地交谈起来。

“我们这个党，曾有过思想意识相当混乱的时候，”古久里说，“在党内有出版《人民日报》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集团；有巴黎‘福布尔俱乐部’的空谈派；有联合另一个和平主义倾向的《波澜报》集团；有‘人权同盟’的成员；有共济会基层组织的成员；有‘苏维埃’巴黎小组左倾分子；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说到这里，他在屋内踱了个来回，倏又站定，“革命的法国在很多年放弃自己的传统并践踏它所得到的全部遗产之后，在一度成为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的土壤之后，终于变成了领导本国无产阶级、以劳动和尊严取得不容否认和不可少的成就的国家。”

“法共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周恩来说，“中共的建立毕竟才一年多……”

“绝对的思想统一是不可能的，今后也还会有反复，”古久里想了想，“重要的是，必须把党建设成一个真正维护共产国际原则的组织。那些鼓吹党内‘不同倾向的和解’、‘言论自由’、‘工会不附属于党’以及什么党是‘爱的组织形式’等等奇谈怪论都是不允许的。阮，是不是这样？”

“是的，我们只能与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取统一立场。”阮爱国说。

“啊，我们的谈话是否过于严肃了？”古久里拊掌笑出声来，“下面，我们是去‘郊区俱乐部，参加活动呢，还是去蒙耶街喝咖啡？”

“你不是还要去见亨利·巴比塞吗？”阮爱国笑道。

“啊，见到周，太让人兴奋了，话也多了起来，竟把会见亨利·巴比塞的事忘了。”古久里做了个诙谐的表情，“瞧，我也没听周多谈谈……”

“亲爱的瓦扬·古久里，能见到你足够了，何况，听了你那么多精辟

的见解。”周恩来说。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一定。”古久里又一次拥抱了周恩来，这才离去。

古久里走后，周恩来望了望阮爱国：“真得感谢你安排了这样一次会见。”

“谢什么，我们都是同志！”

“那么，现在该是我兑现许诺的时候了。”周恩来说，“走吧，我们找一家中国餐馆聚一聚。”

阮爱国没吱声，轻轻拽上门，和周恩来一道向蒙耶街走去而这，并不是周恩来旅法时所经历的唯一一次。

当然，在他繁忙的交往中，他也没有忘记抽空去看望郭隆

真和张若茗，她们不久前由布卢瓦搬到巴黎来，进了一家云母片厂做工，王若飞也在这里。她俩都是“少共”成员，也时常参加一些组织活动，郭隆真依旧是那样沉静，甚或带有几分冷峻，而张若茗却很活跃，法语说得十分流畅，她热情、漂亮，颇引人注目。只是，她对别的男性似乎看都不想多看一眼，因为她心里藏着一个人，这就是周恩来，总想跟他接近，她肯定是爱上他了。自然，周恩来心中有数，可他没作出明显的反应。诚然，从马克思和燕妮身上，他已明白革命和爱情并不是对立的，“蔡向同盟”也令人称道，“独身主义”确失之偏颇，他同样需要爱情。但是，他不急，一方面，对身边的这位姑娘，他觉得还需要在共同的斗争中再观察观察；另一方面，他跟国内的那位“小超”一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愈来愈发现她有更多的优点。不过，他们之间也还只谈友谊，未涉爱情。这件事，他要作出慎重的选择。

5 “国共合作”在法国——“铁路共管”

风云录——与国家主义派论战——

《赤光》——爱之归宿——应召回国

尽管阿尔卑斯山的积雪尚未融化，春天依然降临了。

1923年3月，周恩来结束了在德国的一年旅居，迁回巴黎，他是必须这样做的。

前不久，旅欧“少共”已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被推为书记。这时，国内的政局已起了变化，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已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中国将迎来一个革命高涨的时期，形势的变化与发展，需要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党团组织为适应这一形势，决定派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12人第一批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3月18日，赵世炎等一行离开巴黎，周恩来护送他们去柏林。途中，于沙洛瓦劳动大学看望了刘伯坚、聂荣臻、熊味耕等，而后抵达柏林。因等待办理护照和入境签证，他们在柏林逗留了十天。周恩来熟悉这座城市，带他们游览了柏林郊外的风景区，一群人青春年少，言谈中不脱豪情壮志，对未来满怀憧憬。

张申府仍在柏林，他怀疑旅欧青年团将他开除，是周恩来暗中捣鬼，因而，不愿与周恩来见面，也不见这批赴苏留学的青年。周恩来把在柏林的党团员召集起来开会，他力辩并未暗中反对张申府，对此，他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担保，许多人在发言中对他表示同情，认为周不是那种人。可另有一些旅德的与张接近的人，却站在张一边，予周以冷淡。

周恩来心情抑郁，却尽量不表露出来，依然替赵世炎等做着准备，直到把他们送往德波边境的法兰克福车站，目送他们登上火车渐渐远去，这才经

柏林返回巴黎。

他走进戈德弗鲁瓦旅馆楼上的房间，感到有些疲乏，想休憩一会儿。刚上床躺下，王京歧来了，他不好意思，忙着让坐、沏茶。

王京歧，浙江嵊县人，若论周恩来的祖籍绍兴，两人也算同乡。两年前，王京歧因参与占领里昂大学那场斗争，跟蔡和森等一道被遣送回国，去年，他又重返法国。离开国内前夕，曾在上海拜访过孙中山，孙中山指示他，抵法后要联络同志，组织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王京歧到了法国，即与周恩来等多次洽谈，并在巴黎第五区一家咖啡店里设立了筹备处，双方交往密切，互通情况，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国民党旅欧支部，做了扎实的准备。

6月16日，周恩来与尹宽、林蔚等到里昂会见在那里作筹备工作的王京歧，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80余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后不久，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后称巴黎分部）筹备员，这样，在欧洲实现了国共合作。秋天，周恩来又被委任为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王京歧为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长）。

国共是合作而不是合并，合作中共产党并不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但既然合作，则应是真诚的，早在任巴黎通讯处筹备员时，周恩来即致信准备回国述职的王京歧，表示“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同时，他还提出了三项建议：（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工作。本着上述三项原则，可随时变迁而计划当前所要做的工作。

11月25日，周恩来又一次来到里昂，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

会上，他发表了演说，着重批评了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严肃指出“挂名党籍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

选举时，他被推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在王京歧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长，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接着，又筹备成立国民党巴黎通讯处，聂荣臻担任了通讯处处长。

组织工作是繁杂的，无论是国民党旅欧支部或巴黎通讯处的建立，只能说是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旅欧党团对国共合作的认识还不尽一致，国民党内右派和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也在时时作祟，周恩来肩负的责任是艰巨的。

起初，中共旅法、旅德小组是分开的，前者由赵世炎负责，后者由张申府负责，后来合在一块，由张申府负责。但张摇摆得厉害，曾屡次声明退出“少共”，并辞去“共产主义研究会”书记一职。2月间，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通过“弹劾张申府案”，“大会认定R（指张）在少共团体中实处处违反共产主义的纪律，乃决议将R除名于少共团体之外。”

见《周恩来年谱》P61（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版）。

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

曾琦（1892—1951）：四川隆昌人。曾任《救国日报》主笔、国民参政员、青年党主席。

李璜（1895—1991）：四川成都人。曾任国民参政员、青年党党魁。

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早已被遣送回国，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去了莫斯科，张申府又被除名，骨干的走失，队伍的分化，加之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蚀，无疑给旅欧党团带来不小的困难。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周恩来一方面致力于发现和培养新的党团骨干，如李富春、聂荣臻、尹宽、袁子贞、马志远等等，一方面团结争取国民党左派人士王京歧等，以旅欧青年团组织为核心，团结旅法工商学各界社团继续开展爱国运动。

7月，发生了西方列强图谋“共管”中国铁路的事件。

所谓“共管”，源于国内对“临案”的处置。

两个月前，山东临城境内，发生了一起土匪武装劫持火车上中外旅客作人质以行勒索的事件，俗称“临案”。

6月12日，经中国北洋政府交涉，被劫持的西方旅客全部获释，中国有关方面，拟对“人质”蒙受的损失予以补偿。至此，应当说“临案”牵涉的西方旅客问题已基本解决。

但是，一直垂涎中国铁路主权的西方列强却不罢休，以“临案”为借口，提出由他们“共管”中国铁路的无理要求，并制走种种方案，企图强迫中国政府接受。

中国的主权又一次遭受威胁！

7月2日，《巴黎时报》报道了西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付诸实行”的消息。

翌日，周恩来以《少年》杂志社代表身份，联络了8个华人团体，在巴黎西郊“华人协社”开会商讨对策。会后，印制了传单，将“共管”内幕公告世人。接着，周恩来又与《少年》杂志社同人，撰写了《为国际共管中国铁路事告旅欧华人书》。

在舆论发动的同时，组织联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到7月8日，参加斗争的团体已由开始的8个增加到22个，几乎

包括了所有旅法华人团体，甚至连国家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未置身这场斗争之外，声势波澜壮阔，前所未有的。

8日这天，旅法各团体代表陆续来到巴黎“中华饭店”。会前，他们三三两两地谈论着。

“徐先生，那份《告旅欧华人书》，愈看愈让人感到深刻、有力，”郭隆真对湖南留学生会的徐特立说，“你以为如何？”不久前，她与张若茗又迁到里昂，作为旅法中国女勤工俭学学生会代表，今晨刚赶到巴黎。

“莫非你不知道是恩来起草的？”徐特立笑道，“它好就好在指出了军阀的互相争霸，直接造成变兵和游民，但间接的责任，却应落在勾结军阀压榨中国人民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身上。可见，‘临案’的发生，列强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这就驳斥了列强所谓‘临案’源于‘土匪猖獗’一说；至于另一说‘政府无能’，文告也说得十分清楚……”

“是啊，是啊，”旅法华工总会的袁子贞接口道，“文告指

出，中国北洋政府，处在东交民巷太上政府的指挥和列强所勾结的军阀卵翼之下，如何而容其振作有能？政府无能，本由

列强直接或间接造成，然列强恰好借此乃作共管中国的口

实，此正是问题的实质。”

“你们在说什么啊？”这时，周恩来走了过来。

“说你那份《告旅欧华人书》哩。”郭隆真莞尔一笑。

“噢，”周恩来应道，“是这样。”

“恩来，你指出‘土匪猖獗，政府无能’，列强难卸其责，很有说服力。”徐特立说，“你还指出了群众中存在‘只争外交不涉内政’和幻想依靠北洋政府‘杜绝列强共同要求’的认识错误，这一点也很及时。确实，这些想法，在旅法华人中是存在的。”

“不仅旅法华人中有，”周恩来交臂站着，“而且，在国内民众中，在其他旅欧华人及旅日、旅美、旅南洋的华人中，都有类似想法。因此，今天，我们最好以旅法各团体临时委员会名义，分别致电他们，做一广泛发动。”

“对，要这样做。”袁子贞说。

接下去，他们与22团体代表一道确立了15日举行旅法华人全体大会，并推举周恩来和北大同学会的许德珩、华法教育会的何鲁之，以及袁子贞、曾琦、李璜等负责筹备。

7月15日，巴黎上空雷声隆隆，骤然间暴雨如注。

穿着雨衣的，撑着伞的，用报纸盖着头的，一无遮掩挨淋的……一批批华人涌向巴黎社会博物馆会议厅。

下午2时，“旅法华人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大会”开幕。

何鲁之主持大会。

曾琦报告经过情形，宣读文件，并述个人对此事之主张：“……铁路共管为列强久蓄之阴谋，国人幸勿以为仅管铁路，尚非亡国，实则一国命脉系于交通。吾国之关税，改为列强共管矣，盐税又报于外人之手，今更欲进而攫我交通主权，此非亡我而何？然使无腐败之政府，则列强亦未必获逞其野心，故吾人今日之责任，一方面须抵抗列强，一方面须扫除国贼……”

掌声打断了曾琦的话，稍停，他继续说：“而欲达此目的，则须实行四大运动：一、舆论运动；二、群众运动；三、革命运动；四、暗杀运动……”

会议厅里许多人闻此面面相觑，为之惊愕，他依然振振有词：“暗杀，才是最捷便最有效之方法，最重要不可缓者，舍此，则断难收效……”

话一说完，竟又博得一些掌声。显然，它表明旅法各团体间的分歧已公开化了，周恩来对曾琦演讲中的暗杀主张难以苟同。岂但如此，他对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是一直持批判态度的。但是，今天的大会既然是22个团体的统一行动，那么，维护这个“统一”既是当务之急又是今后斗争的需要，因而，他不准备对曾琦的错误言论作正面批驳，而是要揪住西方列强和北洋政府不放，与之进行斗争。于是，他走上讲坛，目光环视着借大的会议厅，开始他的演说：

“……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化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之列强，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接着，他报告了由他起草的《旅法华人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纪事》的内容，然后说：“‘临案’的发生并非偶然，吾人追究乱源，土匪成因，多由变兵与游民之增多，直接至此果者为中国军阀，间接造此因者，实力勾结中国军阀榨取中国人民之列强……”

袁子贞凝神倾听着，这会儿，他使劲鼓起掌来，旋即带动一片掌声。

周恩来被与会者激昂的情绪感染，提高声音说：“所谓‘共管’之说，在列强是存心积虑，由来已久。诸位应当记得，去年召开华盛顿会议时，西方帝国主义即玩弄了迫使中国承认‘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之阴谋。可见，早就埋下了今日图谋共管之导线。故而，今天借‘临案’之机，提出铁路共管，决不是外交上一偶然事件，而是列强侵略中国之国际行动。”他言辞趋于激烈，“我们可以明白地告诉世人，真正成为吾人当前之害的，是列强与军阀，此二害不除，民族独立、民治实现将永无望。”他针对一些人所抱的幻想，发表看法，“我们不应再希望什么北洋政府来解决此事了，北洋政府已受某派军阀所指挥，是听命于列强的无能政府，把抗拒列强、压服军阀事件寄希望于他，便是等于自杀。工农商学各界，要自己起来组织国民政府，以拒绝列强的无理要求，反抗其侵略行动，为此，我们应当站在国民大团结旗帜之下，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

掌声再起，呼应着周恩来的演说，他激动地扬起右臂，高声说道：“看啊，国民革命的热潮，在中国各地，至少在中国各大都市中已涨得那般高了，起！起！起！愿我们毋再自馁。”

会议厅里的人纷纷站了起来，情绪亢奋，有节奏地鼓着掌

少顷，袁子贞身影一闪上了讲坛。作为一名先进华工，如今他已是旅欧青年团候补执行委员。他所领导的华工总会一直走在反对“铁路共管”这场斗争的前列。刚才，周恩来的演说使他深受鼓舞，他感到有许多话要说，但一时又无从表达，愣了会儿，他闪着明眸，望着黑压压的人群，说：“今国事危险至此，华工之责任尤重，吾人当起而与各界一致救国。”他攥着拳头高高地晃动着，“我们要加倍努力，去打倒军阀，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建设国民政府，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他的话，同样激起了热烈的掌声。

窗外，已染上淡薄的暮色，会议在激昂的气氛中结束。周恩来旋即邀请各团体代表走进街口一家咖啡店，他们趁热打铁，正式建立了“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周恩来、徐特立、许德珩、袁子贞、曾琦、李璜等被选为领导成员，统一领导旅法华人团体的爱国运动。

斗争在步步深入，国内各阶层民众的反抗已成燎原之势，旅外华人的斗争正方兴未艾，国际社会主持正义的人士，尤其是报刊，对这场反对“共管”的斗争，寄予了同情和声援。西方列强却步了，8月10日，由16国驻华公使签名的关于“临案”的所谓《通牒》中，未再提出“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要求，此事最终未能得逞。

流浪者多，是巴黎的一个特色，在意大利广场旁的建筑物台阶上，流浪者或躺在那里，或拿着酒瓶呆坐着，面无表情，阳光或风雨，似乎都与他们无关。周恩来就住在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旅馆楼上，推开窗户便可看到对面大厦廊沿下蜷缩着的流浪者，平时进出旅馆或穿街而行，更是司空见惯了，他心中有过怜悯和同情，可他既无力也无暇去管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有许多许多的事等着他去做。

忙，纵然是忙，可他对昔日窗友依然系念不置，尤其是东京的王朴山。音讯断绝已一年，别人来信也仅一句提到朴山，且语意含糊，让他难以捉摸。他再也不能等下去，遂投书扣问：

“朋友，我敬爱的朋友，世界的潮流、岛国的空气，究将你的思想启发到什么地步？”

“你犹记当年东京深夜对饮的豪气么？那时的见解固多幼稚，但那般热情，却终不可混。

“‘五四’后的少年，颇多颓靡之气，本来革命精神是难得养成的，对旧社会多留恋一分，革命精神即减少一分。酷爱和平，善于退让、甘于认命的中国人，要振作起来……”

有警策，有关心，有鼓励，是这般急切，这般真挚。他总是想动员和说服尽可能多的人，投身到救国和革命的行列中来。

围绕铁路“共管”的斗争刚结束，跟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变得尖锐起来。12月初，曾琦、李璜等在巴黎组建了中国青年党，相当活跃地宣传其政治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相对立，周恩来焉能熟视无睹？每逢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他总去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较为集中的巴黎拉丁区和近郊的比央古尔小咖啡馆，与国家主义派进行辩论，揭露其政治主张的实质。辩论往往是很激烈的，听的人愈来愈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国家主义派主张的人却愈来愈少。

由于国共合作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旅欧党团组织决定，相应地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将其机关刊物《少年》不失时机地改为《赤光》。

这是1924年2月间的事。

从《少年》到《赤光》是个很大的变化。

《少年》创刊于1922年8月1日，每月一期，至1923年7月，改为不定期刊物，共出13期。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说”。曾发表过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法兰西内战》之一部分）、列宁的《告少年》（即《青年团的任务》）等译著。还刊登过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文件、消息。当时正处于建党、建团初期，于是，《少年》发表了不少阐述共产党性质和作用的文章，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建党的基础，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周恩来虽不是《少年》的主编，但他和赵世炎、陈延年一道，共商刊物方针大计和内容编排，甚至刻钢板、油印这类事，也颇便相帮。在赵世炎、陈延年赴苏之后，他则成了《少年》的实际负责人，他正是以该刊代表身份参加了旅法各团体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还应当看到，周恩来始终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在这份刊物上，他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评胡适的“努力”》、《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因此，才使《少年》在旅欧华人中间，成为一份颇具影响的刊物。

与《少年》相比，《赤光》更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着重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军阀压迫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方针，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这大致就是二者的区别。事实上，《赤光》成了一份统一战线的刊物，并由周恩来主持。

《赤光》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12页左右，发行数较《少年》多，范围亦广，影响要大。且看《赤光的宣言》：

革命的赤光，

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王朴山留日回国后，先做短期教育工作，后在东北屯垦公署任职，1930年病故。

从北俄腾起，
惊醒了
冬虫般蛰伏的被压迫阶级，
震动了
春蚕般茧缚的世界殖民地，
封建余孽，
国际的强盗，
更被他照的原形毕露。
夜已阑，
天将晓，
赤色之光，
早在东方闪动了。
休忘记
远的土耳其，
近的印度。
是呵！
要寻求
自由，
独立，
原只有接近赤光，
走向世界革命的大道。
起，起，起，
我们的朋友！

……

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
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这篇《宣言》发表在1924年2月1日出版的《赤光》第一期上，未署名。但因周恩来主编该刊，又是中共旅欧总支部负责人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据此并考察诗文的内容、风格，应是周恩来执笔。

“国民联合”、“国际联合”，像两面标记鲜明的旗帜，飘扬在巴黎意大利广场戈德弗鲁瓦旅馆上空，昭示着旅法、旅欧华人团结战斗。

大致在《少年》改版为《赤光》前夕，20岁的邓希贤（邓小平）从巴耶（Bayeux）来到周恩来身边。他已是一名“少共”成员，曾在巴黎近郊比扬占的雷诺汽车厂和蒙达尼附近夏莱特市的哈金森工厂做过工，一年前开始专职从事旅欧团支部的工作，办过工人旬报。让他参与《赤光》的编辑，而且是跟周恩来在一起，无疑，他是高兴的。

周恩来的事情很多，不唯在法国，有时还要去德国、比利时等地，即使在编辑部，也常因接待来访者而中断手头的工作，这样，夜晚对周恩来就显得格外宝贵。在这样的时刻，邓希贤总陪伴着他。他伏案撰述，邓希贤则从他那里接过一页又一页文稿，刻写在蜡纸上，然后再操作一架简陋的印刷机，在沉闷的机器转动声中，无数页印刷品飘了出来，而后再擦好，装订成册……

巴黎的春夜是相当寒冷的，屋里虽有暖气，然窗户外面结了冰。寒风从

窗缝里吹进来，侵袭着这两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破水管的汨汨流水声和楼下醉鬼们踉跄经过时凄凉的咏叹调也时有所闻，但这都不能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周恩来文章中所透露出的坚定的信仰、缜密的思路、卓越的见解和雄辩的文风，使邓希贤深为服膺，而那文雅、真挚、坦诚的个性魅力，也使邓希贤感到兄长般的亲切。

自然，邓希贤的冷静、沉稳和直率，使得周恩来在两人共事的最初日子里，便喜欢上他。

生活上，两人从不讲究，也无从讲究，总是用小煤炉烤面包片，炖白菜汤，有时干脆面包就开水，偶尔想起来得改善一下，周恩来便拉着邓希贤下馆子打牙祭。晚上，则摊上地铺，两人抵足而眠。

在周恩来的指导、帮助下，邓希贤干得很出色，经他刻印的《赤光》，字迹工整美观，印刷清晰，以至同志们给他起了个“油印博士”的绰号，他成了周恩来最信赖的战友和得力的助手。

《赤光》的问世，受到了旅欧革命者和华工、勤工俭学学生等的欢迎，但也引起一些人的诋毁。其主要代表人物，即是曾琦、李璜等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刊物《先声》周报，鼓吹“国家至上”，以否定人民大众反对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破坏国共合作，反对建立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赤光》对此岂能沉默？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国民革命底必然和可能》、《苏俄对中国的态度究竟怎样》、《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答曾琦君书》、《什么叫“造谣中伤”》、《中国的地位和改造》等等，与国家主义派展开论战。其中，周恩来的《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一文，是带有纲领性的，不仅批驳了国家主义派对国共合作的攻讦，而且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原则。

“中国的实际问题（物质条件）必须要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各派分子的合作”，而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就可以做到“对外目标一致，好集中革命势力；对内能坚固各个革命分子的决心”，“训练统一，步骤一致”，“号令集中，指导自如，易于破敌。除这些外，中国共产主义者更能以国际的关系促进国民革命成功”。——这便是周恩来的观点。

针对国家主义派所谓“国共合作”，实行“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的指责，周恩来回答：“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虽说走到第一步，无产阶级尚未得到真正生路。”

文章立场鲜明，论证充分，反驳有力。

在论战的同时，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还深入到广大华工与勤工俭学学生中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广泛争取团结各界旅法华人，使国家主义派逐步失去市场。到1924年底，当再次召开旅法各团体代表大会时，与会的38个旅法华人团体中，支持国家主义派的仅剩《先声》周报等3个受他们控制

见1924年6月1日出版的《赤光》第九期。

的团体，35个团体的代表则站到了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一边。谁顺应时代潮流，谁背逆时代潮流，至此，事情已很清楚。

从2月《赤光》创刊，到6月，在短短的4个月内，周恩来充分利用这块阵地，笔底波澜迭起，先后发表了近40篇文章，其要者有《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革命救国论》、《国际帝国主义趁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外交系》、《华府会议的又一教训》、《这才是一个确实“进兵”中国》、《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问题》等等。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和远景等一系列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周恩来都有了比较明确而实际的认识，较之他在《少年》发表的文章，又向前跨了一步。

春寒料峭，这天，周恩来又一次来到塞纳河畔，他有逛书店的习惯，而这里沿岸一字排开许许多多的旧书摊，里面堆放着形形色色的画报、传记、历史、艺术和理论书籍。店主自然是希望销出的，可是，如你不买，而是取出一本浏览，即使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甚至更长时间搁在手里翻来翻去，店主也不加干预，他反倒因自己的书摊能吸引读者而怡然自得。店主讨厌的只是大声喧哗，故而，尽管附近有流浪汉、拾破烂的、钓鱼的、乞丐等等在游荡，一个个书摊的小范围内却是安静的，读者（顾客）各不相干，沉埋于书中……周恩来喜欢这种氛围，只要有空，他总到这儿来。倘若他看中了哪本书就买下，然后在附近的林荫道旁找张长椅坐下，或继续翻阅，或掩卷沉思。偶尔有一个金发女郎持一束紫罗兰从他身边风一般轻的翩然而去，留下淡淡柔柔的馨香。

近日，他正在考虑写一篇论述革命救国的文章，而在塞纳河畔的短暂经历，在他仿佛是一种调节。他不能日以继夜地把自己绷得紧紧的，他也需要轻松，而轻松则使他的思路变得格外灵活、清晰。他想到，既要革命则要有个革命政党，而且，必须确定革命的纲领。可是，当前不仅党外有敌对思潮，党内也还有模糊认识，这倒是要认真对待的。看来，这篇文章是非写不可了。

回到戈德弗鲁瓦街17号楼上，已是晚餐时候，烤好的面包片放在桌上，白菜汤还冒着热气，邓希贤不在屋里，像是刚走了一会儿。他风卷残云，几分钟内，面包和白菜汤就下肚了，嘴一抹，抽出一叠稿笺，便写了起来：

……

“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需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目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

正写着，邓希贤推门进来，笑呵呵地说：“噢，你回来了。”

“瞧我，”周恩来指了指在一边的空碗，“通统吃完了……”

“那就是你的么！”邓希贤说，“你也没说去哪儿，天都快黑了，我出去转转，看能不能碰到你。”

“我去塞纳河畔逛书摊了，难为你在等。”周恩来歉意地笑了笑，“啊，我构思了一篇文章……”接着，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旋又问道，“你看如何？”

“要得，要得！”邓希贤大为赞赏，“这革命的敌人和革命的依靠力量，究竟是谁，太重要了，快写吧！”说着，他则伏在桌上

刻起钢板来了。

那么，谁是革命的敌人呢？

周恩来写道：

“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自是我们最大的仇讎。他们挟其工业先进国的机械力，奴隶了我们农业国的散乱民众，掠夺我们的原料，强销他们的货物，以金钱诱惑中国的军阀官僚，于是借款约成，继海关共管、邮政代管后，有盐税共管、铁路共管、江河共管，驯至全部财政共管，乃便要完全实现共管中国了。但不有内贼，外贼何能张牙舞爪的一无忌惮！”

内贼是谁？周恩来从庚子之变写起，历数袁世凯、段祺瑞、曹银、吴佩孚以至陈炯明等一些图私的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及外交系、洋行买办、滥官僚。他们正是全中国民众的敌人，亦即革命的对象。

接下去，他论述了革命的势力，那就是海外华侨、劳动阶级、知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和正在酝酿期中的农民阶级。他明确指出，这五种革命势力中，“特别是交通机关、矿山、工厂，常与列强资本势力接触、备受中国军阀凌辱的中国劳动阶级——终将为民革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这里的“劳动阶级”实际是产业工人。

但是，谁来领导这五派革命势力呢？

周恩来写道：“在历史的使命上说，中国国民党是负有这个革命统率之责的。”

但是，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了国民党的不足和错误：“过去，它因为忽略了革命势力真实的存在和各派的经济地位，以致革命12年，不但新的革命势力未能集中到国民党旗帜之下，便是国民党唯一的后援，海外华侨也有动摇之虞，这不能不算是国民党至大的失计。”因此，他希望国民党，“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以为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

此外，周恩来在文章结尾指出，还要“与我们立在同一境地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之国的苏联俄罗斯”实行“国际联合”，来“促成我们国民革命的成功……”

不妨说，这篇文章把“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具体化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势力，以及负统率责任的政党都说得一清二楚。倘若我们将周恩来这篇《革命救国论》与两年后毛泽东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参照着读，那是饶有兴味的。

身在国外，却始终关注着国内的事，这几年，周恩来源源不断地有文章和信函寄往国内，当然，大多是寄往天津。其中，与觉悟社社员的关系尤为密切，周恩来向他们谈了自己的种种见解：

“……不过在现在旧经济势力资本主义极兴旺的欧美，要想 Anarchism（无政府主义）的鼓吹能动摇人心，这不免等于梦呓。

“总之，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我认的主义是一定不变了，而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正品的事，壮烈而又悲惨……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态的那首诗（即《生离死别》——引者注），和最近对

于 C.P. 坚定的倾向。

“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后保证者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欧乱现正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

“卢森堡 当年也说：‘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的……’这都是见到之语。”

这些文字，最初都见诸于 1922 年和 1923 年间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是周恩来与觉悟社社员湛小岑、李毅韬、李锡锦、郑季清、邓颖超通信的摘载。

周恩来旅欧之后，与《新民意报》一直未中断联系，他给觉悟社社员的信，均由该报转交，其中他给邓颖超的数百封信函，也总由总编辑马千里转。

先是 1922 年冬，周恩来汇集并主编了散居国外的觉悟社社员的文章通信，油印成册，取名《觉邮》。天津的觉悟社社员湛小岑、李毅韬、邓颖超受此启发，找到马千里，提议《新民意报》副刊索性也叫《觉邮》，以刊载国内外觉悟社社员的有关通信、文章和消息。这样，《觉邮》便成了宣传革命的一个阵地。

1923 年，马千里已是天津达仁学校校长，他邀请邓颖超、李毅韬来该校任教，邓颖超离开了京师公立第七女子高等小学到了天津，周恩来给她的信则不必再转往北京了。频繁的通信，不断加深彼此的了解，两人之间的关系，由纯洁的友谊，发展为爱情。

“那时，恩来撵啊，撵啊，一封信接着一封信……”多少年之后，邓颖超在一次谈话中回顾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情景。

这期间，漂亮、聪明的张若茗仍然跟周恩来很接近。周恩来彬彬有礼、优雅洒脱的魅力，总令一些知识女性心旌摇动，而张若茗的感觉不尽如此，他们毕竟有过国内参加爱国运动，且一道入狱、一道创建觉悟社那段难忘的经历，如今又都在法国。她觉得自己对周恩来有更多的了解，她固然欣赏周恩来的外貌、气质，但她最忻慕的是周恩来的宽阔胸襟、睿智、辩才以及火一般的热情，冰一般的冷静……

但是，周恩来有周恩来的想法，张若茗热情的微笑，爽朗的言辞，以至清秀的脸和一双温柔的大眼睛，都给他以美好的印象。可是，她脆弱，周恩来很看重这一点，作为献身革命的终身伴侣，他觉得她不合适。他们的相处或相恋，是心照不宣呢抑或已经捅破？后来，相互间是有过争执呢抑或平静地分手？这些都无从知道，反正他们都年轻，即使相互间有过感情纠葛，也很自然，不足为怪。一件重要的事实是，爱是可以选择的，他已倾心于邓颖超，相信她是一定能经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他的意念中，时常出现那个身着白衫黑裙、头梳 S 髻、一身女教师装束的姑娘，这自然就是“小超”。

他的信是那样频繁，可表白却是含蓄的。

1923 年的春天，一封巴黎来信送到邓颖超手里。一看笔迹就知道是周恩来的，拆开来，是一张印着油画的名信片。奇怪，以前，他也不止一次寄过明信片，可从不放在信封里，怎么这次变换方式了？她捏着明信片，凝神观赏着，只见画面上芳草如茵，鲜花姹紫嫣红竞相争艳，在明丽春光的沐浴下，

卢森堡（1871—1919）：即罗莎·卢森堡，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生于波兰，1919 年 1 月 15 日遇害。

邓颖超谈话录音，存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原址纪念馆。

三个美丽的少女奔跑着，风儿掀起她们瀑布似的金发，前面似乎有什么在召唤她们，她们是那般神采飞扬、步履轻盈……

什么意思呢？邓颖超脑中闪过一个问号。

不等揣摩，她旋将明信片翻过来，只见三行熟悉的字迹跳入眼帘：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蓦地，她的面孔染上赧红，丝丝甜蜜漾在心头，循环往复，久久不散。

她领悟了一切，英俊潇洒的周恩来此刻仿佛就在她的面前，回忆又把她带到几年前，重温那经历过的一切：

1915年“双十节”，周恩来在“河北公园”天津救国储金团会上演说时，那矫健的身影，宏亮的声音，雄辩的口才；

1916年6月，南开礼堂，周恩来男扮女装，演出《一元钱》时惟妙惟肖的表演；

1919年8月，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广东会馆”排练她主演的《花木兰》、《安重根》，从日本回来不久的周恩来践约观看并予指导；

1919年9月，觉悟社成立，及其后一系列充满生机的活动。

1920年1月，周恩来被捕，之后，她和湛志笃等前往探监；

1920年8月，陶然亭的聚会；

接着便是周恩来旅欧前夕，那难忘的海河之夜；

这之后周恩来去了欧洲，万里之遥，鱼雁传书，于是，她从中获悉，他不再上学，而是把时间花在对欧洲社会、工人运动和各種政治派别思潮的考察上，在“推求比较”中，探索着拯救中国之路。

在无数封来信中，有一封信强烈地震撼了邓颖超，那是他作出了一个最重要的抉择：信仰共产主义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她立即作出回应，谈了自己的经历，表示也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愿与他一起共同奋斗。两颗年轻、赤热的心，同一节律地跳动着。

思绪把她引回去年，那是一个庭前飒凉的秋日，她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蓦然感到光线暗淡下去，一抬头，见一位魁伟、谦和的青年人站在门口。

“我，李维汉，刚从法国回来。”

“坐，请坐。”一听说来自法国，邓颖超的心怦然而动，似已明白了什么，陌生的面孔旋即变得亲切起来。

“啊，这是恩来给你的。”李维汉将一封信递上，“我是受命回国，向团中央汇报旅欧青年团的工作的，恩来抓了我的差，让我务必将此信亲手交给你，我只能不辱使命喽。”

邓颖超半是欣喜，半是羞涩，客人的风趣逗得她掩口而笑，稍停，问道：“恩来好吧？”

“好，好，他可惦记你啦。”李维汉笑道，遂又谈了周恩来的

近况。邓颖超专注地倾听着，不时插话相问，她几乎想知道周恩来的一切。

临别前，李维汉说：“我常听恩来说起，有个叫小超的，在‘五四’运动中，十分勇敢，且坚韧不拔，他对你印象很深很深……”他睨了邓颖超一眼，意味深长地一笑，“这次，恩来是让我当一次传书的红娘吧？！”

一向落落大方的邓颖超倏忽腼腆起来，也许这是李维汉在开玩笑，恩来自己并未言明这层意思啊！

可今天，这张非同一般的明信片，展露了周恩来的心迹。

似在意料之中，却又觉得突然，她心中有拂不开的疑云。她知道他一直抱“独身主义”，是怎么改变的呢？她还知道他身边有若茗姐，她总以为他们会好起来，甚至在心里为他们祝福，可他没有那样做，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尽管邓颖超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可她知道，在遥远的巴黎，周恩来正在等待她的回音，她不能不尽快作复。

于是，她在信中征询他对她和湛小岑、李毅韬准备建立一个进步妇女组织的意见。她写这些，很从容，很坦然。可是，往下写，让她回答周恩来的求爱，她却并不那么干脆，笔触似乎也有些迟钝，她不能回避，不应回避，她不忍心他收到信后有所失望。

聪明的姑娘，走笔向周恩来发出委婉的探询：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吗，现在有什么想法，为何不提若茗姐呢？

周恩来的回信总那么快，他说，他非常赞同他们组织一个进步的妇女团体。这件事，本来不问，她也知道他的态度，他的赞同是意料中的。接着，他坦诚地谈了自己改变“独身主义”和

对张若茗的看法，随后，便向她倾诉着热烈而诚挚的感情。

周恩来的执着和深情是不可抵御的。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她的内心终于作出抉择，她要快些复信，告诉他，接受他的爱，而且，还要告诉他，她也一直在爱他。

可是，婚姻毕竟是人生一件重要的事，她不能不征求母亲的意见。

母亲自己的婚姻有过不幸，可她希望女儿幸福。她知道周恩来，也见过，印象是好的，但婚姻这桩事轻率不得，她想得要仔细、复杂得多，听完女儿娓娓的叙述，沉吟有晌，她才说：“等周恩来回国再作决定吧！”

邓颖超向来敬重母亲，有母亲这话，她不好再说什么了。

然而，周恩来并不知道这一切，他的信仍在频频敲击着邓颖超的心扉。

“这个恩来啊……”邓颖超陶醉般地笑了。她不愿爱她的人，也是她所爱的人，经受感情的煎熬，琢磨母亲话中的意思，并未阻拦啊，那又何必等到恩来回国呢？况且，他已献身革命，什么时候回国也难说，能让他在无望中等待复等待吗？

邓颖超的心软了，她仿佛看到了遥远的他，那副惆怅、焦急的面孔，她自己也不能等待了。

于是，一封回信，像凌空飞翔的鸟儿，穿过万水千山，翩然落在周恩来的手上。邓颖超欣然回答：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周恩来久悬的心踏实了，啊，他终于有了感情的归宿。

复信的事，邓颖超没有隐瞒母亲，不过，是在信寄出之后才禀报的。

“啊，既然写了，也就这样吧。”母亲温和地说，旋又望了望女儿，笑意漾在她饱经风霜的脸上。她相信女儿，也相信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

现在，该说说张若茗了。

她依然倾心于周恩来，因多年来共同斗争的经历，周恩来跟她也一直保

持着亲近的友谊。他很看重这种友谊，甚至在他跟邓颖超确定爱情关系之后，他跟张若茗也还有着正常的交往，爱情与友谊是两回事，不能建立爱情，不等于友谊也不存在了，纯洁的爱情和纯洁的友谊，同样是美好的。

周恩来在受命与王京歧一道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并担任执行部总务科主任和代理执行部长之后，便不再担任旅欧共青团的书记，改由任卓宣担任。

作为一名女性，且法语又很流畅，张若茗常在旅欧共青团负责人和法国共产党人之间做秘密联系。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会，并提前派人通知中国旅欧共青团，邀请派人参加，还安排在会上发言。中国旅欧共青团决定张若茗作为代表之一，参加追悼会，并指定由她撰写发言稿。

但是，追悼会前两天，法共获悉政府不准外国共产党人参加这一公开活动，倘若与会，极有可能被捕。法共将这个情报告知中国旅欧共青团，让他们不必到会，但可将发言稿交去，由法共着人在会上代为宣读。

斗争策略的这一变化，原是很自然的事。可是，任卓宣反对法共的做法，认为是怯懦的表现，坚持中国旅欧共青团的代表非参加不可，并让张若茗准时到会，张若茗焉能不执行这个决定？她去了并在会上作了发言。谁料散会之后，她即受到法国秘密警察的询问，险些被驱逐出境。自此，一直有法国秘密警察在她周围跟踪、盯梢，并不止一次地对她调查讯问。事情很清楚，她的共青团身份已经暴露，难以进行革命活动了。

在这期间，她跟任卓宣有了明显的思想分歧，并有过争执和冲突，任卓宣作风专横粗暴，动辄呵斥，郭隆真曾被她骂得痛哭流涕，为这，张若茗对他深为愤慨和不满。

身份的暴露，加上任卓宣的恶劣人格，使张若茗的思想产生了激烈的波动。放弃革命吗？这意味着从此和亲密的同志分路而行。回国吗？一个22岁的姑娘，与家庭已断绝关系，学识与能力都还不行，困难太大。而目前，碧细女士（法国参议员于格雷的遗孀）将丈夫的遗产捐赠给了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女生，有此资助，她仍可继续在法读书……多少个不眠之夜，她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最后作出痛苦的抉择：脱离政治活动，退出共青团，留在法国专心读书，研究学问。

周恩来知道了这一切，已经晚了。他沉默以对，能说什么呢？他没有给她爱，爱是不能勉强的，况且，他已心有所属。可是，张若茗这样做，却使他感到深深的遗憾。但人各有志，这跟爱情一样，也是不能勉强的，他能做的，只有祝愿她在学业上获得进步并找到自己的幸福。他们仍是好朋友。

1924年7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离开法国，

张若茗和郭隆真在里昂车站为他送行。临别依依，有多少话要说，郭隆真是知道张若茗心思的，她想回避，可是，火车已启动，周恩来跟郭隆真握手之后，又伸向张若茗，他凝望着她那双惆怅的大眼睛和明显消瘦的脸庞，紧紧握着她的手，说了声：“珍重！”转身登上了列车。张若茗伫立在月台上，一动不动，她的目光追寻着远去的火车，直到消失……

4年之后，夏天的一个安谧的夜晚。

暮色笼罩着里昂大学，大门上方过街楼的宿舍里，张若茗正沉埋于书籍

任卓宣（1896—1990）：又名叶青，四川南充人。早年加入中共，后投向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央政治大学教授、台湾“政治作战学校”校长等职。

中，蓦地，从门口传来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

“张若茗，张若茗！”

会是谁呢？杨堃吗？不像他的声音，也不像别的中国留学生的声音，事实上，除了跟她相恋的杨堃，她几乎已断绝和别人的往来，她猜测着……

“张若茗，若茗……”喊声又传了过来，于是，她走过去把门打开，只见面前站着一位英俊的青年男子，着一套笔挺的白色西服，头戴白色的“法国盔”，这究竟是谁呢？不等她往下猜，倏忽，那个人摘下墨镜，张若茗惊呆了，是恩来！她几乎要喊出声，可周恩来手搁在嘴上“嘘”了一下让她别喊，两人遂下了楼，悄然离开学校，向附近一座小镇走去，而后进了一家咖啡店，畅谈别后一切。

周恩来告诉她，他是从苏联过来的——事实上他是去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他选择了经波兰、德国、比利时和法国这样一条路线回国，是基于安全的考虑，当然，也是想有个机会会会朋友，其中自然少不了她。

灯光映照下，张若茗眼里有泪花闪烁。

周恩来又告诉她，5月，他和文淑（即邓颖超）自上海乘船去大连，经哈尔滨出国到莫斯科，在大连被日本人抓住，后又巧妙地脱险。他叙述了此事的经过，张若茗静静地听着，听完才“啊”地一声长长地出了口气。

“噢，”周恩来忽然想起似的，“我来之前，文淑一再叮嘱，让我代她向若茗姐问好。”

“谢谢，谢谢。”张若茗热泪盈眶，倏又流了下来。

“我和文淑是1925年在广州结婚的……”

“祝贺你们，衷心祝贺。”张若茗说。

“你看，我只顾说自己，还没问你呢，你好吗？”

“好，好，”张若茗冷静下来了，“我凭直隶女师的肄业证书，经我国驻法总领事馆验证认可，被推荐进了里昂大学，1925年取得心理学合格证书；1926年取得普通哲学和逻辑学合格证书；1927年取得伦理学和社会学合格证书；今年又取得第四门专业教育学合格证书，并取得了里昂大学中文科硕士学位。”她心中积蓄的话太多太多，渴望倾诉，说个不停，只是，已不再那么活泼，多了一分娴静，“现在，我正在读博士研究生，主攻方向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唔，对了，我的导师是法国著名心理学专家塞贡教授……”

“真为你高兴，若茗，你快要成为一名学者了。”

“隆真、文淑好吗？隆真在苏联学习期间还有信来，回国后就再也没信了……”张若茗有一丝惆怅，“还有清扬呢？也是杳无音信……”

“隆真、文淑仍在不顾一切地从事革命活动。清扬去年在武汉隐蔽了几个月，回到天津后没有活动，这也是为环境所迫。”周恩来说，“觉悟社社员，有的已完全脱离政治，还有两三人已站到国民党一边去了，个别的已经彻底堕落……”

“真是世事难料啊！”张若茗感慨系之，“像我也……”

“不说，不说，”周恩来摆手劝阻了她，他啜着咖啡，沉默片刻，“现在，我们与国民党反动派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国内干革命是有相当危险的。告诉你，我就随身携带着烈性毒药，为了严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

为党献身。”他凝视着张若茗，“我们这次会见是很难得的，分别之后，将来什么时间再会，难以预料。不过，既然革命是我唯一的选择，我想，即使自己牺牲了，看不到革命彻底胜利的一天，也在所不惜，心甘情愿。”

张若茗眼噙热泪，缓缓点头，她一向钦佩周恩来的革命志向和无私无畏，她说：“恩来，谢谢你说了那么多，谢谢你的信任。时间的流逝并未改变你的热诚和真挚，你是一个难得的人，”她的口气变得凝重起来，“我已置身圈外，但我真心祝愿共产党能早日成功。诚然，我心中也藏着一些党的秘密，但请相信我，我是永远不会泄露的。”

“唔……”周恩来未说下去，却十分感动地凝望着张若茗……

时间已近午夜，快到里昂大学关门的时候了，周恩来要乘夜班车去马赛，他将张若茗送回校门附近，两人不得不握别。张若茗目送着周恩来白色的身影融入浓重的夜幕之中，这才转身进了校门。

风啸雷鸣，大浪迭起的前夕，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

在珠江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岛上，黄埔军官学校正在筹备之中，张申府此时正旅居广州。这所新型军官学校迫切需要人才，廖仲凯、戴季陶先后找到张申府，请他推荐，张申府旅欧期间认识许多人，斟酌后，他开列了一份15人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

军校筹备期间，廖仲凯管财政，戴季陶管教育，张申府将名单送上时，说：“其中，周恩来是非要不可的，我了解他。”遂作了大略介绍，“我还想特别说明的是，在柏林，我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并非一般人能有此认识，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

张申府以此举荐，消除了自己对周恩来的隔阂，一显心灵的坦荡。廖仲凯和戴季陶听了，颌首赞同，并答应寄旅费过去，张申府立即将这消息函告周恩来。

1924年7月下旬，旅欧1300多个日日夜夜之后，周恩来和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离法取道海路回国。

临行前夕，王京歧邀集国民党旅欧总支部成员合影留念。同事期间，他对周恩来的为人、才干是十分赏识的，他将这帧合影寄给父亲，在背面写着：“同志恩来（坐当中者）与儿协同办党，可说两年之久了。素来，他——专门对外；我——一惟理内。本其过去工作，判他的智力、魄力，与夫将来之事业不在汪、胡诸老同志之下。”时汪、胡均为国民党元老，助孙中山完成推翻帝制、建立中华之伟业，声望卓著，王京歧却如此评价周恩来，可谓是

廖仲凯（1877—1925）：广东惠阳人，曾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

戴季陶（1891—1949）：又名传贤，浙江吴兴人。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孙中山秘书、大元帅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汪、胡：汪精卫（1883—1944）：字兆铭，原籍浙江绍兴。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国民党中央副总裁。伪中央执委会主席、伪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人。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广州大总统府政治部部长、国民政府主席、立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

独具慧眼。让人惋惜的是，翌年，王京歧遭法国当局迫害，惨死于归国途中的船上。

回国时，周恩来携带着简单行囊，里面藏着旅欧共青团执委会致团中央的一份报告，其中有对他的评价：

“周恩来——浙江，年 26。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第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这是组织鉴定，应当说，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在香港停留期间，周恩来致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表示自己的行止有赖 C. P. 中央的决定。

9 月初，周恩来 抵
达广州。 10 月，遵照 C. P. 中央的指示，他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 11 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从此，这位从运河边上的小城——淮安走出的官绅人家的后裔，正式登上了中国以至世界的政治舞台，以他的全部心智，在风云变幻、悲喜交织的漫长岁月里，导演或参与导演了一出出一幕幕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历史剧……

后 记

夜，清旷宁谧。

写完《早年周恩来》最后一个字，我如释重负，感到少有的欣慰。

最初，作为中国当代“优秀出版社”之一的江苏教育出版社约我写这部书，我几乎没有犹豫就接受了下来，这是因为一种历史责任感主宰着我。

于是，我搜求、研究了国内外有关周恩来的大量文献资料，但仅靠这些是不够的，我旋又奔赴淮安、淮阴、铁岭、沈阳、天津等周恩来早年读书和生活过的地方，作实地考察和调查，即使是偏远的乡村，只要是 he 到过的，我也从不放弃。其间，我与各种人有过广泛的接触，对具体事件、地形地貌、风土人情以至民俗掌故的了解，增加了我对历史背景的认识，深化了我对周恩来的理解。自然，长达月余的采访，进一步丰富了我的资料积累。而所有这一切，当属写作的准备。

诚然，我写的只是青少年时代的周恩来，但是，我不可能孤立地去写一个人，而要宏观地把握、表现周恩来所处的时代、地域和一幕幕生活场景，就是说，应当尊重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那段历史。然而，作为一部文学性传记，则又应写出周恩来曲折坎坷的生活遭遇、复杂错落的心灵历程和丰富斑驳的感情世界，他的性格、人品、气质和魅力……总之，我要给读者提供一个多角立体的画廊，一个真实、圆形的人。

记得阿·托尔斯泰写过《彼得大帝》，罗曼·罗兰写过《巨人三传》，斯·茨威格写过《约瑟夫·富歇》，而不朽的司马迁则在《史记》中写过许多人物传记……当代作家也有人致力于传记文学的写作，我只是其中之一。至于这部书究竟写得怎样，需要时间的检验，我最大的愿望是读者能喜欢它。

在这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难忘淮安、淮阴、铁岭、沈阳、天津、北京、南京等地周恩来纪念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相助。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力平、刘武生、李海文等学者于百忙中审阅了书稿，提出了中肯、透辟和有价值的意见；而南开大学教授刘焱、周恩来的亲属周尔辉等，也从各自角度予以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致以真诚的谢意。当然，我还要感谢江苏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所生、副总编辑薛正兴和责任编辑徐宗文、周方，他们的眼光、魄力和始终如一的支持，对这部作品的出版，起了关键作用。最后，我祈盼着专家、读者的指谬和匡正。

作者

1995 年 6 月 12 日

